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GUANGXI INSTITUTE OF SOCIALISM

双月刊·2024年第1期(第35卷)

学报编辑委员会

主任：罗日新

副主任：邓路遥 梁经成 黄龙杰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邓路遥 农祖荣 许立坤 吴红博 吴 强 何文矩 何绍红

罗日新 岳 劲 黄龙杰 梁经成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主办

廣西社會主義學院

学 报

双月刊

(1996 年创刊)

第 35 卷 第 1 期

2024 年 2 月 18 日出版

主管、主办单位:广西社会主义学院

编辑出版:广西社会主义学院

学报编辑部

主 编:梁经成

副 主 编:何文钜

编辑部主任:杨绪强

地 址:南宁市西乡塘区新村大道 6 号

邮政编码:530007

电子信箱:GXSYXB@163.com

访问网址:<http://www.gxxy.org>

电 话:0771-2381657,3891622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9-0339

国内统一刊号:CN 45-1250/D

发行范围:公开发行

发 行:广西社会主义学院

学报编辑部

印刷单位:广西明园凤凰印务有限公司

定 价:10.00 元

目

特别策划·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

“根本方向”:生成逻辑、路径面向和实践创新——广西建设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研究系列论文之五

..... 凌经球,凌 菱(5)

继续在民族团结进步上走在全国前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视角下广西金秀的成就与启示

..... 何文钜,黄芳萍,黄金海,覃丽丹(1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内涵要义与价值意蕴

..... 钟周铭(25)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品格与价值意蕴

..... 潘 伟(31)

唯物史观视域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出场、理论价值和实践路径探赜

..... 郭子涵,李培锋(36)

统战理论与实践

大统战工作格局下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探究

..... 许奕锋(41)

扎实推进广西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工作提质增效研究

..... 宾月景,朱良华(49)

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逻辑与路径

..... 李浩然,王 群(54)

录

人民政协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作用与路径研究——以湖北省宜昌市“协商在一线”为例

..... 姚 薇(61)

政党制度研究

新时代加强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研究

..... 梁晓宇(68)

民族研究

古壮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硕果——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系列之三

..... 章彩銮(76)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梳理与展望

..... 卞之晓,程 凡,刘金林(82)

中华文化与文明互鉴

论儒家“忠恕”思想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启示

..... 王 凯(94)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研究

东盟“中文+职业技能”教育的 SWOT 分析及发展策略探究

..... 吕明璋,赖紫弦,刘振平(99)

观察与思考

以村规民约推动乡村治理法治化的路径研究

..... 张 健,陈佳栋(108)

Journal of Guangxi Institute

Of Socialism

Bimonthly

(started in 1996)

Vol.35 No.1

Published on Feb. 18th 2024

Administrator and Sponsor: Guangxi
Institute of Socialism
Editor and Publisher: The Editorial Dept.
of Journal of GIS
Editor-in-Chief: LIANG Jing-cheng
Deputy Editor-in Chief: HE Wen-ju
Editorial Director: YANG Xu-qiang
Add: 6 Xincun Rd. Xixiangtang District.
Nanning.

P.C.: 530007

E-mail: GXSYXB@163.com

URL: http://www.gxsys.org

Tel: (0771)2381657, 3891622

ISSN: 1009-0339

CN: 45-1250/D

Distribution Area: P.R.China

Distributor: The Editorial Dept. of Journal
of GIS

Printing: Guangxi Mingyuan Fenghuang
Printing Co.Ltd

Price: ¥10.00



JOURNAL OF GUANGXI INSTITUTE OF SOCIALISM

Main Contents

"Fundamental Direction" : Generative Logic, Path Orientation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the Fifth of a Series of Paper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Demonstration Area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in Guangxi LING Jing-qiu,LING Ling(5)
Continue to be at the Forefront of National Unity and Progress;the Achievements and Enlightenment of Guangxi Jinxi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luralistic Unity Pattern of the Chinese Nation HE Wen-ju, HUANG Fang-ping, HUANG Jin-hai, QIN Li-dan(15)
The Theoretical Source, Connotation and Value Implication of the Thought of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ZHONG Zhou-ming(25)
The Theoretical Character and Value Implication of 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 PAN Wei(31)
The Historical Appearance,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Path of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GUO Zi-han, LI Pei-feng(36)
Research on Constructing Interlocking Social Structure under the Work Pattern of "Grand United Front" XU Yi-feng(41)
Research on Solidly Promoting and Improving the Work of Non-Party Intellectuals Offering Advice and Suggestions in Guangxi Universities BIN Yue-jing, ZHU Liang-hua(49)
The Whole Process of People's Democracy in Chinese Modernization: Logic and Approach LI Hao-ran, WANG Qun(54)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Process of Research on the Role of People's Democracy and the Path;to "Negotiations on a Line" as an Example in Yichang of Hubei YAO Wei(61)
Study on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of Democratic Parties in the New Era LIANG Xiao-yu(68)
Ancient Zhuang Character: The Fruits of Ethnic Communication Fusion and Integration;the Third of a Series of Studies on Ethnic Communication Fusion and Integration in Guangxi QIN Cai-luan(76)
Review and Prospect of the Research on Building the Chinese Nation's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BIAN Zhi-yao, CHENG Fan, LIU Jin-lin(82)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Confucian Thought of "Loyalty and Forgivenes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Modern Civilization WANG Kai(94)
SWOT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Exploration of "Chinese + Vocational Skills" Education in ASEAN LV Ming-zhang, LAI Zi-xian, LIU Zhen-ping(99)
Promoting the Legal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through Village Rules and Regulations ZHANG Jian, CHEN Jia-dong(108)

“根本方向”:生成逻辑、路径面向和实践创新

——广西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研究系列论文之五

凌经球¹,凌 菱²

(1.中共广西区委党校(广西行政学院),广西南宁530021;2.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南宁530006)

摘要:习近平提出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根本方向的重要论断,指明了新时代新征程“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方向。结合广西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实践,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要义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关系入手,揭示其生成的理论逻辑,探讨将“根本方向”落实落地的路径及其实践创新举措。

关键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根本方向;示范区建设;广西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4.01.001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4)01-0005-10

引言

2023年12月,习近平在考察广西时强调:“广西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自治区各项工作的主线,作为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根本方向,巩固发展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良好局面。”^[1]这一重要论断,为我们指明了新时代新征程“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方向^{[2][3]}。深刻理解这一“根本方向”的生成逻辑、路径面向和实践创新要求,对于牢牢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找到把“主线”落实到各项工作中的抓手和切入点,扎实推进广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以下简称“示范区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学界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内涵及特征、创建实践及存在问题、创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及创建活动与社会综合发展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广泛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观点,研究成果丰硕,但对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系的研究相对薄弱。以“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二者关系的理论阐述。郝时远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新境界^[3];李贽、张静认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要实现“强起来”的奋斗目标,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要在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基础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

收稿日期:2024-01-12

作者简介:凌经球,男,中共广西区委党校(广西行政学院)二级教授,校(院)A类名师,校(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首席专家,研究方向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凌菱,女,广西民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4];高永久、冯辉认为全面推进民族复兴伟业对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出了五大实践要求,其中之一就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要求”^[5];冯雪红等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相辅相成^[6]。二是探讨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具体路径。李若青、赵敏提出深化示范创建的实践趋向,即融入党的群众路线、构建实践主体认同,规避效应限度、实现制度优势转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人与社会同构^[7];周竞红阐述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化问题,提出要紧紧围绕“主线”,广泛、持续、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使之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体化的有效平台之一^[8],严庆等认为,2023年3月国家民委印发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测评指标体系(试行)》体现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的要求,应以新的指标体系为导向来推动新时代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9]。三是对各地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如罗彩娟^[10]、热娜古丽·阿不都热合曼^[11]、李正洪^[12]、侯井榕^[13]等,通过归纳总结各地经验,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由上可知,学术界对民族团结、民族团结进步、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等方面的研究已颇为深入、日趋成熟,且在不断深化。关于民族团结进步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在关联的研究文献虽不多,但也不乏具有独到洞见的学术成果,这些都为本文提供了诸多思想观点和方法借鉴。而关于“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根本方向”这一重要论断的研究,目前尚鲜有论及。有鉴于此,本文结合示范区建设实际,从生成逻辑、路径面向和实践创新三个方面展开探讨。

一、生成逻辑: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根本方向的理论诠释

“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14]这是习近平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论断,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族团结进步的内在逻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的历史背景下,习近平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高度,在民族工作领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提出的重大原创性论断^[15],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的科学话语表述。习近平强调,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16]。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是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领导人民推动“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成功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基础上,提出的一项具有政治性、系统性、整体性、规范性、基础性、群众性、时代性的民族工作,是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有效载体和实践平台。当前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仍需借助这一有效载体和实践平台,充分宣传和发动全国各族群众参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实践,从而凝聚起磅礴伟力,为完成党提出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团结奋斗。由此看来,在中华民族迈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根本方向,具有其内生性的理论逻辑。

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根本方向,根植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支撑,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注入新的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科学总结了党的百年民族工作理论和实践经验,系统阐述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重要任务、工作主线和实现方式,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民族工作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的最新成果,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思想引领和根本遵循。作为这一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

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16](以下简称“四个与共”)。其落脚点在于“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17](以下简称“五个认同”)。“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既是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也是支撑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关键要素。惟其如此,才能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发展壮大。进而言之,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有机组成的民族“大家庭”。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形象地说,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18]中华民族的国家形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文化根基是各民族共同创造、共同享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从历史中走来,在5000多年文明史的浸润下,不断发展壮大。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19](以下简称“四个共同”)。为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说到底是对作为世界民族之林中具有国家民族地位的中华民族的整体性认知和对中国国家统一意识的感悟^[4]。在这个意义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强调政治归属感和政治认同^[20]代序⁹。只有构成中华民族的56个民族及每一个成员不断增强“五个认同”,不断强化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和法治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才能不断发展壮大。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作为党开展民族工作的一项具有创新意义的实践活动,其构成要件包含“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四个部分。“民族”是基于民族因素对这一实践活动主体对象的界定,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语境下,其指涉的对象涵盖中华民族的56个民族成员;“团结”和“进步”既是其追求的价值目标,也是主要任务。“团结”从维护和发展社

会主义民族关系的视角对创建工作提出要求,“进步”则是规定其发展方向,当下所言的“进步”指的就是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民族”“团结”“进步”组合起来,构成“民族团结进步”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工作话语,有其特定的内涵。它不仅是一项一般性的工作,还是一项事业,即“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其内容涵盖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方方面面;“创建”则是以一定的评价标准体系,采取自评与他评相结合的方法,对各地区各部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的实践成效开展评价,通过塑造典型、打造“示范”,广泛动员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参与创建工作,不断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向前进。可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是党在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中探索形成的一项重大实践创新活动,其目标指向就是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实践中要以这一创新活动为载体,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转化为各族群众丰富多彩的具体行动,在“润物细无声”中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不断增强“五个认同”,进而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21],同心共筑中国梦。

综上所述,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根本方向,就是在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过程中,一方面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为“纲”^[22],横向而言各项创建活动都聚焦于此,纵向来说要贯穿创建工作的全过程;另一方面要以此作为衡量创建工作实践成效的标准要求,引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朝着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正确方向持续健康发展。

二、路径面向: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根本方向的现实向度

上述对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根本方向的生成逻辑进行了“理论诠释”,那么,在实践中,如何来体现这一“根本方向”?在此,笔者以广西为例展开论述。广西在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过程中,提出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

家园的路径选择(即“五个家园”建设)。笔者认为,“五个家园”建设既是广西推动“示范区建设”的工作抓手,也是把“根本方向”落到实处的现实向度。

(一)着眼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在 2021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必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使各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20]正文 24}。这要求我们从精神层面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聚力,充分表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对于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具有“压舱石”的重要作用。

关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内涵,不同学者因研究视角和方法各异,对其理解也各有千秋。笔者以为,从构成要素来分析,或许能更好揭示出其内核及特征。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由“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和“共有”组成的统一体。“中华民族”是其主体属性,包括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 56 个民族;“精神家园”是内涵属性,特指人的精神生活的栖息之地,是人的精神和心灵的寄托、获得安慰的归宿之所^[23];“共有”是其关键要素,一定意义上可以称之为“共同性”,它反映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一体”的显著特征,也凸显出“四个共同”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由此,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安身立命、情感依托、灵魂归宿以及凝聚价值共识、增强文化认同、培育精神支柱的精神文化空间。立足新时代新征程,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旗帜引领,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时代主题,以伟大民族精神作为支撑动力,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涵养根脉,以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精神谱系,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基于此,广西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要突出强调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广大干部群众尤其是领导干部要学深悟透,掌握其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理解其道理学理哲理,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不断打牢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二是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用共同理想信念凝聚思想共识。通过持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示范点建设、选树宣传“八桂英模”、实施文明创建工程等举措,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三是全面增强中华文化认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持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开展中华民族史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大力挖掘广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中华文化符号,讲好“四个共同”的广西故事,促进广西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创新推进文化惠民工程,持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在城乡基层大力开展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各具特色的群众性、大众性文化,丰富各族群众的精神生活。四是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力度,提升其普及程度和质量,推动各民族语言文化创新交融,以语言相通促进心灵相通。

(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建设共同富裕幸福家园

在 2021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要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17]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其中之一就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21]9};在展望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2]20}。2023 年 6 月,习近平在内蒙古考察时强调:“从全国来看,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艰巨的任务在一些边疆民族地区。这些边疆民族地区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能掉队。”^[24]从理论逻辑来看,共同富裕是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共同愿望,彰显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促进共同富裕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重要经济基础。马克思曾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5],“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6]。可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然它们相互之间也有反作用),共同富裕的实现对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将产生直接的影响;反过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铸牢,将进一步凝聚起整个中华民族的强大力量,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强有力的动力支撑。基于此,广西在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中,提出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建设共同富裕幸福家园”的实践路径。

广西建设共同富裕幸福家园,突出强调如下重要举措。一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23]。2023年12月,习近平考察广西时强调广西要“努力在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提出了“推动广西高质量发展,必须做好强产业的文章,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具体要求^[3]。广西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重大方略要求中,突出强调要强化实体经济支撑,一体推进工业强桂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发展战略性新质生产力,扎实做好“老字号”“老字号”“新字号”“外字号”四篇强产业的大文章。坚持向海图强,落实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着力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二是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取得更大突破。牢牢把握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个战略任务,充分发挥独特区位优势,积极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市场经营便利地,构筑边疆民族地区高水平开放新高地,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三是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应然之举^[23]。要坚持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兜底性、基础性、普惠性民生建设,着力完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托幼等民生问题,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四是持续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深入实施强基固边、产业兴边、开放睦边、生态护边、团结稳边等工程,深入推进边疆“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长廊”建设,打造边疆“四个共同”文化长廊。

(三)夯实社会发展基层基础,建设守望相助和谐家园

习近平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在

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17]。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何以重要?一言以蔽之,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途径。因交往而产生思想、情感等方面的交流,因交流程度的不断加深而产生交融,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规律。马克思、恩格斯立足“现实的人”的交往实践,从交往出发揭示共同体的演进历史和共同体意识的生成,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现实的人”通过交往结成共同体,在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现实的人”也随着共同性的增加产生与之匹配的共同体意识^[27]。广西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说自秦始皇统一岭南起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从未间断。“广西作为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各族人民同顶一片天、同耕一垌田、同饮一江水、同建一家园”^[1],这是广西各族人民数千年来自我认同的真实写照。基于这样的历史文化传统,广西在推进示范区建设中强调要“夯实社会发展基层基础,建设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地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营造各民族守望相助、手足相亲的良好社会氛围,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深扎根到各民族群众的心田。

实践中,广西强调要在三个方面重点发力。一是全面推进各民族人口流动融居。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双向推进,深入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深入开展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以选调生等方式面向全国吸引高校毕业生到广西就业;鼓励支持广西各族群众到东中部地区务工经商、求学就业、定居安居;依托广西丰富文化旅游资源,以把桂林市打造成为国际旅游城市,建设广西世界旅游目的地为抓手,以“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为载体,常态化开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二是优化提升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以构建高水平互嵌式学校、企事业单位和社区为抓手,加强智慧社区、平安社区、人文社区建设,营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良好社会环境。重点加强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合作,促进各族群众到广西就业创业、

工作生活、安居乐业,高质量推动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三是全面加强与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的交流合作。持续发挥好现有平台(桂台经贸合作文化论坛、桂港澳台青少年交流计划等)的积极作用,不断增强港澳台同胞尤其是青少年的国家意识和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认同,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怀。

(四)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宜居康寿美丽家园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生态领域“两个结合”的理论创新成果,是当代中国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核心理念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219]。还应看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曾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8]这告诉我们,人是和自然界不断地进行能量交换来维持自身的生存的。人一旦离开了大自然,生存的基础也将随之丧失,也就无法在地球上生存。可见,人与自然具有一种唇齿相依、血肉相连的天然联系,是一种相互依存、共生共荣的共同体关系。可见,维护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题中之义、内在要求。基于此,广西在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中,强调要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宜居康寿美丽家园。

一是突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牢记习近平“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的嘱托,以筑牢南方生态安全屏障为使命担当,以加快建设美丽广西、生态文明强区和高标准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为抓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统筹推进山水田林湖草治理,重点加强漓江、西江流域以及海岸生态保护,全面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等重大工程,擦亮广西“山清水秀生态美”的金字招牌。二是扎实推进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以推动传统产业绿色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升级为重点,以因地制宜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为发展方向,打

好“绿色牌”“富硒牌”“长寿牌”,加快发展壮大林业产业、文旅产业、银发产业、大健康产业,加快建设具有广西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三是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学习借鉴浙江“千万工程”经验,聚焦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的全面振兴,围绕到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21世纪中叶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要求,强化规划先行,坚持分类推进、因村施策,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的原则,扎实推进以提升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宜居环境舒适度为着力点的乡村建设行动,促进村民就地过上现代化生活。在确保粮食安全、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基础上,以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为牵引,以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为支撑,以发展现代设施农业、数字农业、智慧农业为抓手,着力推动林果蔬畜糖等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发展,做好乡村“土特产”这篇大文章,促进乡村一二三产融合,提升农业生产经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围绕社会和谐有序、充满活力的乡村治理目标,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重点,深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模范党员”“五好家庭”“好婆媳”“好少年”等群众身边的典型培树为重要抓手,以推进乡村移风易俗为切入点,广泛、深入、持久、务实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充分挖掘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为村民提供更多富有“乡土味”的乡村文化产品,大力提升村民现代文明素质。

(五)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建设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243]理论和实践都充分证明,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全局性、关键性的重大意义。广西既是边疆地区、也是民族地区,同时还是革命老区、欠发达地区。这一特殊的区情,决定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对于广西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具有特殊的意义。习近平在2021年4月考察广西时强调,广西要“在巩固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上彰显新担当”^[29];

2022年他在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进一步强调,广西要“在维护国家安全上作出更大贡献”^[21]。边疆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边疆治理中,一方面要赋予边民以国家公民身份,确认其权利与义务,彰显出国民身份所承载的“基于领土、文化、政治与权利等文化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的理性认同能力”^[30],从而不断强化边民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另一方面,又要保障边疆人口的民族身份与发展权益。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成为边疆治理的必然选择。新时代新征程,边疆治理一方面必须把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摆在首要位置,另一方面又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边疆地区各族人民同全国一道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客观上需要在国家整体战略和整体治理的框架下,对边疆民族地区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系统性重构。这其中蕴含着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建设边疆稳定平安家园的内在逻辑。基于这样的治理逻辑,广西在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中,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建设边疆稳定平安家园”作为重要的实践途径。

在具体实践中,广西重点采取了以下举措。一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系统总结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成功经验,结合新的形势要求创新推进实施。按照统一和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的要求,把是否有利于增进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首要考量,做好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工作,加快推进相关立法,逐步建立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政策法规体系。二是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强化法治思维,把民族事务治理纳入依法治国轨道,提升依法处理民族事务水平,着力推动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大法治宣传力度,教育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法治意识,坚持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打造人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社会秩序。三是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广西。深化平安创建活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务实推动“四下基层”,加强市县乡综治中心实体化建设,推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向城乡基层延伸,完善基层社区网格化、数字化治理

体系,把矛盾纠纷、社会治安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常态化、制度化推进扫黑除恶斗争,全方位净化社会环境,着力打造平安乡村、平安社区。着力防范和严厉打击各种走私、贩毒、偷越国境等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牢牢守住祖国“南大门”。四是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坚持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健全反渗透、反颠覆、反分裂、反邪教常治长效机制,严密防范暴力恐怖风险,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的能力,坚决捍卫国家政治安全。建立健全社会风险预警监测体系,提升风险防范化解能力,确保不发生各领域“黑天鹅”“灰犀牛”事件,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边疆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巩固壮大主流意识形态阵地,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造谣生事等违法行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话语权。

三、实践创新: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根本方向的落地之策

(一)胸怀“国之大者”,切实扛起政治责任

习近平在主持第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及时研究解决本地区本单位涉及民族工作的重大问题。”^[16]2023年12月,习近平在考察广西时强调广西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为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胸怀“国之大者”,切实扛起这一政治责任,把党中央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决策部署摆上重要议事日程,贯彻落实到实践中。自治区党委已经对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作出了具体部署,全区各级领导干部务必把思想统一到自治区党委的决策部署上来。首先,要强化理论武装。要通过纳入各级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个人自学、专题辅导等多种方式,强化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学习,联系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实际,全面完整准确把握其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不

断深化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必然性、极端重要性和现实针对性的认识,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的目标任务、工作要求落到实处。其次,要牢固树立新理念。习近平强调“广西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作为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根本方向,巩固发展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良好局面”^[1]。广西各个行业、各个部门的工作都必须聚焦主线,体现出其根本要求。按照自治区党委的要求,牢固树立“谋全局必须谋民族工作,谋民族工作就是谋全局”的新理念,把新时代新征程的民族工作摆到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的全局高度来认识、把握、谋划、部署,把各项工作扎实推向前进。再次,完善党委领导民族工作的体制机制。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抓好党的建设的内在要求,并纳入党的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以及政治考察、巡视巡察、政绩考核中。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推动形成“五级书记”一起抓的责任机制。充分发挥统战工作领导小组、民族工作委员会的职能作用,按照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作出的部署,构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

(二)常态化长效化抓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首先,要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贯穿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的始终。要以抓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来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不断丰富其内涵,创新其形式和方式方法,做到“常创常新”,做到在全国始终走在前列、作出表率。其次,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扩面提质”。从“扩面”来看,通过近年来的努力,截至2023年末广西已分别有10个市、21个县、6个乡镇被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示范县、示范乡镇。市级层面有望在“十四五”末期实现示范创建全覆盖,但县和乡镇占比仍然较低。因此,加大工作力度,大幅提高被命名的县和乡镇占比水平,应是今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努力方向。从“提质”来看,要在创建工作中,真正把教育各族群众牢固树立“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不断增强“五个认同”贯穿于示范创建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使之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着力营造各族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良好社会氛围。再次,倾力打造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示范典型。“继续在民族团结进步上走在全国前列”^[2],这是习近平对广西五千多万各族人民的殷切期盼。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奋力交出在全国具有创新性示范意义、典型性示范价值的新答卷,是新时代赋予广西各族人民的新使命。为此,在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过程中,要鼓励各地结合“五个家园”建设,发挥各自比较优势、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基础等,不断丰富创建内涵、创新创建形式和方法,努力打造出一批独具广西特色、具有全国典型意义的示范市、示范县、示范乡镇以及先进单位和个人。

(三)以“党建+”推动社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走深走实

习近平强调:“广西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要从基层社区抓起,通过扎实的社区建设、有效的社区服务、丰富的社区活动,营造各族人民一家亲的浓厚氛围,把民族团结搞得更好。”^[3]这充分表明抓好城乡基层社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的重要性。党的百年奋斗史证明,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在基层的贯彻落实,离不开基层党组织的有效引领和基层各类组织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党的基层组织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3]报告还对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赋予基层党组织四种功能:一是政治领导;二是思想引领;三是组织群众;四是社会号召。要建强城乡社区党组织,充分发挥其“四力”功能,有效引导基层各类组织发挥功能,最大限度地把分散的各家各户和“原子化”的个体组织起来,把城乡基层社区建设成为各族群众团结和睦之家、共建共享的幸福之家、守望相助的和谐之家、共居共乐的和美之家。

(四)搭建理论研究和智库平台

习近平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把准研究方向,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研究,

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16]。可见,理论研究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就广西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而言,还有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亟待深入研究。比如,各领域各部门的工作如何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纲聚焦发力,“根本方向”理论上如何深入阐释、具体实践中如何落实落细、广西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经验如何进行科学总结等,都迫切需要我们结合广西实际来加强理论研究,深刻揭示其道理论理哲理,为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提供理论支撑。为此,应依托广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会这一平台,发挥好各级各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作用,进一步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研究。常态化设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高峰论坛”,并将之打造成为全国有影响力的集成果展示、经验分享、智库交流、合作共建、国际传播于一体的综合性创新平台。此外,创新推动有关研究基地与设区市结对共建,实现智库支撑全域覆盖。依托结对共建的研究基地,为各市提供经验总结、品牌创建、思想引领、决策咨询和媒介传播等全方位的智力服务。

结语

习近平提出的“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根本方向”这一重要论断,是对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认识的又一次深化与提升,为我们指明了在新时代新征程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方向。从理论上讲,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根本方向,就是在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不仅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纲”,横向而言各项创建工作都应聚焦于此,纵向来说要贯穿于创建工作的全过程,同时还要以此作为衡量创建工作实践成效的标准要求。在实践中,广西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为载体,以“五个家园”建设为现实向度,将“根本方向”落到实处,体现出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主线的根本要求。这是新时代新征程党的民族工作的实践创新,要使之

得以顺利推进,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胸怀“国之大者”,切实扛起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责任,同时还要常态化长效化抓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以党建+推动社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走深走实,搭建理论研究和智库平台。惟其如此,才能促进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凝聚起广西各族人民的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为推动强国建设、实现民族复兴贡献广西力量。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在广西考察时强调 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N].人民日报,2023-12-16(1).
- [2]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3]郝时远.民族团结进步的新境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西部蒙古论坛,2020(3).
- [4]李贇,张静.守护民族团结生命线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3).
- [5]高永久,冯辉.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实践要求[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2).
- [6]冯雪红,聂君,黎岩.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3(1).
- [7]李若青,赵敏.塑造示范: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结构——行动”实践解释[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
- [8]周竞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象化的理论思考[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4).
- [9]严庆,王欣,谭野.以新的指标体系助推新时代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6).
- [10]罗彩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路径思考——基于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陈双村的调查[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

- [11]热娜古丽·阿不都热合曼. 加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 经济师, 2021(8).
- [12]李正洪. 把握时代要求 聚焦工作主线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作出云南示范[J]. 今日民族, 2021(7).
- [13]侯井榕. 中央企业社会责任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基于广西百色华润希望小镇的个案分析[J]. 广西民族研究, 2023(3).
- [14]习近平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 共同建设伟大祖国 共同创造美好生活[N]. 人民日报, 2022-03-06(1).
- [15]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N]. 人民日报, 2023-06-03(1).
- [16]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 2023-10-29(1).
- [17]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 2021-08-29(1).
- [18]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 北京: 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9: 132.
- [19]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J]. 中国民族, 2019(10).
- [20]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辅导读本[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23.
- [21]习近平在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强调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乘风破浪扬帆远航[N]. 人民日报, 2022-10-18(1).
- [22]范玉显. 主线为纲: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新疆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J]. 实事求是, 2023(6).
- [23]来仪, 杨莹慧. 再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内涵及现实意义[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9(1).
- [24]习近平在内蒙古考察时强调 把握战略定位坚持绿色发展 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N]. 人民日报, 2023-06-09(1).
- [25]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91.
- [26]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82.
- [27]谭亚莉, 李亚楠. 马克思交往理论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考察与实现路径[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23(4).
- [28]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72.
- [29]新华社. 习近平在广西考察时强调 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凝心聚力担当实干 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广西[J]. 当代广西, 2021(9).
- [30]李兰芬. 国家认同视域下的公民道德建设[J]. 中国社会科学, 2014(12).
- [31]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17-10-28(1).

责任编辑:何文鉅

继续在民族团结进步上走在全国前列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视角下广西金秀的成就与启示

何文鉅¹, 黄芳萍², 黄金海³, 覃丽丹³

(1.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广西南宁530007;2.广西中医药大学,广西南宁530001;
3.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广西南宁530022)

摘要:广西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继续在民族团结进步上走在全国前列,要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根据实际情况抓实各项工作,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我国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重要场域,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各民族交融汇聚而成,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民族工作有效开展,一体的主线和方向地位更加彰显,多元的要素和动力作用进一步激发。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重要发源地,建立自治县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政治引领、经济赋能、文化浸润、社会互嵌、制度保障等的生动实践,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为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县域模式。

关键词: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广西;金秀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4.01.002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4)01-0015-10

2023年12月14日至15日,习近平在广西考察时强调:“广西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自治区各项工作的主线,作为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根本方向,巩固发展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良好局面。要把持续扎根铸牢共同体意识落实到经济、教育、就业、社区建设、文化建设、干部队伍建设

等各项工作中,继续在民族团结进步上走在全国前列。”^①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新征程广西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指明了方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我国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重要场域,是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各民族交融汇聚而成的。经过新中国成

收稿日期:2024-01-02

基金项目: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9BMZ003)。

作者简介:何文鉅,男,广西社会主义学院科研部主任、教授,研究方向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黄芳萍,女,广西中医药大学高等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黄金海,男,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政策法规处处长,研究方向为民族政策法规;覃丽丹,女,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办公室一级主任科员,研究方向为文化人类学与壮族文化。

立以来党的民族工作有效开展,一体的主线和方向地位更加彰显,多元的要素和动力作用进一步激发,基础日臻深厚牢固。新时代新征程,习近平深刻阐释了“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2],强调要加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研究^[3]。广西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继续在民族团结进步上走在全国前列,要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根据实际情况抓实各项工作,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坐落在广西大瑶山主体山脉上的金秀瑶族自治县(以下简称“金秀”),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重要发源地。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根子可以追溯到1935年其在金秀的实地调查^{[4][52]}。费孝通认为,“中华民族又分又合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作具体的观察”“但是如果从微型的具体实况来观察各民族间又分又合的关系,就可以丰富我们对中华民族形成和变化过程的理解,充实我们对民族问题的理论认识了。从这个角度看,大瑶山提供了研究这个问题的一个园地”“从这个实例里面可以看出一些规律来,不仅适用于金秀的瑶族,也可能适用于中华民族”^{[5][437-443]}。周大鸣等学者也指出,金秀是我国具有代表性的民族自治地方和人类学民族学界公认的学术“圣地”之一,在这里谈从瑶族来看中华民族的形成有特定意涵^[6]。本文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为视角,系统梳理金秀成立自治县以来的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探索其经验启示和理论启示,以期为进一步做好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提供鲜活个案和经验借鉴。

一、金秀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主要成就

金秀全县总面积2468.79平方公里,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常住人口130313人,有瑶族、苗族、壮族、侗族、汉族等多个民族共同居住^[7]。金秀的民族关系在我国南方民族地区具有典型性^[8]。新中国成立之后,金秀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国家的支持、发达地区的支援下团结奋斗,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坚持“多元”“一体”辩证统一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

断巩固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一)政治引领不断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厚牢固

受自然环境和民族历史变迁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前,金秀瑶族的民族意识具有三种形态。第一种形态是瑶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形成了中华文化中的瑶族文化圈。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下,客观上形成了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盘古信仰、中华民族的传统伦理道德等在瑶族传统社会影响巨大。第二种形态是形成了统一的瑶族认同。虽然进入金秀的时间、语言、风俗习惯有所差异,但基于历史记忆、创世传说、盘王信仰等共同因素和生存需要,金秀瑶族的成员对外都以“瑶族”宣示身份标识,“建立起一个共同遵守的秩序……成为一个具有民族认同意识的共同体”^{[4][527]}。第三种形态是受到既往不平等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生产资料分配不均衡的影响,金秀瑶族与山外的其他民族存在矛盾和隔阂,个别地方“朝还朝、瑶还瑶”二元并立的观念根深蒂固;在瑶族内部,“山主”和“山丁”之间也存在矛盾,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民族意识的离散。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民族意识主导下,金秀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一直没有停止过,实现了局部的团结融合,客观上为金秀各民族生成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良好的历史基础和文化基础。近代以来,在共同追求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金秀各族人民心中成为一种自觉。

新中国成立之后,金秀党委、政府紧紧围绕凝聚人心开展政治引领,积极引导各族人民进行民主协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逐步消弭历史遗留下来的矛盾与隔阂,不断壮大团结奋斗的人心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金秀各族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守正创新、守望相助、踔厉奋发,与全国人民一道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飞跃,生成了根深叶茂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团结奋斗的政治基础进一步夯实。现如今,金秀各族人民心手相连、血脉相融,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深厚牢固。

(二)经济赋能深入实施,各民族共同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稳步迈进

受自然条件和历史因素的制约,金秀经济在新中国成立前比较封闭、发展缓慢,“吃了一山过一山”的“游耕”生计方式长期存在。为促进金秀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共建共享祖国发展成果,各级党委、政府制定实施了一系列帮扶措施,努力推动金秀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共享。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组织开展土地改革,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生产热情。据统计,在制定实施《大瑶山团结公约》后的1年里,平均每人增产1—3个月的粮食^⑯。改革开放之后,根据经济发展的新变化新特点,及时将鹿寨头排、象州桐木划归金秀管辖,打破金秀“画地为牢、划山为牢”的困境,县域工业实现从无到有,粮食生产实现自给有余,县域经济实现从小到大;在财政、税收、民族贸易等方面实施优惠政策,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专项拨款等形式予以扶持,努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同时,金秀立足于县情,始终坚持把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放在首位,推动互帮互联与增强内生动力有机结合,深化各族人民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并赋予其民族团结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金秀聚焦“产业+民生”,成功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形成山内乡镇发展“茶叶+”和“中草药+”为主,山外乡镇发展“水果+”为主的多样产业模式。坚定不移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大力发展战略+旅游”为主体,以“生态+农+林+民族文化”和“生态+工业”为两翼的特色产业链,成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珠江流域防护林源头示范县、珠江流域最主要的水源地和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点建设县、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推进旅游发展方式向“全域旅游”转变,促进旅游业提档升级,并通过旅游深化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民生改善方面,金秀深入推进脱贫攻坚,采取“五抓”(抓争取、抓整合、抓投入、抓融资、抓招商)措施筹集扶贫资金,2019年4月实现整县脱贫摘帽,各族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三)文化浸润持续深化,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扎实有效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也是维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精神保障。瑶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自在意识源远流长,金秀瑶族文化里始终流淌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血液。新中国成立后,金秀与外界的联系不断加强,文化事业在交往交流交融中进一步发展。改革开放后,金秀先后组织开展“瑶族度戒节”、全国瑶族文化高峰论坛等,创作和收集了《瑶族歌舞》等反映金秀各族人民生产生活的作品,组织有关人员到全国各地表演,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自觉性不断提高。

党的十八大以来,金秀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持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打造线上+线下宣传矩阵,不断深化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近年该县先后有《瑶族石牌习俗》《黄泥鼓舞》等2个项目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瑶族过山音》等18个项目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古陈村等6个村被命名为“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滴水村、孟村等被命名为“广西民族特色村寨”,六巷乡获评2021—2023年度“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车田村等13个村获评自治区舞蹈村,推动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金秀还特别注意运用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华民族故事,树立和突出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引导各族人民正确把握本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关系,不断厚实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基础。

(四)社会互嵌全面广泛,民族关系更加密切

历史上,由于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瑶族曾存在过“入林唯恐不密”“入山唯恐不深”等心理,金秀个别地方的石牌还出现过限制族际通婚的规定。为了化解民族矛盾和隔阂,1951年,当时分管大瑶山各瑶区的象县、修仁等县人民政府派出了工作组(队)进入金秀,通过宣传党的民族平等政策等方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同年8月,中央访问团来到金秀。在中央访问团、广西区政府和金秀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

力和充分协商下,金秀召开大瑶山各族代表会议,制定了《大瑶山团结公约》,规定各民族及民族内部必须“亲密团结”。各民族代表还以瑶族石牌的形式歃血盟誓,表示永远遵守《大瑶山团结公约》。1953年2月,金秀制定《大瑶山团结公约补充规定》,各民族及瑶族内部各成员之间的歧视与偏见迅速消减,呈现了“月亮圆圆望十五,全瑶团结在今天”大好局面,各民族意识也转换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兄弟意识。

改革开放后,人们逐渐走出大瑶山,外出劳务、学习、经商,其他地区到金秀工作、旅行的人员也越来越多,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密切。金秀顺势而为,传承《大瑶山团结公约》和《大瑶山团结公约补充规定》的民族团结精神,持续深化各民族和瑶族内部的团结。党的十八大以来,金秀各族人民心连心、手拉手,坚持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各民族包容互鉴与互嵌融居不断拓展深化,各领域的团结融合更加频繁和纵深。例如,大樟乡上坪村北面属金秀管辖,南面属象州县管辖,共有壮族、瑶族、汉族3个民族一起居住。70多年来,不同县份不同民族在这里同住一条村、同饮一井水、同耕一峒田、同圆一梦想,节日一起过、文化一起传、责任一起担、美好生活一起闯,处处洋溢着兄弟姐妹情谊。又如,2018年,由瑶族、壮族、侗族、汉族等民族组成的260多户群众搬迁到桐木镇“幸福里”易地扶贫搬迁小区,不同民族的群众在这里一起去工厂、果园务工,一起学习、生活、娱乐,打造了各民族人口流动融居的“金秀样板”。

(五)制度保障日臻完善,民族事务治理水平不断提高

在自治县成立之前,金秀并没有建立统一的行政区划,而是由荔浦、蒙山、平南、桂平、武宣、象州、鹿寨等地分别管辖。

1951年11月,根据金秀的政治环境和各族人民意愿,广西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开展大瑶山区域自治工作的指示》,派出工作队协助金秀开展民族区域自治工作。1952年5月,大瑶山瑶族自治县(县级)正式成立,金秀从此告别了分散管辖的局面,各

族人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稳妥推行民族区域自治,依法行使当家作主权利。在持续推进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工作中,金秀坚持推动法治、德治良性互动,制定实施了《自治条例》《森林资源管理条例》《旅游管理条例》《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瑶医药发展条例》等5项民族立法,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和大政方针的贯彻执行。建立健全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机制,将贯彻落实国家法律法规和传承弘扬民族习惯法“石牌律”有机结合,引导各民族以村规民约等形式推动“石牌律”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石牌头人”参与纠纷调解,用“瑶言瑶语”化解矛盾纠纷,荣获2017—2018年广西平安建设先进县,长垌派出所获评为全区“枫桥式公安派出所”。加强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选拔和使用,加强与少数民族代表人士的工作联系和沟通,建立健全少数民族代表人士数据库,有效发挥了代表人士参与民族工作的积极作用。

二、金秀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经验启示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也是我国的一大优势。如何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辩证统一地处理好“多元”“一体”关系,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金秀民族团结进步的成就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构建民族工作大格局

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是党的民族工作的成功经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政治保证。习近平强调:“民族工作关键在党。”^[10]金秀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忠实地贯彻执行党关于民族工作的重大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金秀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即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由金秀各族人民充分协商和团结奋斗的结果。全境解放后,金秀坚持各民族平等,采取“慎重的、温和的、曲折的阶级斗争”方式推进土地改革,得到了各族人民的拥护。同时,引导各族人民实施民族识别,及时消除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和民族矛盾纠

纷问题,使各民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平等成员,实现当家作主和享受国家宪法及其他法律所赋予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政治地位大为提高,增强了各族人民对国家的认同感、维护国家统一的自觉性和作为中华民族成员的自尊心与自豪感。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金秀坚持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作为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和长期性的任务来抓,进一步加强了党的领导,以系统观念推动创建工作向纵深开展。一是创新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机制,把民族团结进步放在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来统筹、谋划和推进,每年组织召开县委常委会、县政府常务会定期听取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情况,专题研究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工作。将创建工作纳入领导班子考核,纳入县委巡察内容,纳入党校主体班教学计划,纳入基层党建、意识形态责任制、创建文明城市等重点任务清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纳入社会治理和全县管理。二是构建统筹兼顾、齐抓共管的民族工作新格局,成立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形成县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民宗部门综合协调、其他部门各司其职、社会群众广泛参与的民族工作格局。三是担当新使命,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在增进共同性的基础上尊重包容差异性,推动各项改革赋能精准发力,引领各民族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宗教观,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实践证明,金秀民族团结进步的发展历程,就是党对金秀各族人民关怀帮助的光辉历程;金秀民族团结进步的成就,就是党领导金秀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伟大成就。党的民族政策是成功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战略思维、系统观念、因地制宜和分类指导,恰当运用工作方法,推动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二)必须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促进工作聚焦、人心凝聚

近代以来,在救亡图存的共同奋斗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自在转换为自觉。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视为己任,持续推动各族人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

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中,金秀十分重视对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挖掘、塑造和宣传。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访问团就向金秀各族人民赠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增进了金秀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改革开放以后,在推动各族人民走出大山融入改革发展大潮过程中,金秀各级党委、政府注意教育引导各族人民树立大局意识,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实践中推动县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主线的明确,金秀聚焦“主线+特色”,持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打造线上+线下宣传矩阵,推动了党的民族理论政策的宣传落实和县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同时,金秀各有关方面结合自身特点,开展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主题活动。例如,开展“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委员行动”,号召和动员金秀全县政协委员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争当金秀民族团结进步好故事的宣传员、民族团结进步好传统的传承人、高质量发展的参谋员、办好事实事解难题的战斗员、助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团结使者;开展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县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项计划”宣传月活动,组织金秀各族人民广泛开展彰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等交流活动,打造体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旅产品和精品线路,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群众听得懂的语言,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在县民族小学、县政务服务中心等9个单位设立首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在县民族高中等3个单位设立首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研究基地”,与有关高校等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研究和实践工作,共同探索共

生、共建、共融、共享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合作模式;与平南县等签订民族团结进步区域协作协议书,推动各族群众跨区域交往交流交融,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各族群众心中。

(三)必须坚持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汇聚前进力量

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习近平指出:“必须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14]1950年春,毛泽东为中央访问团题词“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中央访问团到达金秀后,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慰问瑶族同胞、解决生产生活困难等问题的同时,协调处理民族团结问题,解决了长期制约金秀民族团结的恩怨是非,为金秀民族团结进步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金秀积极从宣传等多个方面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不断凝聚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力量。一是抓实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通过播放宣传片、悬挂横幅等,大力营造民族团结进步的良好氛围。把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民族法律法规纳入各级党委(党组)中心组、机关干部年度学习内容和党校教育培训计划,组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实践活动,教育引领全民参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用好现代融媒体技术,通过“两微一端”等平台,促进各民族共同构筑网上共有精神家园,构建网上最大同心圆。二是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六进”活动。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学校、进乡镇、进宗教活动场所作为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主渠道主阵地,先后在县民族小学、罗香中心校、广西金秀松源林产有限公司、人民法院、桐木镇古池村等学校、企业、机关单位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截至2022年,金秀全县机关单位、乡镇(街道)、学校、宗教活动场所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率100%。三是选树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典型。组织全县各级各部门开展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单位)评审命名活动,积极向国家、自治区、市

推荐申报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发挥好示范引领作用。2023年1月,金秀被命名为第十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迈进了新的发展阶段。

(四)必须坚持“多元”“一体”辩证统一,正确处理共同性与差异性关系

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12][15]}金秀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关系,在各领域推动“多元”“一体”关系良性互动,在增进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同时,注意尊重和包容差异性,确保“一体”的主线和方向不偏移,“多元”的要素和动力作用不受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以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例,通过四个“用好”,保证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和谐有序。一是用好红色资源,促进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主题宣讲。充分发挥县国防文化园、长垌乡龙华红色革命纪念馆等教育基地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站、所)作用,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中国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强化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二是用好节庆资源,促进社会宣传教育。在瑶族盘王节、“三月三”、杜鹃花节等节庆节点,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组织民族政策法规知识竞赛、宣传先进典型等形式宣传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和民族法律法规,积极传递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好声音。三是用好国民教育资源,促进各民族学生相互沟通、交流学习、共同进步。坚持把民族团结进步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纳入中小学校课程体系,组织开展民族知识启蒙、民族理论实践教育,构建中小学校传承与发展民族民间文化课程体系,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学生心灵。例如,县民族小学突出“和美、瑶韵、灵秀”特色,推动民间艺人进校传授刺绣等传统文化技艺,组建“飞越彩虹·瑶族童声合唱团”,通过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促进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种子深深埋入每一个学生的心底。四是用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促进各民族高度认同中华文化。建好金秀瑶族博物馆,挖掘、传承和保护传统村

落、瑶族医药、石牌习俗等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保证了中华文化这棵大树根深干壮、枝繁叶茂,并在其中铸就了各民族文化发展的新高峰。

(五)必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和国家法律法规实施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党和国家在国家结构形式上的一个制度安排,是基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党领导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历史经验总结而创设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同向而行。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区域自治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制度保障,在此框架之内的民族团结进步体现为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基本国情的把握和制度设计。“一体”主要体现为国家统一领导,强调团结统一;“多元”主要为建立民族自治地方,依法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重视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对少数民族特殊感受的观照,充分激发少数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金秀通过坚持统一与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相结合,在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和国家法律法规实施的基础上,依法行使自治权,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在制度上保证了各民族政治平等的权利,较好地处理了县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激发了各民族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各民族当家作主的自豪感、自信心不断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不断深厚牢固。用好上级有关部门给予自治县的县庆项目建设专项资金,切实把庆祝、纪念活动办成总结自治县发展和建设成就与经验,宣传党的民族理论政策,为各族群众办实事的重要载体,让各族群众切身感受到党的关怀和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共同致力于新时代的使命任务。

(六)必须坚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各民族经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以及各民族同化、异化、涵化而形成的。历史上,在中华大地上曾出现过许多民族,这些民族

经过交往交流交融最终形成了今天的56个民族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因此,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而实现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是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根本途径。

新中国成立以前,金秀各民族乃至瑶族内部成员之间是存在民族歧视、压迫和隔阂的,这样的歧视、压迫和隔阂在实践中对中华民族“多元”与“一体”的良性互动以及各民族正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本民族意识关系产生了阻滞作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增进中华民族大团结、推动各民族自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然要求进一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中国成立以来,金秀努力消除历史造成的民族隔阂和封闭,在平等交往的基础上不断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持续深化各民族的相互交融。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经济社会联系的增多,金秀也同全国一样进入了各民族跨区域流动的活跃期,外出务工人员不断增长,与发达地区、城市的联系日益紧密。金秀顺应这样的发展趋势,大力弘扬优良传统,围绕共居、共富、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共维目标,加强对流动人口的教育引导,积极构建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使他们转得出、留得住、富得了、融得进,极大地激活了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金秀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理论启示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13]“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必须以理论创新引领事业发展。”^[14]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形成的,也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演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正确理解、把握和阐释好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呈现的新变化新特点新趋势,讲清楚蕴含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引导各族人民自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夯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是理论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重要发源地,金秀民族团结进步的理论启示价值无疑是积极和重要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

(一)正确理解和把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基础

习近平指出,“我国五十六个民族是历史形成的客观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存在”^{[12][47]},“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12][49]}。我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就是基于这样的客观存在而展开的,正确理解和把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基础。

金秀瑶族是在明朝洪武初年之后,陆续从湖南、广东等地迁徙而来的,无论是在迁入的地点、时间,还是语言、风俗习惯,以及生产资料占有、社会地位等方面都具有差异性。但是,为了生存,迁徙到此的人们团结起来,建立起一个共同遵守的秩序,成为一个具有民族认同意识的共同体,成了一个多元一体的雏形^{[4][52]}。党在促进金秀民族团结进步过程中,充分认识到这一“多元一体”的特点,在制定实施民族政策时既强调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和国家法律法规实施,又根据金秀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实施差异化的区域政策;在处理民族身份认同时既注意瑶族等民族的情感和心理,又突出中华民族的形象,强调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繁荣发展文化事业时既强调中华文化的整体性,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又根据本地区本民族的特点,传承和发展好瑶族等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推动改革发展事业时既重视物质的经济基础作用,又强调精神的上层建筑作用,以系统思维统筹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正是这样的正确认知和统筹兼顾,消除了历史遗留下来的影响金秀民族团结进步的不和谐因素,实现了各民族关系和民族意识质的飞跃,造就了新中国民族团结的“金秀经验”^[8]。

(二)中华民族从“多元”聚为“一体”具有规律性

金秀民族团结进步的成就,是正确处理“多元”与“一体”关系的生动体现。分析其过程,可以考察中华民族从“多元”聚为“一体”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规律。

第一,金秀各民族从“多元”聚为“一体”是一个

转换生成的演进过程。新中国成立之前,金秀各民族特别是瑶族存在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一的瑶族认同和基于既往不平等社会意识形态和生产资料分配不均衡而形成的民族隔阂三种意识。新中国成立初期,金秀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充分的协商沟通,大家摒弃前嫌,实现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各民族的民族意识进一步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各族人民心中茁壮成长。改革开放之后,金秀从封闭走向开放,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密切。党的十八大以来,各族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团结奋斗,与全国人民一道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飞跃,民族团结、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的基础更加牢固。党中央提出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之后,金秀党委、政府领导各族人民聚焦“主题+载体”推动各民族共同落实党的民族政策,聚焦“共同+特色”推动各民族共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聚焦“民生+产业”推动各民族共同创造美好生活,聚焦“绿色+发展”推动各民族共同建设美丽家园,聚焦“法治+德治+自治”推动各民族共同维护平安和谐,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如磐石,大瑶山民族团结之花越开越艳丽。可见,中华民族从“多元”聚为“一体”并实现良性互动,是各族人民有效调适民族意识,促进本民族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谐对接的结果。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先从整体上把握民族意识的生成规律,再切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和演进过程,结合民族社会相关问题,精准契合我国56个民族的心理认同实际,找到各族人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公约数”,画好最大同心圆。

第二,金秀各民族从“多元”聚为“一体”过程并不是单线的,而是一个链性迭代过程。由于每一个人都同时具有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因而在其生产生活空间中同样存在由社区链、组织链、群体链等为主要内容的立体布局的社会网络。居住在金秀的各族群众,虽然在语言、风俗习惯等领域存在着不同,但是

每一个民族及其成员在与其他民族和成员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必然会发生思想、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碰撞、转化,在微观、中观和宏观等多层面多节点以链性迭代的方式发生交融涵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各民族交融涵化的主流是形成新的共识,拉近彼此的距离,增进彼此的团结,推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更壮实。

第三,金秀民族团结进步的成就是坚持“多元”“一体”辩证统一,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基于多元一体格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树立系统思维,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包容力,在充分激活各民族多元活力的同时,紧紧抓住各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焦点,努力延伸同心圆的半径。具体到辩证处理“多元”“一体”实践,既不能只强调中华民族的认同,只讲一体而忽视多元的客观存在;也不能只强调各民族的认同,自外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最大同心圆背道而驰。要正确处理共同性和差异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物质和精神关系,让各民族文化上兼收并蓄的包容性更强、经济上相互依存的程度更深入、情感上相互亲近的基础更厚实、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更强劲,推动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深深扎根在各族人民的心田。

(三)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根植于中华大地

关于解决民族问题特别是在国家结构形式选择问题上,曾有不同的理论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并在社会上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把持续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并在此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党关于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系列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观点是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结果,根植于中华大地。

早在 20 世纪初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根据中国的实际积极探索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20 世纪 80 年代中华民族多元

一体格局理论提出后,人们对中华民族的理解和认识进一步深化。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后,这一理论在政治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2000 年江泽民在《共同构筑面向新世纪的中美关系》中指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特征,展现了中国各民族文化的绚丽色彩。”^[15]2005 年胡锦涛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16]。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先后在 2014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等多个场合论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基本图景和历史演进。2021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要求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突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一体性和共同性。

金秀民族团结进步在这一问题上的理论启示,正如费孝通所言:“过去因为民族不平等,汉族压力太大,少数民族不得不以关闭为主;现在民族平等了,少数民族要发展,必须与先进的汉族合作。这个弯子怎么转?这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很多问题。我们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也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各民族在这个从关闭到开放、从对抗到合作的过程中发生的问题也不可能一致。我们应当找出各种模式。我想,瑶族这个民族有它的特点,可以作为一个类型来进行研究。”^[17]^[43]金秀的民族团结进步表明,不管是各民族,还是瑶族内部各成员,人们在多元一体格局问题上已形成共识。特别是瑶族,各成员对外都以“瑶族”作为族别身份标识,同时这一身份认同丝毫没有影响和妨碍他们保留和尊重包容彼此的优秀传统文化,大家心连心、一家亲,共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了共同的理想团结奋斗。这一过程,证明了基于多元一体格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科学性,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路径借鉴,具有积极的理论启示价值。

综上所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历史演进的结果,亦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演进。金秀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重要发源地,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成功实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生动实践,既尊重各民族认同的多层次性,又注重把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

意识和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作为各民族共同的价值追求,不断厚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础,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同时,为新时代新征程推动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积极的经验和启示。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重大方略要求,总结好运用好发展好民族团结进步的成功经验,扎实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奋力谱写民族团结进步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 [1] 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N].人民日报,2023-12-16(1).
- [2]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9-28(2).
- [3]习近平在新疆考察时强调 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美好新疆[J].中国民族,2022(7).
- [4]费孝通.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新编:下卷[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 [5]费孝通.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新编:上卷[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 [6]周大鸣.从瑶族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1).
- [7]金秀瑶族自治县 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EB/OL].(2021-06-10)[2022-11-23].
<http://www.jinxiu.gov.cn/sjfb/tjgb/t11101673.shtml>.
- [8]何文钜,许立坤.中国民族团结的“金秀经验”——兼谈广西“金秀经验”对中华民族认同建构的启示[J].广西民族研究,2011(1).
- [9]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 1 册[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21.
- [10]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J].中国民族,2014(10).
- [11]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1-08-29(1).
-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 [13]本书编写组.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2:14.
- [14]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1:25.
- [15]江泽民.共同构筑面向新世纪的中美关系——在纽约美友好团体举行的午餐会上的演讲[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00(32).
- [16]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民族工作文献选编:2003—200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72.

责任编辑:许立坤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内涵要义与价值意蕴

钟周铭

(重庆工商大学,重庆 400067)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有着丰富的理论来源、科学的内涵要义与多重维度的价值意蕴。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由马克思主义奠定理论基石,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筑文化底蕴,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一以贯之的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围绕发展为了谁、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共享的基本问题,形成了多层次、多方位增进民生福祉的内涵要义。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有着深厚的价值意蕴,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本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理论来源;内涵要义;价值意蕴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4.01.003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4)01-0025-06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视人民为历史的创造者和真正的英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始,便牢固树立起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为使命。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使得历史和人民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1][2]}。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有着极为丰富的理论来源、精准科学的内涵要义与多重维度的价值意蕴。深刻思考并认清这些基本问题,对从理论层面全面把握

这一重要的发展思想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也对从实践层面推动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有着极为丰富的理论来源,它由马克思主义奠定理论基石,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筑文化底蕴,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一以贯之的理念。

(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理念奠定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理论基石

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的逻辑

收稿日期:2023-11-18

基金项目:202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1BDJ084);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23NDYB171)。

作者简介:钟周铭,男,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重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

起点与最终归宿。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黑格尔等人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强调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和占据主体地位的是人民群众而不是英雄人物。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鲜明地提出了历史活动是群众事业的观点，强调人民在历史发展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完善了人民性理念，系统阐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唯物史观，强调“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2]。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物质生产实践也好，精神财富创造也罢，都离不开现实的、鲜活的人。在历史前进的车轮中，人民群众始终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观，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始，就在工作的方方面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党的根本利益目标而言，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践行了《共产党宣言》中“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3]的唯物史观，确立了“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4]的基本准则。在党的革命、建设、改革不同时期，党始终把为人民群众谋幸福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党和国家的发展目标同满足人民的实际需求有机地结合起来。从党的根本政治立场而言，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从而形成了党的群众路线。此后，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积极配合，成了党百余年来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强大动力。从党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言，中国共产党充分肯定人民是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时刻做到以人民为中心，自觉肩负起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初心使命。在具体的工作中，广大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深入群众，广泛听取人民心声，并以此作为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构筑起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文化底蕴

民本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早在先秦时期，这一思想便已照耀中华大地。《尚书·五子之歌》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揭示了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只有百姓稳固了，国家才能安宁的重要道理。诸子百家尤其是儒家，把民本思想上升到治国理政的新高度，强调执政者应当重民、安民，把人民放在首要位置，这样国家才能成为强国，君主才能成为明君。孔子在《论语·颜渊》中强调仁者要“爱人”，因为“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章》）。孔子明确提出了仁政和德政的理念，主张执政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这样就会形成“天下之民归心”（《论语·尧曰》）的良好局面，人民才会衷心拥护，才会愿意为国家付出。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民本思想，更为直接地喊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主张，将人民放到了国家和君主的前面。孟子告诫执政者，要“泽加于民”（《孟子·尽心上》），政治的根本保障在于民心支持。荀子“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的思想，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色彩，强调了人在改造自然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肯定了人的主体地位。道家、墨家、农家、杂家等学派，都从自身的学说体系出发，阐述了民本思想的价值理念。

秦汉时期，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在《春秋繁露》一书中，董仲舒指出“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其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以“天人感应”的理论构架，揭示出人民的重要性。秦汉以后，民本思想逐渐定型，成为历代王朝统治者和士大夫群体的重要治国理念，如唐太宗“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论政体》），黄宗羲“天下为主，君为客”（《明夷待访录·原君》），都是这一思想的重要体现。一些推崇儒家民本思想的士大夫，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心系民生疾苦，敢于同侵害百姓权益的势力作斗争。这种“为民请命”的民本思想不断内化为历代王朝士大夫的从政精神，流传久远。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的封建君主专制体系下，民本思想主要起到的是维护社会稳定、巩固统治地位的作用，而非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中华民族的千秋伟业，将人

民置于发展的核心位置，把人视为国家最重要的资源。习近平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5]这一重要思想，系统阐述了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是人民的政权，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无疑是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扬弃、发展与超越，体现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初心与使命。

（三）党坚守初心使命的历史实践丰富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实践基础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一个国家发展的根本保证和不竭动力源泉是人民群众。人类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表明，创造历史的主体是人民，人民才是时代潮流中真正的英雄。党坚守初心使命的实践历史，就是一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史。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的奋斗历程中，一直将人民放在首要位置，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百余年间，中国共产党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和走向，使得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使得人民群众逐渐过上了幸福安康的生活。回顾党百余年的奋斗历程，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取得的一系列重大历史性成就，都是党不断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结果。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既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经验总结，也为新时代新征程继续践行这一思想提供了方法路径。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肯定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6]。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关键原因之一就是团结并依靠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所以冠以“人民”两字，反映出来的正是党领导人民群众战胜了国内外反动派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壮举。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民主形式不断丰富，民主渠道不断拓宽，民主体制不断完善，人民参政议政日益规范有序，广大人民群众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梦想，成了国家的主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高度肯定人民群众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他以农村改革为例，指出“好多东西，都是基

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7]。安徽凤阳小岗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由初步尝试后迅速发展，最终上升为当时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一方面证明了人民群众无穷无尽的智慧，善于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并努力解决问题，另一方面说明我们党十分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善于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毛泽东、邓小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在具体的治国理政中密切联系群众，坚持人民至上根本立场，使得党和国家事业兴隆旺盛、蒸蒸日上。江泽民指出：“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8]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一切工作成效由人民群众来检验，强调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都要由人民来参与和共享。胡锦涛强调，我们党必须“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不断实现民利”^[9]，要始终贯彻好党的群众路线。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秉承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领导人民群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新的伟大成就。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指出：“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10]党领导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只有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将初心和使命融入国家建设的方方面面，才能赢得民心民意、汇集民智民力。

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内涵要义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坚持人民立场这一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围绕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的基本理念，形成了多层次、多方位着力增进民生福祉的内涵要义。

（一）发展目标：一切为了人民，立足新的历史起点，顺应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盼

纵观古今中外，任何国家要实现长治久安，必须搞清楚发展的目标是为了谁。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树立了同人民共呼吸、同命运、心连心的信

仰。坚持为人民多干事、干好事、干实事的根本立场，是千千万万中国共产党人不懈努力的奋斗方向。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明确指出“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10]，清晰地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目标导向。

立足新时代伟大变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了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提出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新要求。共同富裕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中国共产党始终认为，人民是共同富裕的享受者，更是共同富裕的创造者，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的殷切期盼。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实际国情，科学制定了分步走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目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制定了一系列建设规划，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全民共同富裕，更为注重社会的公平正义；坚持区域和城乡协同发展，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丰富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辩证统一，在加快物质建设的同时，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指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共同富裕取得新成效。”^[11] 新时代新征程，要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继续将国家的发展目标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机地结合起来，紧紧抓住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充分吸收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让人民群众满意成为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底色。

(二)发展动力：一切依靠人民，深刻认识和把握人民群众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力量源泉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中国共产党一百余年的奋进历程，就是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美好生活而奋斗的历程。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人民”二字镌刻在光辉的旗帜上。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中国共产党始终相信人民群众，紧紧依靠人民群众。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指出：“我们党团

结带领人民，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12]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作为党和国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源头活水，人民群众对于国家建设的参与程度，直接影响着国家发展的深度和广度。要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在施政过程中倾听民声、尊重民意、汇聚民智、解决民忧，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只有牢固树立坚持发展必须依靠人民力量，国家建设成果必须由全体人民共享的理念，良治之道才能在广袤的中国根深叶茂、本固枝荣。正如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所言：“只要我们深深扎根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就可以获得无穷的力量，风雨无阻，奋勇向前。”^[13] 要将中国式现代化国家建设成效的评价权力交付给人民，将人民的满意度、支持度作为衡量国家建设水平最重要参考因素。当前，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蓝图的号角已经吹响。复兴的道路上危和机并存，但危可转机，把蓝图变为现实，就需要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始终相信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不断团结奋斗、矢志前行。

(三)价值取向：坚持发展路径共建共享，把做大的“蛋糕”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习近平强调，“坚持全面保障和改善民生”“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14]。坚持国家建设的首要目的是不断提升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因此，在实现人民共同期盼方面，要精准研判、科学部署，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矛盾和顽固问题，下大力气、花真功夫，在抓热点、攻难点、去痛点的过程中，牢牢把握住人民性这一根本要点。

发展理念是否正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发展的最终成效。对此，习近平强调，“发展的目的是造福人民。要让发展更加平衡，让发展机会更加均等、发展成果人人共享”^[15]，科学回答了国家建设“为了谁”这一根本问题，展现出明确的价值取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和追求,是人民的共同心愿和奋斗目标,涉及每个人的切实利益。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通过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充分保障人民权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要始终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做大的“蛋糕”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习近平强调:“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13]只有人民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评价主体,只有人民才是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最大受益人。目前,国内发展形势总体平稳向好,但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依然突出。要继续秉承在发展中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理念,畅通向上流动通道,创造就业机会,增加致富机会,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扩大“蛋糕”的规模。要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包容性,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区域发展的平衡性,解决好分配“蛋糕”这一关键问题。

三、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价值意蕴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有着深厚的价值意蕴,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本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而非少数英雄人物,强调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审视历史发展的系列问题。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制定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的发展计划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马克思主义不是简单的、一成不变的理论体系,而是因时而新、顺势而为、不断发展的具有开放性和时代性特征的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将群众路线贯彻于党治国理政以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新时代新征程,要继续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将人民群众视作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和拥有者,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和评判者,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和主导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观察时代、分析时代,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落实到党的各项具体工作中,把人民群众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体力量。

(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本质

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主体和力量源泉。习近平指出:“我们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都是人民根本意志的反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14]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党的各项建设取得成效的目标所向和价值依归。人民群众的拥护与否直接关系党的事业发展,人民群众的立场决定党的力量来源之多寡。新时代新征程要求中国共产党人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人民满意”为标准,通过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稳步提升人民的参与感、获得感、幸福感,进一步牢固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程中,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牢牢把握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价值理念,把满足人民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求,不折不扣地落实到国家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各领域。要通过改革发展将人们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美好向往落到实处,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勇于反思、勇于变革、勇于创新、勇于实践,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彰显党的执政本质。

(三)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大地战乱频繁,中华民族风雨飘摇,饱经沧桑的中国人民千辛万苦、无时无刻不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视为最伟大的梦想。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逐步改

变了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并引领中国这艘巨轮劈波斩浪、开拓前进，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习近平指出，“我们必须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15]；“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16]。习近平的这些重要论述，指明了新时代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路径。人民群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归根到底是为了让人民群众能生活在一个经济富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公平、生态良好的伟大时代中，让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加美好、更为和谐。“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17]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始终是一致的。我们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着眼于人民群众的新需求新期盼，做实各项工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646.
- [10]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 中国人民生活一定会一年更比一年好[N].人民日报，2017-10-26(2).
-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28.
- [12]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J].求是，2020(24).
- [1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70.
- [1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47.
- [15]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2).

责任编辑：刘菊香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52.
- [3]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39.
- [4]中国共产党章程[N].人民日报，2022-10-27(2).
- [5]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N].人民日报，2021-02-21(1).
-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31.
- [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2.
- [8]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72.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品格与价值意蕴

潘伟

(广西艺术学院,广西南宁 530022)

摘要: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引。在理论品格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强调价值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彰显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倡导开放性与发展性的统一。在价值意蕴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中华文化繁荣发展提供了科学路径和方法,为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是新时代推动文化强国建设的行动指南。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理论品格;价值意蕴;文化自信;文明交流互鉴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4.01.004

[中图分类号]G120;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4)01-0031-05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经验的理论凝炼,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紧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实际需求,深刻揭示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历史地位、基本遵循、战略目标和行动路径,为肩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有力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和丰富的价值意蕴,为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增强文化自信、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品格

习近平指出:“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1]习近平文化思想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坚持“九个坚持”“两个结合”,明确“十四个强调”,推进“七个着力”,是新时代新征程引领文化建设的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党性与人民性、价值性与科学性、继承性与创新性、开放性与发展性的统一,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理想与责任担当。

(一)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品格深刻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性发展,为新时代文化建设与文化自信提供了理论支撑,标定了文化发展的时代航标。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2]

收稿日期:2023-11-08

基金项目:教育部2021年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21JDSZK127)。

作者简介:潘伟,男,广西艺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理论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强调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认为文化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和工具,是实现人类全面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一思想基于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的基本认识,并将其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相结合,提出一系列新的论断和观点,赋予了文化更加丰富的时代内涵和实践意蕴。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弘扬创新精神,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丰富、先进、开放的时代文化,突出了人民至上的原则,反映出马克思主义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文化工作的基石在人民,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立足人民需求,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持续提高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与此同时,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保证文化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现了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既坚持了人民群众的文化主体地位,又重视加强党的文化领导力和执政能力建设,推动了党性与人民性的高度融合。这为文化工作者和管理者明晰了工作准则,为文化发展奠定理念之基。

(二)强调价值性与科学性相统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3]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以其鲜明的价值追求和科学分析,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文化观点和实践原则,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进行了创新性发展,为新时代中国文化建设增强文化自信提供了根本遵循。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性表现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彰显了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尊重和对人民群众创造力的肯定;科学性则体现在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深入剖析和对实践路径的明确指导,强调价值性与科学性相统一,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将价值追求与科学方法论相结合的理论自觉。在价值取向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突出以人民为中心,将人民的利益和需求置于文化发展的最前沿,不仅体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且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

实践导向,确保了文化建设的社会根基和价值导向。科学方法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立足实际、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方法论。立足实际是对中华文化丰富多彩的现实条件的认知,求真务实是对文化发展现实问题的严肃对待,开拓创新则是对文化前沿领域的不断探索和进取。这种方法论确保了文化建设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实践效果方面,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无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入人心,还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日益完善,或是网络空间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均凸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活力和理论深度。

(三)彰显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继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之上,准确把握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实践动态和时代脉搏,深刻揭示了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与规律,体现了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习近平强调:“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4]这一论断不仅明确了文化发展的根本原则,也为文化创新开辟了广阔的视野。

于继承性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吸纳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丰富元素,如家国情怀、道德修养、生态智慧等,构筑了文化强国建设的坚实基石。习近平对文化传统的尊重与继承,是在继承中创新,于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中追求文化自觉。恩格斯曾言:“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5]在创新性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文化自信与文化创新,倡导文化发展要适应时代需求,推进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这体现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和市场多元化等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还强调维护文化多样性,主张文化交流,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展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深刻洞见。继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特色,既体现了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刻洞察,又展现了对文化复兴的坚定信心。它将中华文化的继承与

时代的创新有机融合,通过文化建设的实践,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民族文化软实力,引领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迈向复兴。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与实践,是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文化自觉的现实回应,体现了对中华文化的深度省思,构建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文化路径。这一思想的深刻内涵和广阔视野,不仅丰富了我们对文化发展的认识,更在个体与集体、传统与创新、本土与世界的交汇中,不断推动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四)倡导开放性与发展性相统一

列宁曾经指出:“不是从纲领原则中,而是从运动已往的步骤和阶段中得出我们的任务。”^[6]这一观点深刻阐明了这样的一个道理,要明晰的未来工作,创造新的辉煌,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历史的表象上,而应深入挖掘历史的发展逻辑,以唯物史观审视过往,找出其中蕴含的规律。习近平文化思想正是在全球化和多极化交织的世界文化大格局中,以其独有的开放性和发展性,明确指出了中国文化繁荣发展的方向,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

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倡文明交流互鉴,主张在维护文化主权的基础上,积极拥抱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7]文化自信不是封闭和僵化的,而应是开放、包容的。中华文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与世界文化进行深入交流,取长补短,相互启迪。在发展性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着眼于文化创新与时代发展的结合,倡导中华文化在传承中实现创新,在创新中促进发展。文化创新是文化发展的关键,文化需要有“高原”,也需要有“高峰”。我们应顺应时代趋势,探索文化发展的新形态、新领域、新模式,让中华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展现出更加灿烂的风采。习近平文化思想倡导开放性与发展性的统一,不仅展现了中国走向文化强国的坚定决心,也强调了文化的内在生命力与发展潜力,积极提升文化对外交流的能力与影响力,推动了本土与外域文化的和谐共生。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引领下,中华文化必将在继承与创新的道路上继续前行,不断实现对自身的超越与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意蕴

习近平文化思想围绕“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谁来建设,为谁建设”等根本问题,全面系统阐述了文化对于国家全面进步的关键作用,强调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性。这一思想不仅深化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也在与世界多元文化的交流中,不断巩固与坚守文化主权,实现文化的创新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有力推动了文化强国建设,深化了文化领域的对外开放,为促进全球文化交融共生指明了进路。

(一)时代价值:引领文化强国建设的行动指南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8]文化发展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强国征程上迈出的坚实步伐。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根本指引,为我们指明了文化强国建设的路向和推动中华文化持续繁荣发展的密钥。这一思想深刻回应了时代的召唤,凝聚了民族的智慧,展现了国家的自信,为新时代的文化发展提供了实践遵循和行动指南。

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了文化自信、文化繁荣、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这一思想明确了文化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强调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社会的灵魂,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在此思想指导下,文化强国建设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内容,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明确指出:“发展文化事业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保障人民文化权益的基本途径。”^[9]习近平文化思想着重强调文化发展必须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揭示了文化建设工作的根本宗旨,也明确了文化发展的重要任务。这就要求我们在文化建设的实践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生活化、现代化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需要,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在实践路径上,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原则,引导

我们在承继传统的基础上寻求创新，在创新中促进发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有机融合，孕育出与时代精神相契合的文化成果。这一思想强调我们既要尊重文化遗产，又要勇于发展当代文化；既要弘扬民族精神，也要广泛吸纳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时代意义，还体现在不断推动文化与经济、政治、科技等领域深度融合，提倡文化创新与科技创新相结合，推动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相贯通，促进文化与社会全面发展相协调。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文化支撑和精神牵引。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们必将开创中华文化发展的新局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文化保障和强大的精神力量。

（二）理论价值：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1]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理论意义上的原创性特质，首先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现代诠释与发展上。习近平综合考量当代全球文化格局与中华文化发展实际，对文化的社会基础、要素特征以及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刻阐释，提出了文化自信、文化繁荣与文化强国的理念，将文化作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性力量，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与社会意识形态关系的内涵，重塑了文化在现代社会建设中的角色与功能。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注重文化在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中的独特作用。习近平文化思想认为，文化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来源，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的必然要求，为文化建设提供了根本导向。习近平文化思想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理论上的突破，面向人的全面发展需求，展示出理论的原创性与时代性。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的关系得到了新的阐释。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文化既是社

会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一思想不仅丰富了文化与社会其他领域关系的理论分析，更为文化在新时代的发展定位提供了全新视角，赋予了文化更为重要的战略地位，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理论上的深度和广度，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内涵，深化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范畴。

（三）实践价值：为中华文化繁荣发展提供了科学路径和方法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实践上不仅为文化强国的宏伟蓝图提供了实践指引，而且为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指明了科学路径。习近平指出：“当高楼大厦在中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2]这深刻表明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同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旨归。文化作为其中的关键性纽带，联结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促进其相互转化、相互协调。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提出了文化发展的基本方略和工作重点。其核心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新时代新征程，我们需要坚持正确的文化发展方向，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与繁荣。这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的深化，也是对世界文化发展趋势的科学回应。具体到实践层面，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提出要加强文化工作体制机制创新，完善文化市场体系，激发文化创新创造的源泉活水。在文化建设的实践中，要持续深化文化工作体制机制改革，增强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建设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现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这既是对现有文化工作体制机制的省思，也是对未来文化发展模式的探索和创新。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文化实践中的应用，还体现在促进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有机衔接上。文化不应只局限于文化领域本身，而应成为全民生活的一部分，融通至经济建设、政治生活、社会治理等各个领域。文化强国建设要与经济强国、教育强国、科技强国等携手同行，形成文化发展和其他领域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文化发展

须顺应时代潮流,结合现实条件,以历史为鉴、以创新为魂,不断孕育出更多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以“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4]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四)世界意义:为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提供理论支撑

习近平强调:“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10]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文化思想高度关注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与对外传播力建设,强调搭建不同文明间交流互鉴的沟通平台。在国际交流日益深化的当下,文化边界正逐渐扩展和进一步融合,各国文化间互动与摩擦愈加频繁。习近平文化思想所倡导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开放,为促进不同文明的平等对话和彼此理解提供了重要遵循。

其一,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平等性的重要性,主张世界各国应秉持文化平等观念,倡导文化平等,尊重不同文化的价值和特色,从而建立起相互理解、和谐共存的国际文化生态。其二,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推动文化交流方面明确了“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原则,强调文明交流互鉴应坚持平等对话、相互尊重、促进共赢。文化交流不应成为文化强制和文化侵略的工具,而应成为增进国与国之间民心相通、相互了解的桥梁。这一原则为国际文化交流提供了有效的行为准则和操作模式,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深度融合和互动发展。在世界文化格局中,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了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战略布局,坚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的开放策略。在坚持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主动吸收各国文化的优秀成果,推动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相互激发和共同进步。这不仅提升了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也为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发展作出了中国贡献。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重要价值,还体现在对全球治理体系的文化贡献上。通过推广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支持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文化秩序,抵制文化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发展。”^[11]在新的世界文化格局下,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世界文

化和平与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尊重、平等交流,有效维护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为各种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提供了对话框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文化方案。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0-15(2).
-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44.
- [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1).
- [4]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
-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64.
- [6]列宁.列宁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10.
- [7]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12-01(2).
- [8]习近平.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9-23(2).
- [9]习近平.坚守初心 共促发展 开启亚太合作新篇章[N].人民日报,2022-11-18(2).
- [10]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N].人民日报,2019-05-16(2).
- [11]习近平.携手共命运 一起向未来[N].人民日报,2022-01-26(2).

责任编辑:许立坤

唯物史观视域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出场、理论价值和实践路径探赜

郭子涵¹,李培锋²

(1.新疆大学,新疆乌鲁木齐 830046;2.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校,新疆乌鲁木齐 830002)

摘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批判、吸收和借鉴人类以往一切积极文明成果,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产物。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过去和现有文明形态的扬弃和创造,是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基石的社会主义文明标志,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与时代要求。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应有之义。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实现人民幸福、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追求,是创造性解决社会发展矛盾的必然结果。新时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路径主要有五个方面,即坚定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秉持交流互鉴立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机融合,坚持“两个结合”,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关键词:人类文明新形态;唯物史观;历史出场;理论价值;实践路径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4.01.005

[中图分类号]B03;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4)01-0036-05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内外形势纷繁复杂,机遇与挑战并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1]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要求,从人类文明视角出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深入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的

建构路径,有助于为世界提供人类文明层面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出场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人类文明实践的理论总结,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我们要创造的新中国是“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2],这就是一种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讲到了“四

收稿日期:2023-10-26

作者简介:郭子涵,女,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李培锋,男,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3]。这一时期对现代化的探索,为新文明提供了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强调“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4],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三步走”战略。1995年,党的十五大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的创新发展。2001年,江泽民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提出,要“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5]。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强调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发展道路,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建设美丽中国,为人类发展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2021年,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正式提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概念,指出在中华民族的历史演进中,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实践中,我们坚持走自己的路,也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奇迹,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为人类文明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经验和启示,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新的智慧和力量。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实践特征。人类文明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从落后到进步的发展过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包括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社会公平正义和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社会文明,以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为宗旨的生态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百年奋斗的辉煌成就,“它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鲜亮底色,‘五个文明’为主体要素,‘以人民为中心’为价值内核,‘中国共产党领导’为鲜明特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治理目标的人类文明新形态”^[6]。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价值

(一)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应有之义

根据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人类文明形态的发展呈现阶段性特征。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在形成的初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影响。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资本主义文明自身所存在的局限性与对抗性。“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7]因此,对抗性在等级森严、阶级分明的资本主义文明中更为突出。这种对抗性使得文明的进步不会让劳动工人致富,而只会让资本家致富。也就是说,生产力进步虽然突破了自然的局限性,却使人的劳动发生异化,陷入新的对抗。根据对资本主义内在局限性与对抗性的分析,可以看出资本逻辑始终统治着资本主义文明,其中的异化劳动不断加剧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对立,从而构成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限度。因此,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形成过程有其鲜明特点,它一方面与资本主义文明相关联,另一方面又与之相对立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性思考,使取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新文明形态的建构成为必然^[8]。这个过程同样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过程。在马克思看来,西方现代化道路既不会使东方各国的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即便现代化进程最先开始于西方社会,也不代表现代化的进程只有这一条路可走,更不代表人类社会发展依赖于固定模式。因此,各民族和国家基于历史、文化和现实等因素,积极借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成功经验,在此基础上合理构建其文明形态和现代化道路的蓝图。中国式现代化批判吸收资本主义文明积极成果,克服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并且展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中,不仅注重实现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同时强调了本土实践的重要性。中国有关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向世界展示了后发现代化国家应当如何从本土实践出发选择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是创造性解决社会发展矛盾的必然结果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基本矛盾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并推动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着特定历史阶段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要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必须深刻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基本矛盾。其中,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就体现在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需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中国式现代化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同时,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实质性需求,并通过高质量的供给来满足生存发展、提高生活质量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三大基本需求。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生,始终尊重自然规律和生态平衡,将人类利益和环境保护融为一体。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以人为本、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基础上,推动构建绿色、低碳、环保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追求,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根本遵循,以实现全世界人民的解放为价值旨归。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无中生有的,而是在实践活动中逐渐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实现人民幸福、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追求

坚持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立场。在实现人民幸福、自由全面发展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注重以人民为中心。这是因为,只有以人民为中心,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人类文明新形态倡导通过公平的社会政策、人权保障和可持续的发展来确保人民的幸福。自由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另一个核心价值观。这种自由不仅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机会,使人们能够充分发挥其潜力,为社会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贡献。人类文明新形态强调自由应当在法治的框架内行使,以确保社会

的秩序和稳定。全面发展意味着每个个体都有机会获得全面的教育,发挥才能,并参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追求强调人类不仅应当有机会获得物质财富,还应该享有文化、社会和政治上的权利。全面发展的理念认为,一个人的成功不仅应该用经济指标来衡量,还应该考虑其对社会的贡献以及其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角色。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核心追求是实现人民的幸福、自由和全面发展。这一理念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方向,强调社会政策、人权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要实现这一目标和追求,需要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全球公民的共同努力,通过合作和协调,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最终现实。

三、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路径

(一)基于文明演进规律:坚定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人类文明演进有其规律,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必须遵循人类文明演进的客观规律。文明演进规律表明,生产力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层矛盾运动机制,它“以生产力变革为根本动力,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9],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内在要求,为人类发展进步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中国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中展现了坚定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重要意义。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传统的国家,中国始终坚定社会主义发展方向,通过改革开放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成功实践证明,坚定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对于实现国家长期稳定和增进人民福祉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推动经济发展、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以及公共服务改善等举措,不断缩小城乡和地区的差距,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全体人民创造了更加公平舒适的生活条件。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体现了对人类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通过积极推动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加强社会保障和教育体系建设,中国不断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为人民创造更加公正的社会环境。因此,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应坚定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二)基于文明交流动力:秉持交流互鉴的立场

“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10]文明交流互鉴有助于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互鉴和共同进步,推动人类文明繁荣发展。中国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中,充分体现了秉持各文明间交流互鉴的重要性。中国拥有悠久文明历史和丰富文化传统,一直以来高度重视文明交流互鉴。中国倡导开展多元、平等和包容的文明对话,积极推动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与合作。中国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旨在通过互利合作和文明交流,推动各国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中国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中注重推动文明交流的创新,通过发展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加强国际人文交流,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借鉴和融合。中国的实践表明,文明交流互鉴不仅有助于传承和发展各国独特的文化传统,也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创新提供了新的动力。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应当深入推进文明交流与互鉴,坚持平等对话、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促进各国文明共同进步和繁荣,为人类文明共同发展作出贡献。

(三)基于矛盾运动规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机融合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需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机融合,实现文明的创新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独特的智慧,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所蕴含的科技、信息等元素有机融合和良性互动,有助于实现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中国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积极推进科技创新和智能发展,将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有机融合。这种有机融合不仅有助于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新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路径。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机融合需要遵循矛盾运动规律。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文化领域也存在着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创新、承袭与突破等矛盾。通过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关系,可以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例如,在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通过现代技术手段进行创新性传播和推广,

可以使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同时,也可以通过研究与挖掘优秀传统文化智慧,为现代智能科技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启示。中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表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有机融合是必要和可行的。这种有机融合既能够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又能够推动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应用,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提供有力支撑。

(四)基于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辩证统一:将“两个结合”贯穿其中

解决重大时代课题是“两个结合”的题中应有之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路径需要基于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辩证统一,将理论与实践相互贯通、相互促进。理论创新提供指导和引领,而实践创新是对理论的验证和升华。中国将两者结合起来,推动人类文明的创新与发展,体现了基于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辩证统一。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内容丰富、博大精深、逻辑严密、系统完整,是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高度统一^[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承继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又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在此过程中,“必然会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均包涵着人类对美好社会的向往”^[12],为中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思想指引和理论支持。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注重实践创新,以实践为基础不断探索和开拓。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我们要增强问题意识,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13]解决实际问题是理论创新的必要条件。例如,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充分释放出来,推动了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的创新发展。中国共产党不仅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还通过实际行动推动国际合作、文明交

流,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积极的范例。基于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辩证统一是中国在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中取得成果的重要因素。理论创新提供了科学指导,使实践更有针对性和有效性;实践创新则对理论进行了检验和完善,使之更加具有科学性和实践性。通过将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相互融合,中国在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中取得了许多成功经验,并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借鉴和启示。总之,基于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辩证统一,坚持“两个结合”,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实践路径。

(五) 基于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主体,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作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根本依靠力量。首先,中国积极培育和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力。通过普及教育、提供创新平台、加强科技研发等举措,鼓励人民群众参与科技创新和文化艺术创作,使广大人民群众成为文明进步的参与者和贡献者。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和智慧在科技、文化、艺术等领域中不断涌现,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其次,注重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建立广泛的社会参与机制,包括基层自治组织等,使人民群众能够参与社会管理和决策,推动社会事务的民主化和公正性。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积极引导和组织人民群众参与各项活动,倾听他们的声音,充分体现了人民的主体地位和参与意识。中国重视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传承和创新中的主体作用,鼓励和引导人民群众参与发展文化产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优秀传统文化等,增强人民群众参与文明建设的参与感和自豪感。总之,基于人民群众是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不可或缺的力量,中国在实践中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和智慧,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且在未来的发展中将继续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和强劲的动力。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1).
-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63.
- [3]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39.
-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9.
- [5]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N].人民日报,2004-09-27(1)
- [6]邱吉,贾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科学内涵[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2(4).
-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04.
- [8]白刚.《资本论》与人类文明新形态[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
- [9]郑丽平.唯物史观视域下的人类文明新形态[J].克拉玛依学刊,2023(1).
- [10]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谈“一带一路”[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14.
- [11]方世南.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J].学术探索,2024(1).
- [12]李少霞,王文东.在“两个结合”中审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发逻辑、鲜明特征与世界贡献[J/OL].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08-06].
<https://doi.org/10.16246/j.cnki.51-1674/c.20230714.001>.

责任编辑:祝远娟

大统战工作格局下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探究

许奕锋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湖南长沙 410016)

摘要: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领域的一项顶层设计,应深入探究互嵌式社会结构,探索实现多民族之间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新办法、新路径,促进各民族良性互动与共同发展。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大统战工作格局下推动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可从战略思维、主体担当、文化建设、心理认同、机制完善、宏阔视野等维度推动各民族深度交融,形成各民族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分布空间和交往格局,在有形有感有效的工作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大统战工作格局;互嵌式社会结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4.01.006

[中图分类号]D633;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4)01-0041-08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1],这明确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路径、要求和使命。习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会议和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等会议上强调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2020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要求“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2]。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是党和国家顺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口流动快速频繁的新形势而提出的民族工作新理念和新要求。应坚持以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基于大统战工作格局,从战略思想、主体担当、文化建设、心理认同、机制完善、宏阔视野等维度推动构建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互嵌式社会结构,并通过制度化手段进行社会结构调适,推动实现各民族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空间分布和交往格局。

一、以战略思维谋划美好的动态图景

在中国,“战略”的概念最早见于晋代司马彪所著的《战略》一书中,当时主要指作战的谋略和方法。不能谋划长远便难以谋划好一时,不能谋划全局便难以谋划好局部,做人做事应具有高瞻远瞩的眼光,看得见未来、长远、全局。一直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战略的研究和安排,善于对全局性、长期性和根

收稿日期:2023-12-10

基金项目:2021年度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2021-GMD-053)。

作者简介:许奕锋,男,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教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党外代表人士统战工作理论湖南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政党制度、统一战线理论。

本性的重大问题进行谋划和决策。李维汉曾指出，统一战线的任务“都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实现当时的战略目标，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社会势力、集团和个人，组织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和建设大军，把敌对势力和困难缩小到最小限度，从而把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地推行前进”^[3]。新形势新挑战新使命给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带来了深远影响。从理论上来看，唯物辩证法和系统论原理为大统战思维提供了方法和理论工具。从广义上讲，党的统一战线包含在建立、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过程中，是一定的社会政治力量（如阶级、阶层、集团、政党、民族等）从长远目的出发制定全局性、根本性的工作谋划和决策。从狭义上讲，党的统一战线指的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建立、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过程中，根据形势发展和统一战线工作需要，对全局性、长期性和根本性重大问题采取的谋划和决策。从整体而言，需要统一战线着眼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战略谋划，以更高的站位、更宽的视野和更新的方式汇聚磅礴力量。大统战思维就是要把统一战线放到党和国家的战略全局中进行系统思辨和总体谋划，实现新时代统一战线理论体系、逻辑思维和实践指向的有机统一，为谋划互嵌式社会结构的动态图景提供理论启迪。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出“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4]，“出台有利于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的政策举措和体制机制”^[5]，强调“完善政策举措，营造环境氛围，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全方位嵌入”^[6]，就是战略思维在民族工作领域的生动体现。当前，互嵌式社会结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民族互嵌的概念与内涵、民族互嵌式社区、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等方面，关于民族互嵌的研究仍存在静态研究较多而动态研究较少的现象^[7]。随着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的结构调整，人口流动趋势越发明显，流动规模不断扩大，民族分布格局和民族关系也在发生深刻变化，更需要以战略思维谋取发展的主动，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第

一，基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目标任务，促进各民族人口流动融居，发挥顶层设计的科学引导、主动引导和有序引导的战略指引作用。第二，完善制度政策，促进各民族包括空间互嵌、经济互嵌、文化互嵌等在内的多维度互嵌。通过政策的激励实现自愿互嵌，通过制度的完善实现交融互嵌，发挥政策制度的引导和保障功能，营造良好的民族互嵌环境和氛围。第三，优化经济结构，夯实民族互嵌的发展基础。发挥市场的整合作用，借用市场的力量促进人际感情的融合，夯实空间互嵌式社会结构建设的经济基础。第四，加强文化建构，形成维系互嵌式社会结构的坚固纽带，促进不同民族在日常生活中进行文化交流，实现文化交流与日常生活交往的有机融合^[7]。以大统战思维建构一种结构稳定、关系和睦的空间环境，不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进而形成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的交往交流交融动态氛围。

二、以主体担当激活共建的多元变量

从理论上讲，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概念并不是关于某种单纯要素的简单概念，而是内在地包含着多种要素及其矛盾关系的复杂概念，即是一个个现实的、社会的、从事感性活动的个人主体，而不仅是“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8]；是个人组成的各个层次群体，这一集体主体超越了个体主体的有限性，是充分尊重个人权利、高扬人的个性、能够实现人的潜能和主体性的集体，也是每个成员利益的联合体；是类主体，强调人是类存在物，以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为根据，摈弃了群体本位和个人本位两个极端性的同时吸收了两者的合理内核，体现了个体与群体的和谐统一；是社会主体，是个人之间联系和关系的有机整体，而不是个人的机械的集合体。在马克思主义主体理论中，个人主体、集体主体、类主体和社会主体这四个层次不能孤立存在，需要在一种结构性依存和功能性依存中健康发展，并使人在诸多存在方式中成为主体性存在和获得主体性存在的意义和价值^[9]。

新时代大统战工作需要正确处理同与异、一致

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可结合个人主体、集体主体、类主体和社会主体从四个层面进行考虑。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统一战线就是不同的社会政治力量这种集体主体为了共同的利益和目标结成的联盟，其实践的社会主体可以体现在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利益共同体和中华民族价值共同体等范畴上。广大统一战线成员需要“中国梦”这一海内外同胞（类主体）团结奋斗的最大公约数作为价值公约数，紧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发挥统一战线具有空前广泛性和包容性的优势与特点，实现大团结大联合。统一战线的价值和目标实现需要统一战线工作部门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作为、创新作为，但又不能仅仅依靠统一战线工作部门，还需要从类主体和社会主体这一层面来考量和发挥广大统一战线成员及社会大众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进而汇聚起最为广泛的主体力量。

当前城市化、信息化和市场化的发展潮流推动着人们进行跨国界、跨种族、跨民族流动，多民族居住和互嵌已经成为一种世界现象。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多民族成员的互嵌式社会结构难免会带来不少困惑和社会治理的难题，对居民关系和基层社会治理形成挑战。西方国家城市曾出现种族或民族背景的移民社区发生骚乱事件，比如1992年美国洛杉矶骚乱、2005年法国巴黎骚乱、2011年英国伦敦托特纳姆区骚乱、2014年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骚乱等，这都需要我们从社会学、政治学、民族学、管理学等学科对民族居住格局的形成原因、作用机制以及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进行分析。在互嵌式社会结构中，人们彼此接触、交往交流交融的机会更多，频率更高，范围更宽。但不可忽视的是，社会化程度越高的互嵌式社会结构，人们之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竞争关系，个人之间既可以是一种“原子化”存在而“老死不相往来”，也可能因为不同的民族文化或地域文化产生文化冲突和发生矛盾纠纷。每一个社会个体，属于一定的社会共同体，并从中获得力量支撑和精神安慰。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就是在利益与精神双重基础上构建民族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的体认中，既有个人主体基于集体主体的体认，也有基于类主

体的体认和社会主体的体认。具体到每个类别的认同程度和认同情况往往各有不同，不同时段也会有所不同。

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需要搭建各民族之间进行交往交流交融的沟通桥梁，提供必要的物质和精神帮助。从大统战工作的主体来看，既需要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结合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的原则和精神制定制度、政策和法规，也需要基层政府、民族工作部门、街道居委会等部门运用这些制度、政策和法规做好服务，为互嵌式社会结构中的各族群众提供一定的物质帮助和满足其交往交流交融的精神需要，同时还需要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组织积极参与，形成相互促动、相互协调、相互信任的协作互动关系，推动建立互嵌式社会结构的多维主体支持系统。既要善于培育一大批知华、友华的国际力量，借助国际交流的媒介和渠道，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民族政策的理解和认同，推动国际社会对中国民族理论进行深入研究，从而促进中外友好交流，为推进建构互嵌式社会结构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也要善于推动并深化多部门联动的大数据共享，为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提供数据参考。为此，要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发挥统战部门的牵头协调作用，建立民族、民政、教育、公安、司法、宣传等部门的联动协同机制。要发挥社区中的统一战线成员作用，推动其善于主动作为，着眼于增进团结、促进和谐、化解矛盾，主动为民族互嵌建言献策、贡献力量，通过先富帮后富、先富带后富等推动实现民族互嵌和共同富裕。

三、以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人文氛围

习近平指出：“中华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根植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10]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仁爱包容、贵和尚中、求同存异、和而不同、自强不息、协和万邦等观念深刻融合于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内涵中。有研究认为，民族互嵌式社区就是指建立在一定的地域基础上，由不同民族成员组成的，多元文化之间平等相处、彼此尊重的社会利益共同体^[11]。英国学者安德鲁·海伍德认为：“公民身份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双方通过交互的

权利和义务而联系在一起。”^[12]各个民族多有自己的包括宗教文化在内的信仰或信仰体系，国家政权与其他民族要给予尊重。但是，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需要各个民族形成统一的国家信念或共同的民族精神从而构建一个共同的信仰体系，任何个别民族的信仰都不能与之相冲突相抵触。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是各民族在相互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创造而形成的文明成果，展现了中华民族唇齿相依、休戚与共、荣辱与共和水乳交融的发展史。要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凝聚对中华民族的向心力，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化为一种价值导向，并形成社会共识，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在实践中，各民族的生活环境、文化习俗有差别。因此，既要尊重包容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也要通过多种方式增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第一，以仁爱思想的浸润汇聚人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仁爱思想，内涵丰富，反映了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时“仁者爱人”的胸怀和态度。大统战工作要善于处理不同群体、不同意见者之间的关系，秉承仁爱精神以达至和谐。就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而言，要以仁爱精神关注各族群众的思想、生活、习惯等，充分考虑并尊重各民族成员的合理需求，包括日常饮食、节庆活动、宗教信仰等。第二，以文化的载体作用夯实交融基础。语言文字是文化的基础要素，对于文化的传承、发展和繁荣具有非常重要的载体作用。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现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具有显著作用，是做好推动形成互嵌式社会结构的固本之举和长久之策。第三，以协和共生思想赋能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习近平指出：“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13]要弘扬好这些价值理念，为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营造浓厚的人文环境。第四，以文化活动搭建交流桥梁。统战工作，归根结底是为了人、服务人、凝聚人和发展人的工作，是党的一项特殊的群众工作。把各行各业、不同群体和不同个体凝聚起来，要尊重、

照顾和维护同盟者的合法利益和合理诉求，重视和维护他们的政治利益和经济、生活等方面合法合理的具体利益。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是以人为中心的，其中文化交流就是一个增进各民族之间了解与尊重、认知与认同的载体和方式，能够为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提供共有文化精神支撑。

值得注意的是，在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中，随着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不断深化，文化认同的需求会更加凸显。这就需要打破相对封闭的民族自我体认，消除复杂交织的文化差异与隔阂。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要考虑在文化层面形成统一的国家信念，构筑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建构一个共同的信仰体系或文化系统，并在这一共同信仰体系或文化系统中不断强化对国家的认同，推动形成互嵌式社会结构的良好文化氛围。

四、以心理认同培育温馨的精神家园

统一战线工作是特殊的群众工作，目的在于争取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阶级、阶层、党派、团体、民族和各界人士等，通过有效的方式和途径把尽可能多的人的行为和力量统一起来。大统战工作，需要了解和掌握广大统一战线成员的认知特点、情感规律、个性特征等心理层面情况，深入研究统一战线成员的心理活动特点，准确把握统一战线成员的心理活动规律，进而提高统一战线工作质效。整体而言，统一战线广大成员的文化水平普遍较高、知识面宽，对社会信息进行分析加工、综合整理的能力强，能够对社会事务形成自身独特的认识和判断。具体到统一战线各个领域，包括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少数民族人士、宗教界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等各个群体的心理特征是不一样的，而且他们心理上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会随着具有时代性因素的社会心理影响而发生变化。因此，需要充分认识到统一战线工作中人的因素，运用心理学探讨统一战线不同工作范围和对象的心理活动和心理特征，拓展新的研究视野^[14]。

从心理学来看，认知结构、情感体验、需要满足以及行为强化是推动互嵌式社会建设的心理基础和

影响因素，构成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心理与情感的运行机理。要以心理认同作为推动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的精神纽带和观察视域，重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民族互嵌中的心理态势，实现各民族在认知结构、认知层次、心理感受、沟通交流、心理干预、行为强化等方面有机结合，从心理认同和情感建设上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促进各民族自觉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一是尊重各族群众的认知结构，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价值理念。个体原有的认知图式决定了其对外部输入的信息进行选择、理解、整合的独特模式，该认知图式是信息能否被接受的决定因素^[15]。作为需要全社会认同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充分考虑各族群众的认知结构和认知特点，通过主动宣传、引导、教育等方式树立起共同价值理念，形成一种不简单依靠外部因素灌输来实现的认知和认同。当前社会思潮多样化与价值观念多元化，需要增强我国民族理论的说服力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影响，不断拓宽理论宣传、引导和教育的渠道，针对各族群众的认知结构特点，结合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理论内涵，“着力打造通融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16]。要使互嵌式社会结构融入促进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情感认同、价值认同、使命认同，可通过媒体、家庭、社会组织等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而促进中华民族认同。二是结合民族交融的心理感受，培育和激发正向的民族情感。互嵌式社会结构建设，同样依赖于各族群众基于某种社会关系、文化观念以及个体心理感受等社会场景而形成的情感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就建立在各民族间互帮互助、荣辱与共的心理情感上。建设互嵌式社会结构，既要考虑作为个体的“自我”感受，也要结合社会群体的角色定位即“群我”的集体情感，实现在既定的社会关系中“自我”与“群我”双重身份的有效兼容，创设一种各民族共生共融的社会公共空间，提升互嵌式社会结构建设的集体认同。可以顺应民族发展的心理建设，加大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增强民族地区自主发展的能力；通过改善民生来实现民族地区的公共服务均等，进而使民族地区的群众不断增强对国家发展

的认同感；通过制度性平台建设，建立多向度的利益表达机制，拓宽多元化的利益表达渠道，缓释互嵌民族的社会压力，促进各民族平等参与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促进良好的社会流动。三是解析各族群众的认同层次，推进各民族互嵌四维建设。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指出：“认同可以是多种共存，它是在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过程中、在情景中构建的，受共同规则的制约和引导，但不可能完全以自我利益为中心。”^[17]由于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历史、风俗和生产生活习惯，在语言、地域和经济等不同的情景中会形成不同的心理认同，也必然会在表现形式上体现差异性或层次性，如在价值观念、审美意识、伦理道德等方面的认识差别等。民族认同的多层次论表明，在民族实体中，所有的归属成分都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有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18]。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需要考虑到各族群众的心理认同是在与社会群体持续互动中获得自我意识的心理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断调整自己以适应所处的环境和所属的社会群体。可从个体认同、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着手，培育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的良好文化基因。四是把握行为强化的作用机理，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聚合力。民族方面的心理认同，往往会随着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的变化而变化。在特定时期，受利益获取等因素的影响，民族认同感会更加强烈。不难发现，民族心理认同与人的知识体系是一样的，是在日常社会、政治、生活和学习中建立的，具有可塑性。可以结合这一特征，为民族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以及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依据^[19]。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需要有共同目标、共同愿景、地位平等、群际合作等方面要求，同时还要有高亲密度、相似兴趣、自愿接触等心理诉求，不断改善群际态度，促进各族群众对其他民族成员的支持与尊重，信任、肯定和积极评价。要采取直接接触、群体内外互动的拓展性接触、观看影视作品的准社会接触等多种方式增进民族间的了解，从而减少偏见，增强相互间的信任度。结合乡村振兴、城乡规划和政府补贴等，优化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合理布局多民族共同

居住的生活环境，合理规划宗教活动场所和民族音乐、歌舞剧院等文化场所，合理配置行政、教育、文化等资源。发挥政策优势，充分吸引外来投资并吸纳少数民族群众就业，引导各族群众形成互嵌式工作、学习、生活环境，并通过各种文体活动和娱乐方式，以一种强有力的主要价值把各族群众凝聚起来。通过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促进各民族语言接触和文化交流，实现民族之间基于方便的语言交流的文化认同，培养各族群众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和法治意识。

五、以机制完善促成常态化的建设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一战线领域的制度建设，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推进了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依法依规依制开展，也形成了在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等方面规范的统一战线运行机制。就当前相关研究成果而言，有学者指出大统战工作机制可以从领导管理机制、宣传引导机制、目标管理机制、组织协调机制、人才培养机制以及制度保障机制等方面着手；也有学者认为大统战工作机制可以建立健全统一战线协调机制、相关部门参与机制、理论研究宣传机制、两支队伍建设机制、评价考核管理机制等。我们可以结合大统战工作运行机制建设，深入探究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的常态化路径，实现各民族交往更加充分、交流更加深入、交融更加深刻的格局。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认为：“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必须先有权威，然后才能对它加以限制。”^[20]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需要建立一种相对稳定的动态运行机制，在民族平等与相互包容的价值指引下推进合作交流，实现各民族多维度的互动建设及有序运行。第一，党建引领机制。党建是民族工作的基础，抓党建促互嵌式社会结构构建，关键就是要把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新思路新策略纳入党的工作整体布局，以党建引领、调动和整合各个方面的民族工作资源。第二，领导协调机制。坚持党的领导是新时代民族工作顺利推进的根本保证，也是民族工作的核心所在、关键所在。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形成相关方面各负其责、协同

配合的工作机制。要明确各级民族工作领导小组的工作职责，注重谋划部署、制度建设、力量整合，充分发挥其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中心、协调监督等方面作用。要突出各级党组织主体责任，精心设计考核指标，加大考核成果运用。要构建协作机制，积极主动争取有关部门的支持配合，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民族工作格局。第三，区域协作机制。民族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有关方面形成合力，共同作为。为破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民族宗教部门要加强与工商联、帮扶企业等之间的联系沟通，推动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区域之间进行合作。第四，整合融合机制。各领域统战工作虽同属统战工作，但工作对象各有不同，其工作思路、内容和方式方法等存在差异，需要建立健全机制，加强系统谋划，以更高站位、更大平台、更宽渠道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第五，宣传引导机制。通过有效的宣传引导，使党和国家的民族方针政策深入人心。统一战线工作部门与宣传部门要做好结合文章或整合文章，共同开展或推进理论研究、教育培训、宣传引导等工作。第六，大数据运行机制。正确处理好互联网技术与民族工作关系，积极、主动和创新运用大数据技术和云技术，打造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云平台。通过创建民族工作大数据工作平台，及时掌握包括各民族流动人口数据、各民族成员教育和就业等方面民族工作的底数，在大数据平台中设置教育引导、联络联谊、创业服务、人才培养、咨政建言等功能，通过大数据平台整合基础信息和活动资源，提升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的工作活力、凝聚力和影响力。第七，人才培养机制。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需要大量的民族工作方面的人才。要通过加强对民族工作人员的培训力度，定期或不定期邀请民族工作领域的领导、专家通过理论报告、实践操练等方式进行培训，提高理论认识水平和实践操作能力。视情组织实地考察和深入调研，组织到民族工作成效好的地方进行调研学习，选拔优秀人才进入民族工作单位，提升民族工作队伍素质。

六、以宏阔视野促进民族关系和谐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统一战线作为“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

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联盟”，其工作范围包括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少数民族人士、宗教界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出国归国留学人员、港澳同胞、台湾同胞以及在大陆的亲属、华侨归侨及侨眷、其他需要联系和团结的人员。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既需要面向国内，也要面向国外，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从其覆盖和影响的领域来看，统一战线不局限于政治领域，已经融入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等领域。统一战线必须立足于“国之大者”，系统谋划、科学部署，切实建立起大统战工作格局。换言之，统一战线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画出最大的同心圆，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加广泛的力量支持”^[21]。大统战工作格局下的统一战线范围更加广泛、对象更加多样、内容更加丰富。从本质上讲，新时代大统战工作格局，就是要着眼统一战线高质量发展，总揽国内外、党内外、体制内外、圆内圆外、线上线下等方面，统筹五大关系各个领域。

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要有世界眼光和世界格局，要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为大目标，积极实现中华民族与世界各个民族的和谐互动，友好交流。针对少部分国家对包括解决中国特色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等在内的统一战线问题仍然存在一定的误解甚至歪曲的情况，要有意识地加大面向国际社会的宣传引导力度，讲好中国制度，宣传好中国政策，帮助他们理解好中国道路，消除误解。要善于统筹好体制内外资源，通过项目化、资源化、社会化平台把涉民族因素的体制外资源吸纳到体制内。要善于做好圆内外工作，加强对统一战线广大成员和相关代表性人士的团结、沟通和引导等。要善于做好网上网下工作，形成新时代民族工作的网上网下同心圆，加强线上互动、线下沟通工作。要善于建立上下联动机制，培养领军人物。在民族工作方面，要培养有重大影响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使之在关键时刻能够站得出顶得上做得好，发挥关键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西方学者认为民族隔离式的社

会结构存在着剥夺生活机会、影响正常社会化、损害社会凝聚、破坏族际关系、引发社会冲突、威胁国家认同等负面影响，不利于社会融合^[22]。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有利于形成多民族共同居住格局，促进民族关系的发展和民族团结的巩固，形成共生共荣的族际居住格局（社会结构），克服民族隔离式社会环境及其负面后果。应当看到，当前我国民族互嵌发生了新的变化，各民族之间的人口流动更加频繁，不断塑造着新的民族聚居或杂居结构。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可以以一种宏阔的大统战工作格局视野，着眼国内外和境内境外，统筹两个大局以及各方面资源，在各民族之间形成社会资源的合理流动与有效配置，确保各民族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和机会，积极推动各民族之间的社会融合^[23]。

如前所述，推动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是党和国家在各民族经济快速发展、民族间跨地区流动快速增加等新形势下提出的民族工作新要求。结合大统战工作格局的时代要求，从战略层面进行顶层设计，从主体层面进行变量激活，从文化层面进行氛围营建，从心理层面进行认同培育，从机制层面进行路径建设，从视野层面进行科学部署，是推进各民族之间在社会结构各领域、各层面相互嵌入和深度交融的多维路径选择，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汇聚磅礴伟力。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9–40.
- [2]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N].人民日报，2021-01-06(1).
- [3]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671.
- [4]要在各族群众中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EB/OL]. (2014-05-29) [2023-11-25].<https://news.12371.cn/2014/05/29/ARTI1401372106551457.shtml>.

- [5]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J].中国民族,2019(10).
- [6]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1-08-29(1).
- [7]杨国庆.历史移民与民族互嵌式村落演进:以咸丰县官坎村为考察点[J].民族论坛,2022(2).
- [8]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05.
- [9]洪波.个人主体·集体主体·类主体·社会主体:解读马克思的主体概念[J].探索,2008(4).
- [10]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1 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170.
- [11]张会龙.论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基本概念、国际经验与建设构想[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1).
- [12] [英]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M].吴勇,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147.
- [13]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 60 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5-16(2).
- [14]唐睿君.中国统一战线工作的政治心理学应用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12.
- [15]胡小琳.论心理认同视域下的政党主导意识形态传播机理与策略[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6(1).
- [16]习近平: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J].党史纵横,2013(10).
- [17]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87.
- [18]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
- [19]任新民,周文.民族心理认同的结构及构建[J].思想战线,2011(6).
- [20]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李盛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8.
- [21]李仁质.关于“大统战”的几点思考[EB/OL].(2017-04-24)[2023-10-11].<https://tzb.mnnu.edu.cn/infot/>
- 责任编辑:张淑瑛
- 1004/1305.htm.
- [22]郝亚明.城市与移民:西方族际居住隔离研究述论[J].民族研究,2012(6).
- [23]郝亚明.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现实背景、理论内涵及实践路径分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3).

扎实推进广西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工作提质增效研究

宾月景,朱良华

(梧州学院,广西梧州 543002)

摘要:高校是党外知识分子集中的领域之一,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阵地。扎实推进广西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工作提质增效是新时代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是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的现实需要,也是广西高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路径。当前,广西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在建言献策中仍然存在内生动力不够大、参政渠道不够多、反馈落实不够好等问题。扎实推进广西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工作提质增效,要加强党的领导,进一步完善平台建设和强化建言献策队伍建设,突出模式创新、狠抓榜样示范,不断完善机制,保障建言献策成果落地见效。

关键词:广西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工作;提质增效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4.01.007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4)01-0049-0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外知识分子工作,习近平就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怎样看待和如何团结引领知识分子等重大问题,为做好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在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性、战略性工作。”^①高校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工作,引领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积极为高校各项事业发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是当前高校统战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应准确把握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新特点,有针对性

地做好思想政治引领工作,引导他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特别要积极推动“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活动进程,支持党外知识分子立足本职工作岗位建功立业,发挥智力优势建言献策,在参与社会实践中受教育、起作用,同心共圆中国梦。

一、扎实推进广西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的时代价值

(一)新时代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习近平深刻指出,“知识分子是生产力的开拓者、文化的创造者、知识的传播者,必须把他们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做党外知识分子工作,不仅要增

收稿日期:2024-01-17

作者简介:宾月景,男,梧州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科技创新、区域经济、统战理论与实践;朱良华,男,梧州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财经经济、人力资源开发。

强责任意识、配强工作力量,还要改进工作方法,学会同党外知识分子打交道特别是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本领”^[1]。高校党外知识分子不仅掌握先进文化知识,而且理论水平高、理解力强、社会影响力大,代表了社会各界不同领域、不同角度的观点和声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可以提供具有专业性、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决策参考,帮助中共地方党委和政府应对新时代发展中的问题挑战,对凝聚社会力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鼓励引导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参与建言献策,有助于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体系,形成广泛参与、多元共治的局面。

(二)开创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新局面的现实需要

2023年12月14日至15日,习近平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努力在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广西上不断取得新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党的十八大以来,广西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围绕深入贯彻落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重大方略要求,积极参与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广西,主动围绕自治区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建言献策,不少成果得到自治区党委、政府以及有关职能部门的高度重视和采纳,在推动全区各项事业发展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广西高校党外知识分子作为全区经济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人才库、智囊团,为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自己的专业智慧。

(三)新时代高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路径

广西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怀,他们坚持原则,实事求是,思想活跃,问题意识强,擅长运用科学方法进行社会调查,调查研究能力较强。他们立足自身专业,能够敏锐地捕捉社会热点,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提案和建议,建言献策水平相对较高,往往能够巧妙地将高校的优势资源有机地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一大批优秀的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受聘担任党的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党风廉政监督员,以及政府部门

的行风监督员、人民法院陪审员等,为助推社会治理现代化作出了积极贡献,具有良好的社会影响力。

二、广西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的特征

广西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在全区党外知识分子群体中占比比较大,集中体现了职称高、学历高、专业性强等鲜明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该群体的整体素质和特殊优势。

(一)群体规模较大,来源比较广泛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统计,2021年全区高校共有教职工9万余人(包括专任教师、教辅人员、行政人员),党外知识分子约4.5万人,其中正高级职称约2887人,副高级职称约6850人。在全区党外知识分子代表人士队伍中,来自高校的党外知识分子占多数。这些知识分子来自不同学科领域、不同学术机构、不同社会领域。由于求学经历和工作环境的多样性,不少广西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属于港、澳、台、侨的家庭成员以及海外留学人员,海外联系广泛。

(二)独立性和自我意识较强,价值观念多元

广西党外知识分子有着较强的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在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中敢于追求创新,注重追求自身的职业发展和学术成就。由于来自不同学科专业领域,他们的价值观呈现多元化的特点。由于文化传统、社会责任感、人生经历等方面的差异和影响,他们在合作交流中能够融汇多元观点,综合思考和解决问题。由于对实现自身价值的渴求和对社会的关注,广西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对社会变革、国家大事表现出积极态度,参与社会事务和建言献策的意愿较强。

(三)参政能力比较突出,社会影响较大

在广西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群体中,许多人不仅担任校级领导职务,还在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任职。他们在政治上有代表性,政治参与的目标层次高,参政议政能力强,社会联系广泛,具有一定影响力。广西的高层次人才和各类科研成果奖励一半以上来自高校,其中党外知识分子是中坚力量。他们积极投身教学、科研以及管理工作,关心学校的改革、建设和发展,将个人的前途与学校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体

现新时代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担当。

三、广西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工作取得的主要成效

(一)建言献策机制不断创新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关于做好新时代高校统一战线工作有关精神,强化党外知识分子的关怀、激励工作,2021年6月,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教育工委联合印发了《广西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激励制度》(以下简称“《制度》”)。《制度》共12条、1个附件,明确将建言献策成果作为申报各系列职称的重要依据,纳入个人专业技术岗位考核、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科研工作成果等工作业绩评价体系,并给予个人适当的精神和物质奖励。此外,每年安排高校统战工作专项经费,并制定相应经费使用制度。该《制度》的出台,进一步激发了全区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的热情,为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汇聚了更为广泛的力量。

(二)建言献策载体日趋丰富

“党委出题、党派调研、政府采纳、部门落实”是广西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大举措。这不仅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以及无党派人士参与政治协商提供了畅通的渠道,也为自治区党委、政府的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在此过程中,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积极发挥“智囊团”作用,对重要领域、重大课题持续跟进,深入研究,及时提出富有针对性、指导性和操作性的对策和建议,切实提升参政议政的层次和水平,在推动广西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每年全国“两会”、自治区“两会”召开期间,广西均组织全区党外知识分子积极建言献策。另外,广西高校还积极牵头组织无党派人士和党外知识分子开展研究,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效果显著,其中2021年的调研课题《新发展阶段广西工业振兴对策研究》获广西第十七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研究报告类一等奖。

(三)建言献策质量持续提高

自治区党委每年举办全区无党派人士和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培训班、无党派代表人士研讨班,注重提

高党外知识分子的理论素质和政策水平,组织党外知识分子学习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理论政策,传承多党合作的优良传统,不断增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识,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性质、地位和历史使命的认识,巩固团结合作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在组织发展中牢牢把握发展范围,着力突出党外知识分子的优势和特色。选调高素质的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到参政议政部门工作,努力锻炼培养建言献策人才。树立精品意识,邀请专家学者进行评审,把高质量的信息报送有关部门。积极选派党外代表人士担任监察委员会、法院、检察院和政府有关部门特约人员。自治区检察院每年邀请党外代表人士参加课题研究,年底邀请统战部门共同听取课题成果汇报,并推动落实。

(四)建言献策成效正在凸显

为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作用,彰显多党合作制度效能,广西探索建立了一系列发挥高校党外知识分子作用的平台和载体,建立中共党员和党外知识分子对话交流机制,党外院士专家与留学人员、广西百名专家服务团常态化智力支持和决策咨询服务机制。广西还成立了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118个,推动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在广西14个设区市和区管本科高校全覆盖,擦亮“广西统一战线专家百人团”品牌,打造“广西统一战线专家百人团”升级版,获全国统战工作实践创新奖。

四、当前广西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内生动力不够大,建言献策意识有待提升

个别党外知识分子由于自身工作任务繁重,在参加社会调研和了解社情民意方面个人能够支配的时间非常有限,导致建言献策质量不够高,提案内容容易被自身的工作思维所局限。一些党外知识分子对参政议政的重要意义和必要性认识比较充分,但建言献策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待提高,同时存在一定认识误区。例如,有的人认为中共人才聚集,建言献策走好形式即可;有的人认为中共对党外知识分子提出的意见建议有时不够重视,采纳不多,反馈不及时,觉得提不提建议无关紧要。

(二)参政渠道不够多,建言献策能力有待提升

高校党外知识分子信息来源渠道较少,主要依靠新闻报道、精神传达和在本职工作中所掌握的信息。例如,为了集聚人才智慧,各地按照中央统战部的部署要求相继成立了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小组,在发挥智囊团作用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包括门槛较高、难以广泛吸纳民意、地区执行力度不一致、工作方式相对滞后等。同时,相关部门信息公开不充分,使得党外知识分子难以及时、准确获取政策信息。此外,一些地区的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对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工作关注不够,导致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在参与政治生活时遇到参政门槛较高、渠道不畅通等一系列问题,他们表达的诉求难以进入有关部门的决策过程。

(三)反馈落实不够好,建言献策成效有待提升

少数信息员与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沟通不够,个别地方是需要信息时才想到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缺乏常态化的沟通途径。高校党外知识分子主要面向固定范围的人群,大多数是行业精英和工作骨干力量,他们与各级信息员接触交流的机会和时间相对欠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高校党外知识分子,不少人缺少与各级信息员接触或合作的机会和经历,个别党外知识分子不清楚应该如何建言献策。还有些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的随意性较大,且不能持之以恒。部分地方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提出的意见建议得不到及时反馈,使他们认为所提意见建议作用不大,建言献策积极性受到影响。

五、扎实推进广西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工作提质增效的对策建议

2022年7月29日至30日,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重要法宝作用,做好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2]。新时代扎实推进广西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工作提质增效,需要综合施策,既要在思想引领方面下功夫,也要在体制机制上进行创新。

(一)加强党的领导,夯实履职尽责组织保障

高度重视党外知识分子,做好政治吸纳和政治

安排,给予政治身份,从而引导他们积极建言献策,发挥参政议政作用。将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工作作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内容,完善“党委出题、党派调研、政府采纳、部门落实”机制,充分发挥自治区教育工委统战部、高校党委统战部作用。由统战部牵头,聚焦以高校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外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坚力量,公开征集各级“两会”议案提案信息,组织召开“议案提案交流讲评会”,主动参与议案提案的现场答复,为意见建议的落地生效提供支持和保障。

(二)完善平台建设,促进建言与业务耦合开展

高校统战部门要将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作为重要平台和抓手,充分发挥其作用,为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参政议政提供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3]。例如,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和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学校为平台,发挥党外知识分子的参谋作用,为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言献策;创新举办高校党外代表人士与职能部门面对面系列恳谈会,邀请职能部门围绕工作重点难点听取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意见建议,打通各级党委及职能部门听取民意新渠道;主动邀请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参与高校中心工作和重要活动,围绕涉及学校(学院)发展以及师生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发表意见建议,等等。可以考虑成立“建言献策工作室”,选拔建言能力突出的青年党外知识分子参加活动,打造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新高地。坚持“党委出题、党派调研、政府采纳、部门落实”的调研模式,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调研工作机制,围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引导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发声、发力。

(三)坚持质量为要,强化建言献策队伍建设

充分发挥高校党外知识分子作为统一战线持续发展的蓄水池作用,加大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力度。要加强建言献策骨干队伍培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物色和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参政议政人才。注重通过基层发现人才,通过团体组织推荐人才,通过各类活动物色人才,将那些“小荷才露尖尖角”的青年才

俊及早纳入视野,及早加强培养,不断充实高校党外知识分子代表人士的源头活水。

(四)突出模式创新,激发建言献策主动意识

将探究符合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特点的建言模式作为重点,团结引领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变“被动参与”为“主动融入”。建立向高校党外知识分子主动征询意见的机制,通过座谈会、答疑会等形式,确保在政策制定阶段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增加政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组织召开交流会议,引导党外知识分子自觉承担工作责任,积极参与学校事务。建立激励制度,针对参政热情高、工作能力突出的党外知识分子,建立专门的培养计划,将表现突出的党外知识分子纳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储备计划,并为其搭建发挥作用的平台。

(五)狠抓榜样示范,带动形成典型引领效应

不少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具有深厚的理论知识、精湛的学术造诣以及扎实的专业素养,具备理性的思辨能力和令人信服的人格魅力,是专家型参政议政人才。从高校党外知识分子中选树出具有杰出贡献、专业素养高、道德品质优秀的榜样,有利于建构理性政治参与的参政结构,也可以让更多的知识分子受到鼓舞和启发。高校可以推广工作室模式,不断展现党外知识分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4]。同时,注重发挥高校党外知识分子人才汇集和专业技术能力强、覆盖广的智力优势,突出统一战线各方面代表人士引领作用,通过“建言信息研讨会”等方式,带动更多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开展国情考察、专题调研、集体研讨等相关工作,在共同实践中激发建言热情,提升建言能力。

(六)完善机制建设,保障建言献策成果落地见效

制定和完善建言献策流程,消除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对相关制度和政策的误解,畅通建言渠道。切实落实建言献策的反馈机制,明确相关部门责任,及时向党外知识分子反馈建言献策采纳情况,并对建言献策成果落实情况进行跟踪,做到“事事有反馈,件件能落实”。有关部门和高校要接受广大党外知识分子的监督,保证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的知情权^[4]。推动

政治参与机制的落实,鼓励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积极参与,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的见解,营造更加积极、开放的参与氛围,并为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的建言献策实践提供必要帮助。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谈统战工作: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EB/OL].(2017-11-22)[2023-12-08].http://cpc.people.com/cn/xuexi/n1/2017/1122/c385476-29660701.html?from=singlemessage&ivk_sa=1024320u.
- [2]习近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J].求是,2024(2).
- [3]刘晓俏.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参政议政影响因素分析[J].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3).
- [4]刘英侠,史晓婷.新时代发挥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民主监督作用的对策[J].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2).

责任编辑:祝远娟

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逻辑与路径

李浩然，王群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 400041)

摘要：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必由之路，应深入理解并系统回答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何以必要”“何以可能”等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唯物辩证观和人民主体理论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理论支撑，而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则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逻辑。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制度设计巩固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民主体地位；通过体系化、多样化、程序化的民主实践安排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民参与国家治理的途径；通过构建全领域、多层次、全要素的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保障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本质要求；逻辑理路；实践进路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4.01.008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4)01-0054-07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论断，并创造性地提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首次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党代会报告的独立章节进行系统全面阐述^①。这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民主政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因此，我们不仅应从政治高度认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

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性，还应从学理上深度挖掘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何”以及“如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当前学界主要从中国式现代化和全过程人民民主分述二者的内在逻辑、现实困境和实践路径问题，将中国式现代化和全过程人民民主“串联”或“嵌入”研究相对薄弱，尤其是从推

收稿日期：2023-11-26

基金项目：2023年度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CYS23760)。

作者简介：李浩然，男，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主与法治；王群，男，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市党建研究所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全过程人民民主。

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审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文明意蕴的研究略显乏力。在现有研究成果中,存量理论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之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意义、内在机理和实践路径等方面的探讨。一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之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意义研究。从学理角度探讨全过程人民民主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文明意蕴,集中表现为政治民主化、政治秩序化、政治效能化和人的现代化^[2],将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现代化的重要表现^[3];从全过程人民民主唤醒现代化力量、维护现代化秩序和激发现代化效能等方面展开论证^[4],亦有从实践维度聚焦全过程人民民主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意义,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展示中国式现代化所需的中国民主新形象^[5],体现中国式现代化政治建设的鲜明特征^[6],为有效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关键制度保障^[7],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动态政治稳定、有序政治发展和有效经济发展局面^[8],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最新实践和强大动力^[9],等等。二是全过程人民民主之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机理研究。从目标任务、领导主体和发展特征勾勒了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联系^[8],以民主和现代化都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书写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功能角色^[10],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党——政府——人民”的主体结构、“吸纳——整合——回应”的运行机制和“协商——决策——反馈”的实践程序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4],等等。三是全过程人民民主之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突出人民主体地位^[11],要紧紧围绕民主本质、科学内核及效能发挥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12],通过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实现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的现代化^[13],以科学决策和民主监督破解超大规模国家治理的难题,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不竭活力^[7],等等。这些论述对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关键是要善于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语境和马克

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引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话语背景。然而,现有存量理论研究在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意义阐述,更偏向从政治文明意蕴或治理功效主义角度进行,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去建构“何以必要”之价值逻辑尚显乏力;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路径分析,更偏向从宏观的党的领导、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和民主监督等方面进行,从具体细致层面剖析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可能”相对欠缺。鉴此,本文在吸收借鉴存量理论研究成果基础上,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新视角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逻辑,从全过程人民民主本身出发的新思维探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以期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在人民群众中形成广泛的价值认同和实践动力,从而更好地将之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动力。

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逻辑理路

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14]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应从党中央重大决策论断中全面理解其核心要义,善于从理论高度深刻把握其内在逻辑,从而更好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深层次因由。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背后“知其所以然”和“知其所必然”之深层规律。

(一)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逻辑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与社会整体现代化产生相互作用的关键在于民主实践。人通过参与民主实践在社会现代化中发挥个体作用,社会又通过民主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的发展。为此,有必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阐释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逻辑。首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社会人口

中占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实践的主体,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这同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前进的过程相一致。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动态的历史演进过程,实际也是由亦必将由人民推动的,且以人民思想观念、行为方式、教育程度、财富分布等方面的现代化为重要基础。易言之,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就是中国人民的现代化。人民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活动受到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要使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切实、有序、有效地发挥作用,就要确保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并建立现代化的民主政治制度和法治秩序。

其次,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社会是处在不断变化和永恒发展中的有机整体和复杂系统。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看,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工业化、都市化、法治化使社会成员逐渐摆脱传统家族本位的束缚和身份等级的限制,加速了社会公众的平等化、均富化、阶层流动化、教育普及化,广大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政治参与、群体自治的呼声和需求越来越高,民主化便伴随而来^[15]。可以说,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内容和标志之一就是民主化,而以科学技术革命为基础的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巨大转变的现代化又为实现民主提供了物质、精神和文化等方面的基础保障。立足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习近平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16][29]}发展人民民主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发展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必由之路。以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之规律性必然。

最后,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论的核心要义是把人民视为历史主体,将国家的一切权力归属于人民。因此,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人民,本质是为了人民。具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主体是人民,受益主体也是人民,人民既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力量源泉,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前进动力。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不仅构

建了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程序体系,而且开辟了多样、畅通、有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实践路径,是广大人民汇集力量、凝聚智慧、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方式和途径^[17],是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回答中国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科学方法和正确答案。

(二)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现实逻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8]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要使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向现代化,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同时我国面临着不平衡不充分的国内发展问题与多重挑战和各种危机交织叠加的国际局势,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因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也绝不是一马平川、朝夕之间就能到达的,需要党带领全体中国人民用无数勤劳的双手去实现,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接力奋斗去到达。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使中国共产党拥有了十四亿多中国人民这个最广泛、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力量源泉,也使十四亿多中国人民拥有了中国共产党这个最坚强、最可靠的领导力量,党同亿万人民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汇全体人民之共识、集全体人民之智慧、聚全体人民之力量,不断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在社会成员中占据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资料的主要生产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并不是某一群人、某一个地区或者某一个民族的单独目标或个体任务,而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一致愿望、集体追求和共同职责,需要全体中华儿女的团结奋斗、共同努力。在

此过程中,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广大人民群众依法通过全面、广泛、畅通、有序的民主渠道和包括投票选举、资政建言、公众监督等多样的民主方式参与现代化建设实践,并坚持新发展理念以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和社会公平正义等问题,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切实保障人民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享有牢固的主体地位、多样的参与途径、公平的分配方式。

三、以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路径

以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从实践运行层面进行系统化的路径构造,在弄懂“何以必要”基础上写好“何以可能”的后半篇文章,可从人民主体地位、人民参与途径、人民共享成果等多个维度进行体系化的路径探析。

(一)全过程人民民主巩固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人民主体地位

人民群众自发或被动的劳动创造是产生历史、改变当下、走向未来的动力基础,人民在这个过程中处于绝对的主体地位。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运动应当是为广大工人阶级和绝大多数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团结力量运动,并创造性提出民主的本质特征就是人民当家作主^[18]。马克思在总结西方代议制民主利弊的基础上提出民主选举、民主管理等民主实践环节,并强调民主决策的重要性,进而形成一种兼具代议民主与直接民主双重属性的民主理论,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但受时代限制,他未曾提出更加系统的民主制度体系和实践体系,也未进行全环节的民主实践。

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脱胎于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并在中华大地上不断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以“全过程”为着力点和落脚点,致力于全链条完善人民民主理论和制度体系,全方位拓展人民有序政治参与渠道,全覆盖保障人民广泛享有民主权利,逐渐构建起多元化、立体式、分层次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形成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在内的中国特色民主形式并

使其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相统一。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使全过程人民民主成为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下的高效率民主、负责任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保障下的有序民主、有效民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之魂,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将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治国理政的政策措施与党和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工作上^{[19][20]};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目的就是依法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人民合法权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能够通过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等确保人民在法治轨道上有序、充分行使各项民主权利,实现了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相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贯彻选举权普遍与选举权平等原则,切实保障选举过程中人人平等、地区平等、民族平等、同票同权;坚持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确保选民依法选举产生人大代表,充分彰显选举的广泛性、真实性;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支持和保证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人民的监督下依法行使立法权、监督权、决定权、任免权,支持和保证各级人大代表集中反映各地各行各业人民的利益诉求与意见建议,确保人民在国家治理各方面各环节依法直接或间接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实现了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相统一。坚持构建并完善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使人民既可以通过以投票为基本方式的选举民主间接参与国家和社会生活的管理与决策,也可以通过以商量为主要形式的协商民主直接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在重大决策之前亲自参与讨论、充分协商,表达自身合理诉求,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19][20]}。如此,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选举民主实现多数人的权利以保障公共利益,通过协商民主保障少数人的权益以协调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使公共政策达成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辩证统一,实现了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

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的”,将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论和民主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人民当家作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制度设计巩固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地位,确保中国式现代化“一切为了人民”。

(二)全过程人民民主拓展人民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途径

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民有所盼、政有所为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追求。政策有无实效、制度是否合理、干部能否尽职、民生改善如何、现代化进程中还存在哪些突出问题以及应当如何解决,广大人民群众是最直接的亲历者,处在实践一线的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只有建立完整的民主制度,才能使人民群众能够集中反映生活中的共性需求和普遍性问题、痛点难点问题、历史遗留民生问题;只有通过多样的民主渠道问需于民,才能了解人民所思所想所盼,把群众急难愁盼的现实问题、真实需求放在心上、抓在手中、落到实处;只有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真正扫清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障碍。

立足新时代,习近平从构建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深刻回答了为何发展人民民主、发展怎样的人民民主及如何发展人民民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开启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新征程。走好新时代“赶考”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将人民民主贯彻落实到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全过程和各方面,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具体而言,就是要确保广大人民群众依法通过民主选举平等行使法定权利、选择信任代表,直接或间接对党和国家重要决策和任命发表意见、对国家大政方针政策提出建议、为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出谋划策;通过民主协商做

到“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借助提案、会议、座谈、论证、听证、评估、咨询等丰富的途径和方式使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发展大事、处理社会治理难事、解决日常生活琐事;通过民主决策传递基层呼声、汇聚群众力量,依靠“小院议事厅”“屋场恳谈会”、线下“圆桌会”和线上“议事群”等与时俱进的基层群众民主决策内容和形式有效保障民主真实管用;通过民主管理有效实现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组织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通过民主监督不断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限制,保障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保证行政权、监察权、审判权、检察权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确保人民和法律赋予的权力始终用于为人民谋幸福。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就必须坚持中国式现代化切实为了人民、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意愿、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贯彻落实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将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激发人民创造力量,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经验,也是新时代推动经济社会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法。只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问计于民,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从人民群众智慧中汲取发展良策,充分释放人民群众在社会变革、生产劳动、学习生活等方面的创造活力,才能将亿万人民的智慧有效转化为促进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极大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民参与途径。

这种以“闭环”制度程序和完整参与实践保证人民切实行使权利的真实民主超越了西方普通民众政治参与被限制在投票选举环节的“缺陷”民主,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下的高效民主与西方多党轮流执政制度下政治博弈所致的低效民主形成鲜明对比。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本质和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相较于日渐暴露出软弱性、低效性和虚伪性的西方资本操纵下的“金钱民主”、精英统治下的

虚假民主逐渐展现出显著优势,有力保障了广大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反映现实问题、表达利益诉求、参与建设实践、推动有序发展,确保中国式现代化“一切依靠人民”。

(三)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果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实现民主政治的形式是丰富多彩的,不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19]。只有将各种包含民主要素、推动民主实现的制度和实践紧密结合、有机衔接,使其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才能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在新时代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全过程人民民主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建构了一个具有全体参与性、制度系统性、实践可行性、环节衔接性、内容丰富性、形式多样性、层次多元性的民主宏大叙事,将涉及人民当家作主的各方面制度和全环节实践囊括其中,开创了一种内涵极其丰富的全领域、全层次、全要素的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的改革和建设,充分发挥其遍布基层一线和深入群众身边的巨大优势,主动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做工人阶级的热心人、青年朋友的引路人、妇女同志的知心人,把广大工人、青年、妇女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动员起来,有效发挥其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发展基层民主,拓宽基层治理渠道,完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健全党领导下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推动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助力乡村振兴;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着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积极构建和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维护广大职工合法权益,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中国共产党坚持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坚定不移走中国式人权发展道路,带领十四亿多中国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新成效;坚持在发展中改善和保障

民生,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卫生体系,大幅改善人民生活环境质量,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全面发展协商民主,完善协商民主体系,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次制度化发展,完善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和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制度,探索建立常态化的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民主协商渠道,构建多元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协商平台和利益整合机制,不断增强全社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协商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加强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深化政治交接,巩固政治共识,提高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能力,鼓励其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真言、谋良策、出实招,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提升政党协商实效;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不断壮大海外侨界爱国友好力量,画出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的最大同心圆,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共享政治发展成果。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并在各项工作中加以体现,保证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参与国家事务管理,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支持宗教团体加强自身建设,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把广大信教群众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习近平指出:“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我们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20]中国共产党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的根本目标,通过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将民主具体体现到治国理政的每一个环节、每一次实践,确保党和国家机关在顶层设计中倾听人民的呼声,在社会治理中回应群众期待,以多种形式保障人民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果,确保中国式现代化“一切造福人民”。

结语

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解决人民现实问题、尊重人

民首创精神、实现人民根本利益是新时代新征程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全过程人民民主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价值和理念转化为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和具体现实的民主实践,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障人民主体地位,汇集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并将其“注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点和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站稳人民立场、彰显民主底蕴贡献真理力量。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1).
- [2]王晗.全过程人民民主之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文明意蕴[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23(3).
- [3]王立胜,李昊天.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J].毛泽东研究,2023(3).
- [4]王亚茹.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韧性的逻辑理路[J].理论导刊,2023(9).
- [5]董树彬.全过程人民民主对中国民主形象的塑造与提升[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12).
- [6]徐艳玲.考量“中国式现代化”的三维向度[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3(1).
- [7]陈雪莲,吕杰.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J].教学与研究,2023(3).
- [8]李笑宇.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定位、功能与发展战略[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
- [9]庞金友,高秀楠.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路径[J].探索,2023(3).
- [10]李锋.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实现路径[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3(3).
- [11]刘俊显,张崇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本内涵、生成逻辑及实践路径[J].理论导刊,2023(4).
- [12]邱需恩.中国式现代化与深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J].理论视野,2022(11).
- [13]唐亚林,周昊.走自己的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演进、路径选择与价值追求[J].理论探讨,2022(5).
- [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875.
- [15]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21.
- [16]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17]王群,李浩然.让“全过程人民民主”成为一种“教育”——兼论全过程人民民主教育体系的构建[J].教育评论,2023(1).
- [1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43.
- [19]习近平.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9-21(2).
- [20]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J].党建,2021(4).

责任编辑:张淑瑛

人民政协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作用与路径研究

——以湖北省宜昌市“协商在一线”为例

姚 薇

(中共宜昌市委党校(宜昌市社会主义学院),湖北宜昌 443009)

摘要:人民政协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场所,是提升全过程人民民主效能的重要载体,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具有独特作用。近年来,宜昌市政协开展的“协商在一线”活动彰显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鲜明特征,是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高质量践行。当前,进一步发挥人民政协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作用,应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优势,通过构筑联动式协商格局、建立规范化的协商机制、锻造高素质协商队伍、培育参与型协商文化,促进协商质量的有效提升和协商效能的全过程释放。

关键词:人民政协;全过程人民民主;“协商在一线”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4.01.009

[中图分类号]D6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4)01-0061-07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是新时代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理论和实践创新的重要成果。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人民政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是我国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也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加强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等功能建设,提高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水平。”^[1]这对于进一步发挥人民政协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作用提出了明确要求。因此,新时代新征程,应立足

人民政协新的历史方位,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独特作用,不断探索人民政协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有效路径。

一、人民政协: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力量

习近平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机构、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2]这是对人民政协性质和重要地位的深刻阐述,这一性

收稿日期:2023-12-27

基金项目:2023年度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统战智库招标课题(ET202301)。

作者简介:姚薇,女,中共宜昌市委党校(宜昌市社会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室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

质和地位决定了人民政协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力量,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具有独特作用。

(一)制度层面:人民政协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安排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有效运行需要科学、系统的制度体系作为支撑。在我国政治制度体系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人民政协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安排。

1.从性质定位看,人民政协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的有机结合,担负着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使命。习近平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2]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的重要论断^[1],这为做好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因此,人民政协作为我国政治制度的伟大创造,充分体现了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的显著特点。这一显著特点使人民政协成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平台,也赋予人民政协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使命。

2.从主要职能看,人民政协具有政治协商、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三项主要职能,体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质特征。通过政治协商,党和国家各项大政方针和经济社会重要政策出台之前,在人民政协广泛协商、凝聚共识;通过参政议政,人民政协广泛参与党委、人大、政府的民主决策和政策执行;通过民主监督,人民政协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对党和政府的决策及其落实情况,以意见、批评和建议等方式开展广泛监督。人民政协的三项主要职能从理论层面彰显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人民性”本质,在实践层面体现了“全过程性”特征。

3.从独特优势看,人民政协在制度设计、组织结

构上具有诸多独特优势,有利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高效运转。一是凝聚共识的政治优势。人民政协具有凝聚共识的重要功能,将凝聚共识贯穿履职全过程,推动以协商达成认同,以认同加强团结。二是平等协商的民主优势。人民政协聚焦协商议政,追求“商”以求同,“协”以成事,营造既畅所欲言又合法依章的良好协商氛围,有利于社会各界人士在民主、平等、真诚的协商中增进共识。三是联系广泛的界别优势。人民政协由界别构成,政协委员是社会各界的代表,代表性强、覆盖广,能够准确反映各阶层、各方面意见和建议。四是协调关系的功能优势。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能够通过大力发扬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更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各个阶层利益诉求、更好协调社会关系、促进社会良政善治。五是人才荟萃的智力优势。人民政协联系着社会各领域、各行业的代表性人士、领军人物,能够汇集更多的有识之士、有力之士、有为之士,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重要力量和智力支撑。

(二)实践层面:人民政协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场所

习近平指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3]人民政协通过协商实现人民民主,政协协商是“在”政协协商而不是“和”政协协商,人民政协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应用场。

1.人民政协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示范地”。协商民主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在协商民主体系中,人民政协协商历史悠久,机制日臻成熟规范,其组织化、制度化、程序化程度高。经过 70 多年的发展,人民政协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协商议事规则,特别在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等方面,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制度体系、工作方法和工作流程,已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能够引领、带动其他形式协商民主的发展。

2.人民政协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训场”。《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规定，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主体包括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各级政协委员达60多万人，涵盖了人民内部的各方面，汇集了社会各行各业的代表人士。因此，人民政协是各党派各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参与国事的重要场所和平台。

3.人民政协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保障链”。人民政协有着巨大的组织架构，构建了立体化的民主实践形式与平台，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完善的组织保障体系。从纵向看，人民政协经过7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涵盖全国、省、市、县等四个层级委员会的3200多个组织。从横向看，各级人民政协打造了政协委员工作室、联络站等各种形式的履职平台。这些集政策宣传、议事协商、反映民意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履职平台，为人民政协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组织保障。

(三)效能层面：人民政协是提升全过程人民民主效能的重要载体

全过程人民民主本质在“民主”，核心在“人民”，关键在“全过程”。人民政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集“协商、监督、参与、合作”于一体。人民政协协商具有专门性、广泛性、包容性等鲜明特色，生动展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质特征。将人民政协的制度优势充分转化为治理优势，提升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治理效能。

1.专门性协商夯实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运行基础。人民政协作为唯一的专门从事协商的机构，与其他协商渠道相比，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专”。对于其他协商渠道而言，协商只是其履行职责的工作方式，而对于人民政协而言，协商贯穿其履职的整个过程，人民政协履职的过程就是协商的过程。因此，人民政协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运行提供了专业化、常态化、全天候的协商平台。

2.广泛性协商拓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领域边界。人民政协协商议题的范围广，不仅包括国家层面大

政方针、法律法规的制定出台，地方层面公共议题、具体事务的决策考量，也包括人民群众“柴米油盐”的烦恼、“衣食住行”的困难、“酸甜苦辣”的倾诉等。协商议题的广泛性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空间扩大到了最大范围。

3.包容性协商彰显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取向。人民政协作为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是化解矛盾和凝聚共识的重要渠道，具有最大限度的政治包容性。政协协商使社会各界充分表达自身意愿诉求，能够达到求同存异、聚同化异的效果，既有利于提升治理效能，又能够齐众心、汇众力、聚众智，促进社会团结，有效避免了由于各种矛盾激化而导致社会撕裂的风险，使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得以彰显。

二、“协商在一线”：人民政协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高质量实践

习近平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4]近年来，湖北省宜昌市政协深入推进“协商在一线”工作，既有效发挥了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功能和作用，又彰显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念，为人民政协特别是基层政协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实践经验借鉴。

(一)规范协商议事流程，在“全链条”的协商实践中体现“最广泛”的民主

“全链条”就是协商程序和流程要“全”，集中体现在协商议事的全流程。“协商在一线”以规范协商议事流程为重点推动“全链条”的民主参与实践，形成了确立协商议题、做好协商调研、确定协商主体、组织协商讨论、报送协商结果的闭环流程。这种协商前、中、后的“全链条”，在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过程中形成了协商议事的完整闭环，充分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1.确定协商议题突出“准”。坚持把党政所思、群众所盼、政协所能作为政协协商选题的总体要求，精准确定协商议题。在具体选题工作中，一方面，围绕宜昌市委、政府中心工作征求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

成员意见,将他们提出的建议纳入年度协商计划草案;另一方面,结合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建议,确定一部分协商议题。经汇总后,报请市委主要领导审阅,以市委办公室文件印发实施。通过“政协选题、党委审题”的形式,实现了协商课题与市委决策部署同频共振、合力合拍。

2.做好协商调研突出“深”。开展协商前,由协商议事召集人组织参与协商人员,围绕议题开展调查研究,倾听民声、反映民意,挖掘矛盾焦点,找到问题症结,开展咨询论证,准确掌握议题有关情况。例如,2022年宜昌市政协将茶产业发展作为重要议题,举全市政协之力,组织开展“协商在一线·委员话茶链”主题活动。全体政协委员历时120多天调研,走访全市9镇26村,与182家茶企业交流座谈,收集意见建议168条,形成1份综合调研报告、5份子课题调研报告,推动解决加工旺季供电不稳、春茶销售难等产业发展难题。

3.确定协商主体突出“全”。根据协商议题需要,突出广泛性、代表性、专业性,既有群众代表、相关部门、利益相关方,也邀请法律、科技等方面的专业人士,还尽量吸收当地的省、市、县政协委员参加。

4.组织协商讨论突出“透”。灵活确定协商的形式、地点、时间,前移阵地、延伸触角,将集中与流动相结合、会议与现场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结合,把协商会开到小区场坝、车间地头,通过开展日常“微协商”,实现基层协商常态化。

5.转化协商结果突出“实”。宜昌市政协高度重视协商成果转化,多项意见建议被纳入相关工作部署。例如,关于以人性化服务落实“双减”,提高中小学生校园生活品质的建议,助推市直部门印发《宜昌市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工作规范(试行)》;关于加大燃气隐患排查的建议,被住建局等部门纳入“三件套”加装(更新)专项行动,惠及70多万户居民;关于全力打造“全市一个停车场”的建议,推动了智慧停车更好赋能便捷出行。协商成果的转化运用让群众看到了共享协商带来的变化、实惠。

(二)搭建协商议事平台,在“全方位”的协商渠道中体现“最真实”的民主

“全方位”就是协商领域和层次要“全”,形成涉及各领域、各层次的全方位协商议事大格局。宜昌市政协构建“点线面”融合的协商议事平台,搭建起委员联系身边群众、界别群众、基层群众的“连心桥”,使协商日常化、生活化地体现在人民群众的政治生活中,确保人民行使民主权利是一种全天候、全景式的真实存在。

1.以委员工作室平台为“点”。委员工作室是一线协商的主要载体。按照“有固定场所、有工作计划、有常态履职、有政协书香、有活动台账、有履职成效”标准,支持有能力、有意愿、有条件的委员建设“委员工作室”,分层次搭建各类委员工作室142个。委员工作室通过广泛开展“走访、微协商、微监督”等活动,打通了委员联系群众的“最后一米”。

2.以“委员 e 家”平台为“线”。“委员 e 家”是宜昌市政协履职的金字品牌之一。“委员 e 家”突出界别特色,开展线上线下互动,扩大了界别群众参与覆盖面,有效解决了协商会议频次有限、会议交流互动不足等问题。2023年以来,“委员 e 家”聚焦“专精特新”企业培育、文创产业发展、加强公交基础设施建设、小区共治共建、“双减”背景下的宜昌义务教育新变化等议题举办了7次活动,吸引13多万人次线上参与,28个部门现场回应,推动了一批重难点问题解决。

3.以“一线协商·共同缔造”平台为“面”。坚持用“一线协商”方法、“共同缔造”理念,依托乡镇(街道)政协活动联络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等现有资源,以“有组织、有制度、有场所、有标识、有活动、有成效”为标准,形成县、乡、村(社区)、村落(小区、园区)的协商层级。在乡镇建立政协联络室,侧重区域协商;在村(社区)建立协商议事室,侧重基层协商;在村落(小区、园区)建立委员工作室,侧重民情协商。通过延伸协商平台,实现了协商议事平台在基层的全覆盖。

(三)聚焦解决民生问题,在“全覆盖”的协商内容中体现“最管用”的民主

“全覆盖”就是协商议题和内容要“全”。宜昌市政协坚持党政工作推进到哪里,政协工作就跟进到哪里,协商民主就开展到哪里,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力求在协商中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关切的问题,让群众看到协商带来的变化、共享协商带来的实惠,体现民主的管用性。

1.紧盯党政工作要事协商议政。各地政协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积极协商、务实建言,将意见建议报送党委、政府,转化为实际决策,在助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展现了政协担当。例如宜昌市政协聚焦建设长江大保护典范城市,运用协商会议、集体提案、大会发言、调研报告、社情民意信息等方式持续建言,推动在全省率先建立长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2.紧盯社会治理难事持续建言。以群众身边、房前屋后的实事小事为切入点,选择一些切口小、够具体、群众有获得感的事开展广泛协商,深入调查研究、精准建言献策,助力解决了一批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例如,宜都市通过“智润两江”一线协商,助力城中心的肠梗阻地块变成规范化停车场,每年为村集体经济创收 15 万元;当阳市政协联组召集五方联席会议,聚焦建安小区基础设施老旧、卫生环境差、停车无序等问题,倾听群众意见,集合群众智慧,与小区居民一道共商解决方法,开展小区环境整治,有效解决了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3.紧盯民生改善实事协商监督。以群众身边、房前屋后的实事小事为切入点,深度参与和助力基层社会治理。2022 年至今,宜昌市各级政协共组织开展一线协商活动 1 046 次,推动解决群众的 1 168 个“急难愁盼”问题。

三、路径优化: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

进一步发挥人民政协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作用,关键在于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

机构作用,不断促进协商质量的有效提升和协商效能的全过程释放。

(一)持续推进融合融通,构筑联动式协商格局

纵向上要做好上级政协对下级政协的指导工作,横向上要加强政协组织间的协调合作,通过联动协商整合各方力量共同参与,进一步凸显协商的整体优势。

1.加强组织领导,推动协商纵深发展。坚持党的领导是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力量源泉,要自觉把党的领导贯穿履职全过程各方面,让党建“软实力”成为履职“硬支撑”。在党建体系上,进一步完善政协党组织体系,优化党支部功能,形成政协党组负总责、机关党组带队伍、机关支部作示范、专委会功能型党支部重引领的党建格局。市、县两级政协党组成员和主席会议成员带头到联系的县(市、区)、乡镇(街道),分片联系指导政协委员开展协商工作。在党建制度上,建立政协党组成员联系功能型党支部、党员委员联系党外委员工作制度,实现功能型党支部联系引导委员全覆盖,政协党组、机关党组联系引导党外委员全覆盖。

2.注重联合联动,促进协商横向延伸。要发挥政协协商的示范带动作用,以市、县两级人民政协协商带动基层协商和社会协商,使基层协商和社会协商能够有序有效持续发展。特别是要将协商延伸到乡村、社区、企业等基层的各个角落,通过在乡镇(街道)、社区(村)设立各种基层协商议事会平台,拓宽政协协商和基层协商、社会协商协调联动的通道,构建起上下贯通、左右相连的多层次、宽领域的协商网络,使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社会协商有效衔接,形成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合力。

3.链接线上线下,扩大协商覆盖范围。要灵活运用现代科技手段,通过技术赋能,拓展人民政协“互联网+”议事平台。在协商活动中融入实时连线、直播互动等形式,实现线上线下互动协商、场内场外联动协商。要在地方各大媒体和政协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开设专栏,以短视频、图文等形式,全面、

立体展示在政协协商中涌现出的典型人物、典型事迹,讲好政协故事,传播政协好声音,扩大政协协商的影响力。

(二)着力聚焦流程再造,建立规范化协商机制

要建立“主题调研——专题协商——效果跟踪”的闭环机制,推动政协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

1.加大调研力度,规范议题选择机制。选题要与党政工作的重点、群众生产生活的难点、基层社会治理的焦点同向同步。因此,要紧扣发展之“要”、紧贴民生之“需”、治理之“难”深入调研,采取党委点题、政府出题、委员荐题、社会征题、调研定题等方式科学合理确定协商议题,切实增强协商的针对性、实效性,确保党委有所呼、政协有所应,党委有所盼、政协有所为。

2.优化协商流程,规范协商运行机制。在程序上,按照主持人介绍情况、群众代表发言、政协委员建言献策、部门负责人现场回应、总结协商活动成效的流程进行。协商活动不设主席台、不设发言席、不安排发言顺序,保证协商主体围绕一个主题畅所欲言、充分表达。在方式上,积极搭建请上来“开门协商”、走下去“现场协商”、连起来“线上协商”平台,打造多场景协商阵地。

3.落实协商成果,规范成果转化机制。建立协商成果转化路线图,对于协商收集到的问题和建议,建立问题清单台账,实行分类分层办理,办理情况和办理结果及时向相关部门和群众反馈,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协商完成后,及时汇总整理协商意见建议,协商成果由政协活动联络组负责向有关方面报告或反馈。按照分级分类处理原则,乡镇活动联络组能解决的,直接协调解决;需县(市、区)活动联络组解决的,与县(市、区)有关部门开展协商助推解决;需要上级层面解决的,通过委员提案、大会发言、社情民意信息等方式向上级反映。

(三)提升委员履职能力,锻造高素质协商队伍

各级政协委员是政协工作的主体,其履职能力

关乎政协形象,直接影响着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发挥。

1.优化委员队伍结构。在当前的政协委员队伍中,有一部分政协委员由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兼任,这些委员被称为“多职务委员”。这是一种履职优势,能够为他们履行职责带来工作便利。但是“身兼数职”会导致他们缺乏足够的时间参与政协协商的相关工作,影响履职效率和效果。因此,一方面,要适当地减少党政部门领导在政协委员队伍中的比重;另一方面,要更多地吸纳一些具有较强参政议政意识和能力的社会成员担任政协委员。

2.注重委员业务能力培训。习近平对新时代政协委员提出了“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的要求^[2],这是对政协委员履职能力、履职担当的明确要求。政协委员要特别注重提升调查研究能力,把调查研究作为履职的前提和基本功,通过躬身实践、实地走访的蹲点调研提升调查研究能力,做到建言建在需要时、议政议到点子上、监督监在关键处。

3.加强对委员履职管理考核。一是完善争先创优机制。要建立委员履职档案,把委员履职情况,包括参加活动、提交提案等情况都录入履职档案,以履职档案作为考核依据,通过晒委员履职“成绩单”“实绩表”等活动评选优秀委员,激励委员实现从“荣誉委员”到“责任委员”的蜕变。二是完善退出机制,对于一些长期不能参加政协组织会议和活动、不履行义务的“挂名”委员、“空头”委员、“哑巴”委员通过必要程序给予通报、告诫、劝退甚至取消委员资格^[3],坚决把“不合格”委员拒之门外。

(四)厚植协商文化底蕴,培育参与型协商文化

文化是一个国家民主发展的深厚根基,也是影响人们行为方式的深层因素。要发展参与型政治文化,厚植协商文化底蕴。

1.坚持“求同存异”的文化传统。“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产生的文化基础,造就了我国源远流

长的政治协商传统。协商的根本在于以“和”的理念、“商”的方式,在化解分歧的对话过程中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实现互利共赢。因此,培育参与型协商文化,就要传承中华民族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政治文化传统,广开言路,汇集民智,充分激发协商智慧,最大限度凝聚共识,为政协履行职能、提高协商实效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

2.提升协商主体的民主素质。没有政治参与,协商就无法进行,协商主体的民主素质直接影响其政治参与的效果。人民群众是民主的实践主体,参与型协商文化的培育有赖于广大人民群众民主意识、民主精神的养成。因此,要通过广泛宣传教育,增强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通过具体生动的民主实践,组织引导人民群众有序进行政治参与,从而培育协商习惯、养成协商自觉,不断提高其民主素养和民主能力。

3.营造“有事好商量”的协商氛围。实践证明,营造能够深度互动、充分表达的协商氛围,有助于实现开门协商、开放协商、充分协商。因此,可以从座位安排、桌子布局等细节着手,创造平等、宽松的协商场景^[6],增强协商会议的互动性,鼓励协商主体多讲话、讲实话,促进不同思想观点的充分表达和深入交流,为“有事好商量”“有事能商量”创造既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又理性有度、合法依章的良好氛围。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2.
- [2]习近平.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J].中国政协,2019(18).
- [3]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6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2(2).
- [4]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不断发

展全过程人民民主[N].人民日报,2021-10-15(2).

[5]李彬.新时代政协委员履职如何提质增效[N].团结报,2020-11-10(3).

[6]吴景双.发挥人民政协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重要作用[N].河北日报,2014-02-24(8).

责任编辑:陆姝彤

新时代加强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研究

梁晓宇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四川成都 610071)

摘要:新时代加强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是加强参政党建设的需要,是坚持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需要,也是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在思想政治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履职能力建设、组织建设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但同时也还存在理论建设相对滞后、队伍建设有待加强、组织建设活力不够、部分制度和机制需要接续优化等问题。新时代加强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应着力发挥好思想政治建设的引领作用、民主党派履职能力建设的核心作用、队伍建设的筑基作用、制度建设的保障作用。

关键词:民主党派;基层组织;自身建设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4.01.010

[中图分类号]D6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4)01-0068-08

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是民主党派组成的最基本单元,是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的基础。新时代新征程,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各民主党派的章程明确了基层组织建设是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明确了基层组织建设的主要任务,即贯彻上级组织决议,组织政治理论学习,围绕经济社会发展中心任务开展调查研究,关心成员的思想状况,做好成员的发展工作等。新时代加强民主党派组织建设,需要进一步明确基层组织建设的内容。2020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明确指出:“各级党委应当支持民主党派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履职能力建

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1]这表明,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可围绕以上五个方面来开展,即以建设政治坚定、组织坚实、履职有力、作风优良、制度健全的高素质高水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为目标,全方位推进自身建设。

一、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意义

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民主党派组织发展的根基。新时代加强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有利于推进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更好地履行职能,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效能,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

收稿日期:2024-01-12

基金项目:202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3BKS046)。

作者简介:梁晓宇,男,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法学博士,四川省党的建设研究智库研究员,九三学社四川省委员会思想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与政党制度建设。

（一）新时代加强参政党建设的需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明确提出了民主党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1]。2018年2月，习近平在与党外人士共迎新春时提出了多党合作“四新”的要求，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多党合作要有新气象，思想共识要有新提高，履职尽责要有新作为，参政党要有新面貌”^[2]。2018年3月，习近平在看望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部分界别委员并参加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和侨联界联组会时，对民主党派提出了“三好”的要求，即“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要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增强责任和担当”^[3]。关于民主党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性质定位和多党合作“四新”“三好”要求的提出，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对多党合作规律的深刻把握。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事关民主党派政治交接，事关新时代参政党建设的质量。

（二）坚持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需要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伟大的政治创造，这一伟大政治创造不是中国共产党一个政党创造出来的，而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中国人民共同创造出来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和发展，这就需要执政党和参政党共同努力，推动执政党建设和参政党建设相互促进。就执政党而言，需要着力加强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就参政党而言，需要通过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参政能力。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是参政党建设的重要内容。夯实基础，需要强化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只有把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任务和职能落到基层，“才能确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得以长期坚持、完善和发展”^[4]。

（三）巩固和发展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需要

“坚持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要历史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纵深推进，在新的经济生产方式的牵领下，

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统一战线面临新挑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发挥统一战线的强大法宝作用。民主党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需要发挥好参政党的组织优势和人才优势，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力。从统一战线的发展历史来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高度重视处理与其他政党的关系，促进政党关系和谐是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新时代新征程，民主党派组织发展要有新气象、新提高、新作为、新面貌。参政党的发展是以组织存在为前提的，民主党派成员是组织的细胞，只有建设好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才能为多党合作事业提供组织保障，为党的统一战线凝聚力量。

二、新时代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的主要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民主党派坚持以中国共产党为师，结合自身实际不断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在各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思想政治建设不断深入

政治的清醒和坚定是一个政党成熟的重要标志。2013年10月起，民主党派开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学习实践活动，广泛凝聚共识。在历时五年的学习实践活动中，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深入学习中共十八大、历次全会精神及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举办了各类报告会、座谈会1.5万场，培训班7000余期，成员32万人次参加”^[5]。在此基础上，各民主党派以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新型政党制度确立70周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5周年等重大节点为契机，深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例如，广东省佛山市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期间，专门成立宣讲团，引导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成员参加“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百姓宣讲活动，面向社会畅谈党史学习心得；很多民主党派成员将思想政治学习体现在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对统一战线、民主党派成员的身份有了更深的认识，民主党派成员的荣誉感和社会责任感也明显增强。又如，中共十九大以来，福建省各民主党派共建成思想教育基地23个，建立

“党(盟、会、社)员之家”331个，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思想政治建设平台渠道更加丰富多样。

(二)制度建设不断完善

民主党派深刻认识到执政党建设与参政党建设相互促进的重大意义和作用，积极借鉴中共党组织建设的经验，结合实际探索出了民主党派成员之家、星级模范支部等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的制度成果。比如，浙江绍兴市柯桥区在全国率先试点，开展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标准化建设工作，实现了“三个一”，即“一笔专项经费、一个专职人员、一间办公场所”。此后，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积极推进标准化建设，基本上实现了学习教育常态化、组织活动经常化、管理监督制度化和履职效能常态化。又如，江苏省江阴市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星级支部”建设实践，聚焦“制度力”完善基层组织制度体系，集中民主党派成员集体智慧，先后制定和完善了日常工作、理论学习、会议、调查研究、党(盟、会、社)费缴纳等规章制度。深圳市从2016年开始，率先启动区级民主党派服务中心建设，服务中心先后经历了初始建设的“1.0版”、标准化建设的“2.0版”和当前品牌化建设的“3.0版”的三个阶段。服务中心的建立和发展，推动了民主党派基层工作规范化，深圳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面貌焕然一新。再如，九三学社唐山市委编印了《九三学社唐山市委基层工作手册》，从量化考核指标、基层组织工作制度等多个方面规范社务工作开展，使基层组织建设有规可依、有章可循。

(三)作风建设进一步加强

作风建设是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关系着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形象，事关民主党派基层组织作用的发挥。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积极引导广大成员大力弘扬民主党派前辈的优良作风，继承和弘扬民主党派老一辈领导人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团结合作的优良传统。在新修订的各民主党派章程中，都将“廉洁奉公”作为基层组织的基本任务之一。比如，民革中央在2022年12月9日修订通过的章程中规定，民革基层党组织要继承和发扬民革优

良传统，教育和监督党员遵纪守法，廉洁奉公；民进中央十五届三次主席会议决定2023年在全会范围内开展“作风建设”主题年活动，各基层组织围绕作风建设的内涵、意义，以建设适应多党合作事业需要的参政党为目标，不断增强作风建设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四)履职能力建设不断深化

民主党派基层组织进一步压实广大成员履责责任，以目标为导向，全面提高社情民意信息报送数量和质量；结合自身实际，积极发挥智力优势，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开展专题调研，并向上级组织和中共统战部门报送课题成果；组织党派成员围绕乡村振兴、城市提质、工业经济、服务业发展、教育高质量发展、基层治理等开展调查研究，为市(区、县)“两会”和有关会议建言献策。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始终把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作为联系人民群众、强化参政议政职能的重要工作，不断探索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方法，充分发挥人才优势，通过广泛动员与精准征集相结合，骨干示范与培养新人相结合，专题培训与分类指导相结合，量化考核与表彰激励相结合的方式，扎实推动社情民意信息工作高效开展并取得了较好成果。比如，民革兰州市委充分发挥“社情民意联系点+‘畅响民声’工作室+法律援助中心”的三位一体的平台，在兰州市建立了17个社情民意联系点，在民革兰州市法工委社服援助中心的基础上，与兰州市市区街道共建共享，定期举办民情咨询会、基层民主协商座谈会等。

(五)组织建设规范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各级统一战线工作部门和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的意见》和相关文件精神科学合理发展民主党派成员，人才队伍得到进一步发展。各级统一战线工作部门每年召开民主党派座谈会2—3次，主要讨论包括民主党派组织发展在内的相关内容，帮助和支持民主党派开展组织发展工作。根据2021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公布的数据，各民主党派成员数

量为 131.83 万人,主要分布在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6]。中共基层党组织在加强党的领导基础上,统筹干部使用政策,对民主党派干部按照“党外干部也是党的干部”的理念和党内干部同标准使用,不断优化党外干部成长路径。

此外,部分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积极开展了跨党派互动。如九三学社合川区工委联合民建合川区委文卫支部开展了主题为“基层文化建设”的组织活动,这种跨党派开展的基层组织活动形式,整合了不同党派的资源,增进了民主党派成员之间的交流,提升了组织凝聚力。

三、当前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面临的困境

(一)理论建设相对滞后

一是民主党派成员学习教育的内容较为单调、形式单一。学习教育大多以开会、听报告、读文件的方式开展,传统方法多,创新手段少。特别是新一代民主党派成员思维活跃,富有探索精神,对改进传统说教式的思想教育方式的要求较为迫切。二是理论教育缺少有效载体和抓手,尚未形成以思想政治建设推动促进各项工作的良好格局。个别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成员还存在理论学习不够全面系统的情况,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战线基本理论、多党合作基本理论方针政策、人民政协理论等没有系统掌握。此外,部分民主党派机关干部在工作中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结合度不高的情况。三是一些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成员对政治理论学习不够重视,对最新的理论政策把握和贯彻落实还不够到位。

(二)队伍建设有待加强

一是领导班子建设合力不够。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领导班子成员具有“兼职化”的特点。一般情况下,民主党派市级组织配备一名专职副主委,其它副主委则为兼职,他们分布在不同行业不同单位。民主党派基层组织领导班子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精力难以集中,班子难以形成合力的现象,这影响着民主党派基层组织领导班子作用的发挥。二是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成员普遍存在“老龄化”现象,组织成员年龄

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

(三)组织建设活力不够

当前,有的各民主党派组织活动存在不均衡和不够严谨的情况,这一点在基层支部组织表现得尤为明显。从组织活动的频率来看,活动开展次数偏少,一些党派基层支部的活动开展缺乏计划和统筹,有被动应付的情况;从活动效果来看,组织生活形式较为单一,特色和创新性不足。此外,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成员个人能力素质和加入民主党派的诉求不尽相同,有的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功利性,“一些党派基层组织为了发展新成员,在吸收新成员加入时,存在不注意把握质量关口,片面追求数量”等情况^[7]。有的成员虽有较强的参政意识,但由于理论政策水平有限,又缺乏实践经验,参政议政水平还有待提高;少数基层组织骨干工作热情减弱,参政意识不强,也影响了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生机活力和参政党作用发挥。

(四)部分制度和机制需要持续优化

一是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管理机制需要完善。在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中,处理日常事务人手不足、组织设置和制度运行不规范等情况较为常见,这制约着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发展。在精细化管理方面,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精细化建设不够,没有明确的工作目标和标准,致使工作目的性弱、随意性大;有的组织职责分工不明确,工作效果不够明显^[8]。在制度运行方面,民主党派日常工作繁杂、分工不明确,容易导致不同成员工作职责交叉重合。

二是干部培养机制需要完善。在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干部培养方面,培养和使用前瞻性不够,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拿帽子找人”的现象;在干部考核激励方面,存在民主党派干部的考核制度和激励措施不健全,民主党派组织与干部所在单位沟通和联动不够等情况。

三是经费保障机制不完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在课题研究、理论建设等方面获得的经费支持有限。要进一步加大科研支持和保障力度,形成参政

党理论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研究的保障机制。

四、新时代加强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的路径

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既是一个基础性工程，也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提高政治站位，系统推进。具体而言，需要发挥好思想政治建设的引领作用，增强政治共识；发挥好履职能力建设的核心作用，增强工作效能；发挥好队伍建设的筑基作用，增强组织活力；发挥好制度建设的保障作用，增强保障力。

(一)发挥好思想政治建设的引领作用

一是根据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要求，增强民主党派成员履职尽责的参政党意识。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成员要正确认识民主党派的参政党属性。我国的八个民主党派称谓不同，有的称作“党”，有的叫“社”，有的则是“盟”，但它们都具有政党的属性，“都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不能用英、美政党的标准来衡量他们”^⑨。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反对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要教育引导民主党派成员认识和理解参政党的概念、属性和要求，加深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形成的历史必然性、伟大的创造性的理解。

二是明确新时代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思想政治建设的主要任务与内容。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思想政治建设的任务和内容主要包括：组织成员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成员深入理解并自觉践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引导民主党派成员正确认识我国国情，准确领会和把握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发挥好自身优势，积极建言献策；加强民主党派历史、多党合作历史等的学习和教育；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三是提升基层组织学习力。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引导民主党派成员深刻理解“两个确立”的重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注重教育培训，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战线理论和方针政策的学习培训。民主党派成员应熟悉党派历史，坚守与中

国共产党的合作初心，弘扬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优良传统，增强社会责任感和政治使命感。

四是增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一要围绕民主党派成员的特点，因材施教、精准施策，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精准化水平。比如针对个别民主党派成员思想认识问题，要善于发现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及时作出正确有效的引导。二要突出党派特色，挖掘本党派的历史文化资源，讲好民主党派故事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故事。三要办好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内部刊物、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宣传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的优良传统，宣传民主党派在各方面工作中取得的成绩，不断增强民主党派成员的荣誉感。

五是加大参政党理论研究力度。要实现执政党和参政党建设相互促进，应与时俱进加强参政党理论研究。目前，参政党理论研究总体上滞后于实践，如对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各民主党派自身建设和履职实践的研究较为薄弱。因此，要将思想宣传工作与参政党理论建设一体推进，深入研究民主党派自身建设规律，持续加强参政党理论建设，形成特点鲜明的参政党文化和参政党理论，为提升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水平和履职能力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二)发挥好履职能力建设的核心作用

一是不断提升政治协商实效性。一要找准角色定位，明确政治责任。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开展的协商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必须切实履行好协商主体责任。民主党派基层组织要充分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的基本职能，积极参与政党协商，切实担负起政党协商参加者、实践者、推动者的政治责任，不断推进政党协商的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二要发挥集体提案作用，提升政治协商效能。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参加政协协商，需要发挥集体智慧联合攻关，可以通过集体提案的形式，充分反映界别群众需求，这是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

提案选题应能够体现党派和界别特色。在提案的办理过程中，要积极参与提案办理情况通报会、协商座谈会和专题面复会等，及时反映意见建议，促进提案高质量落地落实。三要完善协商机制，助推协商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要完善协商知情机制，积极参与中共基层组织开展的协商材料阅读、政策讨论等活动，全方位了解中共基层组织工作重点和工作动态，加强对全局性、前瞻性问题的思考和研究，提升知情明政能力。建立健全专家库，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可根据人才储备情况，建立不同专业类型的专家库，着力培养一支年富力强、老中青结合的政治协商工作专家学者骨干队伍。要完善协商反馈机制，中共基层组织对民主党派在协商中提出的具体建议和意见，要及时研究办理，对于不能办理的或者不能及时办理的要及时与民主党派沟通。

二是不断提升参政议政能力。一要加强调查研究，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在参政议政工作中围绕党和政府中心工作深入调研，提出帮助解决问题的“金点子”，提高参政议政水平。二要充分发挥考核激励作用，每年评选表彰先进集体和个人，对重点课题和协商活动适当安排经费。民主党派成员特别是其中的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要敢于担当，真正认识到参政议政是衡量参政党价值、彰显参政党影响的重要途径。三要创新参政议政方式方法，拓宽党派成员参政议政渠道。要不断学习、了解、掌握专业知识，掌握参政议政的方法、途径、原则，结合当地治理实际，在参政议政中充分运用“互联网+”的思维意识，建立社情民意信息集聚平台，借力大数据分析，做到参政议政到点到位、有理有据。四要优化参政议政工作机制。民主党派基层组织要积极加强与统战部门的联系，完善常态化的党派知情明政机制和对口联系工作机制。建立“传帮带”机制，发挥参政议政经验丰富的党派成员优势，指导年轻党派成员参政议政，帮助他们快速成长。

三是不断提升民主监督水平。一要加强政策支持。制定并细化开展专题民主监督工作的实施方案，明确各级各部门党委主体责任，明确民主监督内容与工作程序，细化保障措施，为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开展监督工作提供政策支持。二要加强协同配合。中共统战部门、各民主党派市（区、县）委会要和承担重要改革任务的地区和部门（单位）建立联系协调机制，明确工作规范，通过定期交流工作情况，加强沟通配合，研究解决民主监督工作中遇到的困难问题。三要加强支撑保障。将各级党委支持民主党派民主监督工作情况纳入年度述职内容和落实《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巡察范畴。

四是不断提升社会服务成效。一要创新社会服务形式。民主党派基层组织要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开设社会服务相关专栏，围绕人民群众所关心的法律常识、家庭教育等内容开展线上授课，因时制宜、创新形式为社会服务增添助力。二要拓宽社会服务渠道。依靠党派基层组织自身优势，谋划开展相关公益活动，组织本党派专家进社区、进乡村、进学校、进企业，参与健康义诊、科普宣传、咨询讲座等公益活动。三要关注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多样化需求，充分尊重不同对象的需求差异，注重分类帮扶。

（三）发挥好队伍建设的筑基作用

一是进一步做好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成员发展工作。一要严把发展成员关。始终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注重吸收参政议政复合型人才；拓宽发展渠道，分年度制定组织发展计划，用足用好发展名额，保持界别特色，积极发展符合党派特色的人士，积极向中共党委推荐优秀的民主党派人才。二要定期对基层组织党派成员结构进行综合分析、研判，有针对性地在重点领域吸纳优秀人才，优化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成员结构。三要完善党派成员档案库。做好民主党派成员的组织关系管理，及时更新党派成员成长动态信息，涉及参与重大活动、职务变动、表彰奖励等重要事项应及时存档，从而全面掌握党派成员的基本情况。

二是突出领导班子建设。一要配优配强民主党派基层组织领导班子。在配备领导班子时要综合考虑、合理搭配,力争选拔出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团结向上、甘于奉献、勇于创新的成员进领导班子队伍。在班子成员搭配上,应综合考虑年龄、专业结构因素,力争形成一个结构合理、高效务实、个性相容的领导班子。二要发挥主委的引领作用。一个优秀的主委,应该具有较强的政治把握能力;协调好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发挥较强的沟通能力;以做党派工作的情怀和乐于奉献精神,熟悉党派工作、了解统战理论方针政策,能够履行基层组织主要负责人的职责。

三是加强代表人士队伍建设。习近平在2022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10]要将民主党派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内容,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民主党派人才队伍建设。针对民主党派代表人士不同成长阶段、不同岗位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跟踪培养,强化教育培训、注重发展培养,完善党外干部成长档案,促进党外干部健康成长。探索建立民主党派代表人士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从政治性、专业性、群众性三个一级指标以及政治表现、工作情况、参政议政、廉政情况等二级指标,在发现、培养、使用、管理全过程对民主党派代表人士实施综合评价。

四是注重后备干部队伍建设。多途径建立健全后备干部人才数据库,根据后备干部能力素质情况,合理安排培养层次,为他们铺设舞台,增强他们的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有计划地安排后备干部参与重大参政议政工作和活动,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和履职能力。

(四)发挥好制度建设的保障作用

制度建设是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中“带有根本性、长期性和保障性的建设,是工作经验的规范和升华”^[11]。要进一步规范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生活、发展成员、推荐干部、述职考核等方面制度,建立理论学习、议事规程、组织发展和内部监督制度等,实现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具体而

言,要进一步完善如下五个方面的制度。

一是完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内部的监督机制。进一步优化完善科学、系统的内部监督管理制度,形成基层组织内部运行良好的内部监督机制,构建全面科学民主的制度体系。不断创新民主党派内部监督的执行保障机制。根据不同党派基层组织的实际情况设立监督委员会,强化专门监督能力建设,重点监督组织运行、活动开展、工作考评等,让内部监督与保障党派成员权利结合起来,保证党派成员享有党派内重要事务的知情权和对不当行为的质询权等。

二是健全完善民主党派机关工作制度。民主党派机关具有服务、协调、联络、参谋的作用,在党派组织整体运行过程中处于枢纽地位。要健全民主党派机关人员考核机制,加快构建科学、系统、具有可操作性的民主党派机关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加强民主党派机关信息化建设,以网络资源共享为基础,坚持问题导向,以提高服务水平为核心,逐步提升信息化水平和办公自动化水平。

三是健全完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活动制度。基层组织是民主党派成员参与党派活动的最基本单位,是党派组织凝聚力的源泉。一要完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定期活动制度,推动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活动常态化、经常化和规范化。二要健全完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活动动态考评激励制度,通过正向激励激发组织成员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对开展活动效果明显、形式新颖、内容健康丰富的要及时肯定,对具有推广示范效应的要及时宣传。

四是完善调查研究制度。新时代民主党派基层组织要围绕当地中共党委和政府工作重点、难点问题积极开展调研活动,切实履行职能。民主党派基层组织职能的发挥与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紧密相连,要根据党派特点,定期开展专题调研,制定和完善民主党派成员参与调研和撰写提案制度,坚持以选准调研题目为切入点,围绕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问题进行建言献策,探索和

完善调研成果转化机制。

五是完善经费保障制度。一要保障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活动场所建设的经费。没有固定的活动场所、经费有限等是困扰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发展的一个问题。活动场所是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开展活动、发挥作用的基本需要，要进一步完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活动阵地的经费保障，解决好基层组织“活动场地无固所”的问题。如，中山市委统战部通过各民主党派市委会与基层组织共同筹备场地和经费，共建立了36个功能不同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党派之家”，作为各基层组织开展活动、举行会议和发展新成员的固定场所。二要保障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理论学习和业务能力提升的经费。统战部门应支持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开展必要的调研、考察、学习培训等工作，给予经费支持，为基层组织建设提供“后勤保障”。三要保障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实践基地建设的经费。近年来，为了拓宽民主党派社会服务渠道，全国各省区市建立了“同心”实践基地、社会实践基地等平台，这些基地的建立是民主党派工作向基层延伸的有效途径。要通过整合资源、加大宣传、共建共享等方式保障基地的正常运转，打造民主党派服务社会的特色品牌。

[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N].人民日报,2021-01-06(1).
- [2]习近平在同党外人士座谈并共迎新春时强调 多党合作要有新气象思想共识要有新提高 履职尽责要有新作为参政党要有新面貌[N].人民日报,2018-02-07(1).
- [3]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界委员时强调 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18-03-05(1).
- [4]江阴市委统战部课题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路径探析——以江苏江阴“星级支部”创建为个案的考察[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4).
- [5]中共中央统战部.伟大的政治创造：中国新型政党制度[M].北京：华文出版社,2022:264.
-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5-9.
- [7]中山市委统战部.推进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的路径研究[J].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1).
- [8]高拴平.新时代参政党自身建设路径研究[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0(1).
- [9]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71.
- [10]本书编写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学习问答[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
- [11]中共中央统战部,等.中国统一战线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33.

责任编辑：张淑瑛

古壮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硕果

——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系列之三

覃彩銮

(广西民族研究中心,广西南宁530028)

摘要:古壮字是壮族及其先民在长期的社会活动中,为便于记事和交流,以汉字为基础,仿照汉字结构和造字法创造的一种民族文字,广泛用于民间记录宗教经文、山歌唱本、长诗、神话故事等。古壮字的发展历史,萌芽于汉、成于唐、兴于宋、盛于明清,成为壮族民间的书面文学用字并传承至今,对壮族文学的发展与传承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古壮字是壮汉文化交流交融的产物和典范,是壮族人民的智慧和创造精神的体现,也是壮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硕果。

关键词:古壮字;壮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4.01.011

[中图分类号]J29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4)01-0076-06

文字是人类用表义符号记录表达信息的方式,是将语言的听觉符号转化为视觉符号的工具。文字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中国是世界上发明和使用文字最早的国家之一,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晚期,中原华夏民族就发明了早期文字——甲骨文,开启了中国象形汉字的先河。西周时期,中原华夏民族在甲骨文的基础上开创了在青铜器上刻铸钟鼎文(也称金文),开启了早期篆体字之先,并且成为周代书体的主流。钟鼎文上承甲骨文,下启秦小篆。战国时期秦国人在钟鼎文的基础上,创制了秦小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便于交流,推行“书同文”政策,统一使用小篆为书写文字,结束了战国以来各诸侯国文字杂乱、交流不便的局面。秦末

至西汉时期,隶书应势而生,成为汉代书体的主流。魏晋时期,在隶书的基础上,创制了更便于书写、字体娟秀的楷书。唐宋时期,在使用楷体字的同时,又出现了宋体字。宋体字于明代成为书写的主体,标志着汉字的完善与成熟。

随着国家的统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加深和教育的发展,作为汉文化重要载体的汉字在民族地区不断传播,学习和掌握汉字的少数民族文人不断增多,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字的产生与发展。壮族古壮字就是在壮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人文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且承载着壮族文化发展的重要使命,是壮族人民的智慧和创新精神的结晶,是壮族与汉族交往交流交融结出的硕果,更是壮汉文

收稿日期:2023-12-10

作者简介:覃彩銮,男,广西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壮族历史文化。

化交流交融的典范。

一、古壮字的创制与使用

古壮字,旧称土俗字、方块字、方块壮字,是历史上壮族及其先民中接受汉文化教育、掌握汉文的文人、民间歌师或摩公(道师、师公),在汉字的基础上,根据汉字的形、音、义的结构,仿照汉字“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造字方法,创造的一种与壮族语言相一致的民族文字,广泛用于记录民间宗教经书、碑碣、讼牒、契约、族谱、信函、记事、歌谣、长诗、剧本、说唱等。2012年出版的《古壮字字典》,收录了10700个古壮字,“其中选择使用较普遍、结构较合理的4918个推荐为正体字,其余同音同义异形的字列为异体字”^[1]。这是广西民族古籍调查整理者从明清至民国时期抄录的讼牒、券约、师公唱本、山歌本、故事传说、族谱、信件和碑文中收集、整理和遴选汇总而成的。正是由于民间保存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使古壮字得以保存下来,展现古壮字的历史面貌、特征以及古壮字在壮族民间流行使用的情况。

古壮字演进历程经历了萌芽、形成、发展和盛行四个阶段。汉代是古壮字的萌芽期,即南迁的汉族文人在与当地壮族先民瓯骆人接触、交往和交流过程中,用汉字作音符记录古壮语,壮族先民亦借用汉字来记录古壮语语音。如汉代杨雄《方言》中的“鞚,牛也”“虢,式八切,虎也”“把,鱼也”等,应是记录古壮语使用的汉字。其中“鞚”是古壮语的vaiz(水牛),“虢”是古壮语的guk(虎),“把”是古壮语的bya(鱼)。后来,“鞚”“虢”都成为正式的古壮字^[2]。在范晔《后汉书·南蛮传》中也有用汉字来记录古壮语,如“为仆鉴之结,著独力之衣”。其中的“仆鉴”系古壮语bouxgamj,意为居住在岩洞里的人;“独力”系古壮语dozlwg,意为孩童。整句的意思是“扎起洞人一样的发结,穿上孩子一样的衣服”^[3]。这种借用汉字音符来记录古壮语的现象,应该是古壮字的雏形,标志着古壮字的萌芽,对后来古壮字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启示和影响。

唐代是古壮字成形的重要时期,其主要标志有四。第一,唐永淳元年(682年)澄州(今上林县)刺史韦敬璇撰写并刻立的《澄州无虞县六合坚固大宅颂》

碑文中有10余个古壮字^[4]。第二,在自古流传至今的壮语布洛陀经诗、师公经书或歌本中,多用古壮字抄录。第三,古壮字所借汉字的读音,多为隋唐读音。第四,早期文字通常是在奴隶社会初期产生,也有许多古老民族文字是在奴隶社会至封建社会产生。唐代是壮族奴隶社会的发展时期。因此,古壮字成形于这个时期,符合文字产生的社会条件。

古壮字在唐代的成形,是有其社会和人文背景的。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社会经济文化繁荣。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边疆稳定,唐王朝在广西因地制宜地实施羁縻政策,沿承和发展汉武帝的“以其故俗治毋赋税”政策,实行“以蛮治蛮”的羁縻州制,任用地方民族酋首为各级官吏。这一政策在政治上要求地方服从中央,地方民族事务则由其自治,保留壮族原有的社会组织、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不变,同时重视学校教育、兴办学校,在开启民智和传播汉文化等方面施加影响。随着中原人口不断南迁和汉文化的传播,各种官办的州学、府学或民办学校开始兴起,使当地少数民族子弟有机会入学读书,接受汉文化教育。通过学校教育,掌握文化和汉字的壮族子弟逐渐增多,壮族文人队伍日趋扩大,他们受汉文化影响也不断加深。在使用汉字的过程中,壮族文人逐步认知汉字的结构,掌握了汉字的构造方法,并借用汉字“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六书造字法,创造了源于汉字又有别于汉字的古壮字,用来记录本民族语言,标志着古壮字的产生。

宋代是古壮字的发展时期,创制和流行使用的古壮字日益增多,并且形成了形、声、义相统一、结构固定的文字,民间使用亦日益广泛,因而引起了地方官员和汉族文人的关注。如宋乾道七年(1171年)任静江府(今桂林)知府兼广西经略安抚使的著名文学家范成大,经过深入调查,于淳熙二年(1175年)写出《桂海虞衡志》。在该书《杂志》篇中,对壮族民间使用的古壮字作了翔实的记述:“边远俗陋,牒诉券约,专用土俗书,桂林诸邑皆然。今姑记临桂数字,虽甚鄙野,而偏傍亦有依附。蚕,不长也。龜,坐于门中,稳也。蚕,大坐,亦稳也。仆,小儿也。𠂇,人瘦弱也。𠂇,人亡绝也。𠁸,不能举足也。𡇔,女大及姐也。𠁸,

山石之岩窟也。𠂔,门横关也。他不能悉记。余阅颂二年,习见之。”^[5]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四《风土门》中亦有类似记载:“广西俗字甚多。如𡇗,音矮,言矮则不长也;𡇔,音稳,言大坐则稳也;𠂔,音头倦,言瘦弱也;𠂎,音终,言死也;𢃑,音腊,言不能举足也;𠂔,音嫋,言小儿也;𠂔,徒架切,言姊也;𠂔,音撺,言门横关也;𢃑,音礧,言岩崖也;余,音泗,言人在水上也。”^{[6][7]}宋代庄禪《鸡肋篇》亦云:“广南俚俗,多撰字画,父子为恩,大坐为稳,不长为矮,如此甚众。”^{[6][7]}

明清时期是古壮字盛行时期,广泛应用于麽经、道公、师公经书,山歌唱本和长诗的记录,成为壮族民间书面文学用字。如产生明代、流传于右江河谷的二万多行的《布洛陀麽经》《嘹歌》,就是以古壮字抄本传世的,其中不仅保存了大量的古壮字,还保存了丰富的文化、民俗、信仰、神话故事和文学艺术成就。清初浔州(治所在今广西桂平市)推官吴淇《粤风续九》中,采录大量古壮字记录壮族的“扇歌”“担歌”“巾歌”等,即壮族男女把情歌写在扇面、刻于扁担和织(绣)在花巾上,作为信物,相赠定情,并称其“文如鼎彝,歌与花鸟相间,字亦如蝇头”。有的地方用古壮字编写的歌本数以箱计。清人屈大均《广东新语》卷8《刘三姐》条中说:“凡作歌者,毋论齐民与瑶、壮人、山子等类,歌成,必先供一本祝者藏之。求歌者就而录焉,不得携出,渐积遂至数箧。”^[7]道光十一年(1831年),今广西河池市宜州区安马乡古育村廖士宽墓的诗碑,全用古壮字写成。该碑上刻有一首五言勒脚体壮歌,共120行,详尽记述了作者的身世和晚年悲凉的情景^[8]。壮族民间的神话、故事、传说、歌谣、谚语、剧本、寓言、楹联、碑刻、药方、家谱、契约等,多用古壮字记录并流传。近代以来,壮族各地民间的师公、道公经书及山歌唱本,一直保持使用古壮字记录的习惯。除沿用传承的古壮字外,许多宗教经书、山歌唱本、长诗则流行用与壮语同音的汉字记录。

古壮字是壮族人民在汉文化的影响下,为适应本民族文化发展、传承的需要,仿照汉字的音、形、义的特点和字形符号的造字方法,创造出的一种源于汉字、借用汉字又不同于汉字的民族文字,

并在民间广泛流行,对壮族文学的创作、保存和传承民族文化、丰富壮族人民的文化生活、提高壮族的文化素质、丰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灿烂文化,有着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是壮族人民集体智慧和创新精神的体现,也是壮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硕果。

二、古壮字中的汉文化因素

公元前218年,秦始皇统一中原后,就把统一的目标指向岭南。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了岭南,并设置了桂林郡、南海郡和象郡,广西开始纳入中央政府管辖的版图,成为最早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版图的边疆地区,壮族先民瓯骆人也成为最早纳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边疆少数民族。秦王朝为了巩固对岭南的统治,采取留军戍守、移民岭南“与越杂处”等措施,开启了广西各民族与中原民族直接交往交流交融的先河。而后,经历西汉和东汉的统一和开发,迁居广西的中原汉族日益增多,特别是中原先进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的不断传入,不仅促进了广西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而且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亦不断加深。由于中原民族的麦粟农业与壮族先民瓯骆、乌浒、俚、僚民族的稻作农业同属农耕文化类型,文化类型和质态相同,民间信仰亦大同小异,故具有相融性。因此,中原移民及其文化进入广西后,彼此较易产生亲近感,尤其是壮族及其先民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借鉴和吸收,将之融入本民族文化体系,为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平添了活力,实现了民族文化的创新。秦汉时期壮族先民瓯骆人创造的铜鼓文化和花山岩画文化,就借鉴和吸收了中原文化元素,是瓯骆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的成果。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和壮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不断加深,中原文化对壮族及其先民的影响亦不断加深,古壮字就是壮族人民将借鉴和吸收汉族文化推向新的深度与高度的重要体现。无论是字形结构、造字方法,还是字的音、形、义,古壮字都是以汉字为蓝本,借用汉字和仿照汉字构造创造出来的,可以说是别样风采的汉字改造或创新版。

壮族在汉字基础上创制的古壮字,可分为自造字和借用字两种类型^①。

(一)自造字

自造字是利用汉字作偏旁或部首创制的古壮字,类似汉字的“六书”造字法,包括象形、会意、形声等。从《古壮字字典》及民间的壮字文献看,古壮字最多的是形声字,而且有规律可循,即借用汉字的偏旁或部首创制古壮字,用以记录壮语。其构造形式为上音下义、下音上义、左音右义、右音左义、内音外义、会意和象形等。其中以上音下义、右音左义的造字居多,下音上义、左音右义、内音外义、会意和象形造字较少。

1.上音下义。

“畵”,上之“那”为壮语“田”的读音,下之“田”,含义为“水田”;

“顰”,上之“那”为壮语“脸”的读音,下之“面”,含义为“脸”;

“壅”,上之“浦”为壮语“坡”的读音,下之“土”,含义为“土坡”;

“型”,上之“利”为壮语“畲地”的读音,下之“土”,义为“畲地”;

“薨”,上之“台”为壮语“死”的读音,下之“死”,义为“死亡”。

2.下音上义。

“岜”,下之“巴”为壮语读音,上之“山”,含义为“山”;

“旯”,下之“九”为壮语读音,上之“口”,含义为“我”;

“𠂇”,下之“丁”为壮语读音,上之“山”,含义为“山顶”;

“巖”,下之“敢”为壮语“岩洞”的读音,上之“山”,含义为“山洞”;

“𠂊”,下之“東”为壮语读音,上之“山”,合为“山间谷地”;

“筭”,下之“良”为壮语“读音,上之“竹”,含义为“竹笋”;

“𠂔”,下之“礼”为壮语读音,上之“口”,含义为“得”;

“𠂅”,下之“非”为壮语读音,上之“木”,含义为“木、树木”。

3.右音左义。

“垎”,右之“各”为壮语读音,左之“土”,义为“路”;

“墻”,右之“南”为壮语读音,左之“土”,义为“泥土”;

“汎”,右之“大”为壮语读音,左之“丶”,含义为“河”;

“礳”,右之“寅”为壮语读音,左之“石”,含义为“石头”;

“豺”,右之“才”为壮语读音,左之“男”,含义为“青年男子”;

“欸”,右之“大”(音“达”)为壮语读音,左之“女”,含义为“姑娘”;

“粽”,右之“方”为壮语读音,左之“米”,含义为“粽子”;

“籼”,右之“后”为壮语“稻谷”的读音,左之“米”,含义为“米、谷”;

“樽”,右之“等”为壮语读音,左之“木”,含义为“凳子”;

“瞓”,右之“竟”为壮语读音,左之“面”,含义为“镜子”。

4.左音右义。

“鵝”,左之“介”为壮语读音,右之“鸟”,含义为“鸡”;

“𩫑”,左之“九”为壮语读音,右之“头”,含义为“头”;

“𦥑”,左之“用”(音“融”)为壮语读音,右之“吏”,含义为“用”;

“𦥑”,左之“弄”为壮语读音,右之“迷”,含义为“错”。

5.外音内义。

“閩”,内之“江”为壮语读音,外之“门”,含义为

^①文中的古壮字,由广西民族大学语言学专家韦树关教授制作、提供。

“中间”;

“闻”,内之“斗”为壮语读音,外之“门”,含义为“门”。

6.会意字。

“至”,义为“上”;

“厃”,义为“下”;

“厃”,义为天;

“夭”,义为“瘦弱”;

“垂”,义为“死”;

“奐”,义为“矮”。

7.象形字。

“闩”,象征着门间插有一横木,义为“关门”。

通过古壮字的结构和造字方法可以看出,壮族创造的古壮字,与汉字结构、造字方法及音、形、义与汉字相同,皆有规律可循。一是字形偏旁(即形旁和声旁)部首结构与汉字相同,即凡与人称有关的造字,皆为“亼”旁;凡与人体有关的造字,多为“月”(古字“肉”)旁;凡与金属类及其器皿有关的造字,皆为“钅”旁;凡与牲畜有关的造字,皆为“牛”旁;凡与飞禽类有关的造字,皆为“鸟”旁;凡与山有关的字,多为“山”旁;凡与土地有关的造字,皆为“土”旁;凡与水有关的造字,皆为“氵”旁;凡与米或稻米制成的食品有关的造字,皆为“米”旁;凡与木有关的造字,皆为“木”。二是所造古壮字偏旁结构具有很强的会意性或象形性特征。如“醜”字,分别用汉字的“面”和“竟”合成,右音左意,义为用来照脸(面)的镜子。“穀”,壮语义“错”,左之“弄”为壮语读音,右“迷”,有因迷糊而错之意。凡与水有关的字,皆为“氵”旁,可使人想到“水”;而有“土”“山”“牛”“鸟”“钅”“亼”“山”“米”“木”偏旁的造字,很容易使人想到此类字的属性,这既是汉字的特点,也是古壮字的特性。三是偏旁结构灵活多变,表音手段复杂多样。无论是形声字还是会意字,偏旁部首的位置不拘一格,灵活多变,合体字有二合、三合等,形成众多异体字。无论是表音的偏旁还是表意的偏旁,大多都借用汉字的音和义。古壮字借用汉字音表壮语音的手段,超出“六书”的形声、假借,可视为对汉字的创新和发展。四是字形笔画存在随意性,缺乏一定规范,时常出现在汉

字基础上的增笔、减笔、改笔、加符号等现象,同形字也较多,通常需要阅读全句,才能知晓同形字的原义。其原因主要是大部分古壮字都以汉字为偏旁或完全借用汉字,为了使古壮字与汉字有所区别,在创造古壮字时便对这些汉字有意识地加以改动。特别是近代的古壮字,直接用汉字表音(假借)增多。五是古壮字的创制方法娴熟,创制的字包含形、音、义三大要素,说明创制者对汉字偏旁结构与字义的深刻认知、造字方法的娴熟和较高的汉文化素养。

(二)假借字

假借字,就是借用汉字的形或音,表壮语的义。这种假借字,以汉字作为记音符号,据音系义,显示出与汉字的区别。这种假借字大量用于壮族道公、师公或麽公等人员记录并世代传承的经书以及民间歌师创作、记录及传承的歌本中。其字为汉字,壮语读音与汉字相同,但已非汉字之义,而是壮语之义。能够读懂此类假借的汉字,需要受过一定的汉语教育学习,掌握一定的汉字量和汉字基础,才能认识或读懂。如:汉字之“板”,壮语读音亦为“板”,其义指“村庄”;汉字“约”,壮语读音亦为“约”,义为“看”;汉字“眉”,壮语读音亦为“眉”,义为“有”;汉字“龙”,壮语读音亦为“龙”,义为“下降”;汉字“刘”,壮语读音亦为“刘”,义为“我们”;汉字“布”,壮语读音亦为“布”,义为“老人或德高望重的老人”;汉字“达”,壮语读音亦为“达”,义为“姑娘”;汉字“农”,壮语读音亦为“农”,义为“妹妹”;汉字“迷”,壮语读音亦为“迷”,义为“母亲”;汉字“博”,壮语读音亦为“博”,义为“父亲”;汉字“火”,壮语义为“穷”;汉字“斗”,壮语义为“来”;汉字“恶”,壮语义为“出”;汉字“欧”,壮语义为“要”。各地壮族借用汉字,赋予壮语含义,是一种文化创新,并且广泛应用于创作和记录民间信仰的经书和山歌唱本,极大丰富了古壮字的形式和内涵。故有学者认为,假借字虽属借字,但从使用功能来看,是用来记录壮语,以外来语理解自己的书写系统。从此意义言之,假借字也是造字^[9]。

古壮字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后,随着中原文化的不断南传和学校的兴办与发展、壮族子弟入学读书、学习和认知汉字的社会背景下产生和发

展起来的,是壮汉文化交流交融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壮族及其先民以汉字为基础,仿照汉字的“六书”造字法创造了古壮字,用于记录本民族的各类文献,使之成为壮族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历史上,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壮族及其先民在学习、借鉴和吸收汉文化过程中,并不是简单照搬或复制,而是根据本民族的需要,以发展创新的理念,在借鉴汉文化的同时,将之吸收和融入本民族的文化创造,实现民族文化创新与发展,凝聚着壮族人民的集体智慧,反映了壮族人独特的思维习惯、文化心理和造字特色,体现了壮族的开拓创新精神,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硕果与典范。另一方面,古壮字还对布依族、水族、京族文字的产生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许多古壮字被布依族、水族、京族直接使用,用于记录本民族语言及经书、唱本等。由于历史的原因,加上壮族人口多、分布广,方言众多,而且缺乏统一、规范的政治机制,壮族创造的古壮字遂缺乏统一性和规范性,未能发展成为壮族统一的文字。但是,古壮字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在壮族文学的创新和壮族文化的保存与传承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周作秋等在《壮族文学发展史》中指出:“一千多年来壮族及其先民创作的文学作品,就是依凭古壮字而得以流传至今。壮族的师公唱本、创世史诗、英雄史诗、叙事长诗、抒情长诗,还有不计其数的民间歌谣,无不以古壮字为书写工具。如果没有古壮字,仅仅依靠口耳相传,大量的壮族民间文学就会随风而逝,令人无法领略到《布洛陀麽经》《布伯》《莫一大王》《嘹歌》《欢乐扬》《唱英台》等文学精品的艺术魅力。”^[10]这是对古壮字的作用、价值、意义的充分肯定与客观评价。

[参考文献]

- [1]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古壮字字典[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12:1.
- [2]覃彩銮,覃丽丹.携手谱写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篇章[J].广西民族研究,2022(5).
- [3]陆发圆.方块壮字的萌芽与发展[J].广西民族研究,1999(3).
- [4]黄南津,唐未平.当代壮族群体使用汉字、古壮字情况调查与分析[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
- [5][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校补[M].齐治平,校补.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31.
- [6][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辑佚校注[M].胡起望,覃光广,校注.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
- [7]壮族百科辞典编纂委员会.壮族百科辞典[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411.
- [8]蔡培康,莫瑞扬.奇特的廖士宽墓方块壮字壮歌门碑[J].河池师专学报(文科版),1988(4).
- [9]林亦.汉字系民族文字的研究与应用——以古壮字为例[M]//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宣传司.民族语文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408.
- [10]周作秋,黄绍清,欧阳若修,等.壮族文学发展史:上[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27.

责任编辑:许立坤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梳理与展望

卞之晓,程凡,刘金林

(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南宁530006)

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是近年来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自2014年习近平首次使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提出“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来,学界与实践工作部门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成果丰硕。在时间维度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可以分为初步发展阶段、加速发展阶段、全面推进阶段。在研究内容上,包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特征与形成机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与实现路径等;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以定性分析与规范分析为主,量化分析、数据软件分析的方法也逐步涌现,研究方法趋向多元化。进一步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应加强理论体系化研究、学理化阐释,推进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深化宣传教育,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入脑入心;突出问题意识、密切联系群众,多方法、多角度研究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地落实。

关键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内涵;形成机理;实践路径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4.01.012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4)01-0082-12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学界和实践工作部门都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成果。本文对2014年习近平首次使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提出“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来,学术界开展的理论研究以及实践工作部门进行的有益探索进行了纵向梳理、横向归纳,并对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进行评价与展望,以期为进一步拓展与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和实践研究,助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以及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

一、纵向层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历时性分析

以时间为研究中介,通过梳理习近平总书记关

收稿日期:2024-01-0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项目(22VRC092);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22CMZ003)。

作者简介:卞之晓,男,广西民族大学广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程凡,女,广西民族大学广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刘金林,男,广西民族大学广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地区基层治理。

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学界发表的学术成果与实践工作部门出台的政策文件,可以发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经历了初步发展阶段、加速发展阶段、全面推进阶段。

(一)初步发展阶段(2014—2017)

2014年5月,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强调“要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在各民族中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大限度团结依靠各族群众”^[1]。同年9月,习近平在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2014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坚持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的基本要求,“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任务,“牢固树立各民族水乳交融、唇齿相依、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观念”的行动目标^[3]。2015年习近平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大力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广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和创建活动。”^[4]这一阶段,学界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研究力量主要以民族类院校的专家学者为主,涉及学科主要有民族学、政治学、文化学、管理学、教育学等,研究内容主要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三个方面展开。其中,包括基于历史分析方法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从定性分析和规范分析视角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路径等。

(二)加速发展阶段(2017—2021)

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此后,习近平在内蒙古考察并指导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等多个重要场合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17年至2021年,学界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

成果快速增长,相关研究成果侧重于学理性探讨和综述性分析,研究力量集中于中央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等民族类院校,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民族研究》《广西民族研究》《民族学刊》《民族教育研究》等民族学、教育学期刊。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特征与形成机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从多维度、多层面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等。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体系,为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撑。

(三)全面推进阶段(2021年至今)

在2021年8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明确指出“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5],深刻阐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必然性、极端重要性和现实针对性。在2023年内蒙古考察等重要场合,习近平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6]。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更是明确提出“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遵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科学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研究”“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讲好中华民族故事”等要求^[7],为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指明了方向,推动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全面发展。这一阶段,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研究成果逐年增加,研究学科由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政治学、文化学、教育学、管理学扩展至新闻学、文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研究内容不仅深化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特质、形成基础、现实条件等,也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研究,从倾向于围绕经济、社会、文化、制度建设的宏观层面开展路径研究,转向围绕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兴边富民、互

嵌式社区治理、城市治理、普通话推广普及、文化传承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中微观层面提出具体路径。与此同时,实践工作部门积极开展相关工作,着力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包括在全国范围内陆续成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或实践基地;开展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项计划”^①;开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展”“何以中华——一百件文物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等线上线下展览;制作《我们是一家人》《同心共筑中国梦》《可爱的中国》等系列视频;编写出版《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材;开设“广西社科大讲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讲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起民族团结的磅礴力量”主题线上课程等视频课程。总的来说,这一阶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与实践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和发展势头,为全面推进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注入源源不断活力。

二、横向层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梳理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内容梳理

1.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特征。理解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样新的复合概念,必定离不开对中华民族这一基础概念的理解。在此之前,梁启超、顾颉刚、夏鼐、黎澍、周维衍、费孝通等代表性学者围绕中华民族这一本体的形成及其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展开研究,形成的关于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观点,为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特征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基于此,学界从本体论、意识论、本体论与意识论相结合等维度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特征进行分析,形成了一批颇有见解的观点。

一是从本体论维度看,学界形成了命运共同体论、有机统一体和亲缘体论、多重共同体论、民族实

体论、多民族共同体论、国家意涵论和国族称谓论等观点,多角度、多层次论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虚幻的建构性的想象共同体^⑨,而是以共同体的形式存在和发展,蕴含了整体性、共同性和实体性特征^⑩,是承载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主体、促进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统一的根本手段以及凝聚中国国家力量的有效方式^⑪;其在意识层面反映了中华民族全体成员对共同命运、共同文化、共同政治生活的集体意识的总和^⑫,包括对国家的认同意识、族际民族关系以及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认同意识,而国家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属性的核心^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体论观点,更强调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基于本体论观点,可以从主观能动性视角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特征,即这种意识可以凝聚各民族共有的精神、记忆、情感,为实现自身精神解放、获得全面发展注入更多能量,促使中华民族全体成员获得更多的精神动力,从而产生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取向,最终转变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建共享共荣的行动参与,推进各民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二是从意识论维度看,学界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种社会成员共同体意识及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意识,体现了现代性和共同性^⑭,象征集体归属感和身份认同感,因而也是多层面于一体的综合性认同系统^⑮,其核心是“五个认同”^⑯。如高承海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整合性概念,着重从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维度分析其内涵。在认知上,各民族成员将自己归属中华民族一员,了解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化,认识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在情感上,对共有身份“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在行为上,传承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文化,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⑰。郑旺全等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族人民在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基础上产生的认同与归属感^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识论观点更强调能动反映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客观实践的心理认知与情感的结果,强调情感认同是

① “三项计划”指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

②“五个认同”即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蕴含着一个核心的凝结点^[17],具备高度凝聚力、强大吸引力、特殊感召力。基于意识论观点,可以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解为一种群体认同意识,是一种复杂社会心理现象的统称,体现了在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在历史、心理、社会、制度、政治及文化等层面取得的共识性以及对各种观念、态度、行为的一致性表达,包括历史记忆、精神信仰、交往互动、国家利益、国家主权、国家安全与发展等内容。

三是从本体论与意识论相结合的维度,学界主要从意识层面与认知领域、中华民族共同体实体建构的双重视角,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特征。在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客观实在性时,强调反映这一个本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客观实在性。严庆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本身是客观存在的且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这一实体具有形成与发展的本体性且能够被认知与被反映,历经了从自在到自觉阶段,由共建中华民族意识和共享中华文化意识共同组成;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国民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客观存在的主观反映,即各民族能够认识到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是客观存在且从心理上自觉认同、主动归属并维护和促进这一共同体建设^[18];只有建立在基于历史、主权国家及民族构成视角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本质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19]。青觉等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以历史上积淀而成的中华民族为基础,以共善生活为价值导向,进而形成的具备共同复兴关怀的中国国民聚合实体,其意识是各族人民基于体认彼此生存发展的共性条件与历史,从而秉持共善价值规范及能动维护意愿的复兴凝聚心态。马俊毅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本身具有多重属性,是历史文化共同体和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也是政治共同体与精神共同体,因而对应的意识必定涉及历史、文化、民族、制度、治理等多个维度^[20];更具体来说,这种共同体意识是国情家底、历史主流、共同发展、团结合作、政治法治、共建共享等多层意识的统合^[21]。基于本体论与意识论双重视角的观点来看,中

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保持紧密一致性,共同经历了自在、自觉、自为、自强的演变与发展,即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体——中国56个民族成员作为总体性的存在方式,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形成并发展了政治认同、文化认同、身份认同,完成了由个体走向共同体、自我意识上升为社会意识并完成差异意识向共性意识转变的过程,最终构成一个历史性、文化性、政治性、社会性相统一的动态发展平衡的共同体系统。

总的来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现代性、国家性、整合性、有机性等多元特性于一体的概念,既是对中华民族本体的认知和反映,是古今结合、内外相交的产物,也代表一种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是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社会存在的意识反映,是在自然与人文环境中凝聚的群体身份认同,以及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演化生发出对中华文化的情感羁绊与文化自信,即对共同价值或精神的认同。

2.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机理。意识是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生成的主观映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现了中华民族全体成员在认知、心理和行为等层面共通的精神价值,其所蕴含的精神价值激励和促使全体成员从认知、认同走向实际行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个复杂的整合性概念,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因而如何在理解其概念内涵的基础上正确运用这种意识反作用于客观实在,推动中华民族全体成员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与发展付出实际行动,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凝聚团结奋斗的力量,就需要深入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机理。

国内学者结合特定的历史背景,基于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交往理论、“夷夏”观的历史视域以及心理学的认同理论等多理论视角,从内生性与外部性维度探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背景和机理。青觉等基于辩证唯物主义视角,在分析意识的形成机制的基础上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过程,即内外部环境施加的要求和压力输送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人脑开始转换、加工和创造输入的信息。

息,再输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通过社会实践发挥意识的能动性反馈到内外部环境,从而形成了一个以反馈为回路的系统循环^[22]。代洪宝基于马克思交往理论^①分析指出,中国各民族交往的必然趋势即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交往方式的更替变换推动和影响了社会的发展变化,包括维系生命的原始交往(自保意识)、物质需要的部落交往(“华夷一家”观念的产生与强化)、抵御外忧内患的顽强奋斗(中华民族大团结),各民族的心理、意识和思维在这些交往过程中经过不断碰撞,进而生发出各民族共有的“纯粹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3]。段超等从“夷夏”观演变的思想史角度考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认为中国历史上从“夷夏之辨”“华夷首足论”“华夷皆正统”“华夷一家”“礼别夷夏”到“华夷一体”的“夷夏”观念的转变过程,受到“大一统”思想影响和建设“大一统”王朝、经略四海的推动,以及边疆与内地交流日益加强的影响,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加强了各民族文化的相融互通,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基础^[24]。陈辉基于认同视角研究认为,理性认同机制、情感能认同机制、利益互动机制、自律转化机制以及制度保障机制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复杂的生成机制,其中理性和情感是主观因素,利益互动和制度保障是客观基础,主观与客观互动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他律转为自律^[25]。

结合学界对形成机理的多角度分析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具体而言,在历史逻辑上,中国古代、近代、当代构成连续的历史脉络,共同奠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深厚基础,其中古代王朝国家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提供深厚的文化

基础,近代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确立提供了发展条件,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得到进一步强化。在理论逻辑上,“夷夏”观、儒家民族观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培养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则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创造了发展的空间。在实践逻辑上,这种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不仅受到我国历史、文化、社会发展内生的主观因素作用,也受外患等客观因素影响,但根本上还是内在历史走向、内在思想底蕴、内在结构特征等内生性因素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共同体意识最终深深融入中华民族全体成员血脉基因,推动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所共有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

3.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

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内涵和形成机理研究的深入,学界从国内和国际层面探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包括从国内层面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于新时代党的民族理论发展、文化自信自强、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从国际层面分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于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现实意义。

一是丰富和发展新时代党的民族理论,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生动体现“两个结合”^[26],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27],有利于推动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构建。当前西方话语霸权、多样化社会思潮和多元价值取向、“三股势力”等外部环境激荡复杂带来的挑战,以及狭隘的民族主义、“跨境民族”话语所强调的跨境性、民族二

^① 马克思认为交往是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这里的社会不是固有的抽象概念,而是人们之间通过交往活动结成的“类存在”——社会共同体,交往作为物质资料生产的必要前提,也是这样一个社会共同体存在之基础。同时,人也必须寓居于社会共同体之中,并在社会交往活动中(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得以发展自我和确证自我,使自我成为“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即“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随着物质生产生活范围的扩大,个体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产生了多重意向的社会交往互动,进而缔结了各种形态的生活共同体。而“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可见,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为领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交往性”生成提供理论依据。

元结构等民族认同障碍带来的冲击,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生成空间,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体力量等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使得我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存在不少挑战。因此,丰富和发展新时代党的民族理论,是应对这些挑战和冲击的迫切需要和必然要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论断新理念的提出,既是对中华民族历史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发展和深化,丰富和发展了新时代党的民族理论,推动了我国民族政策和民族问题的理论研究,对加快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中国话语体系和中国叙事体系,传播中国声音、中国理论、中国思想,丰富和完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具有重要意义^[28]。

二是具有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重要功能,有助于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不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从民族心理结构来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包括民族共同体心理过程、族体人格、民族心理活动结果三方面,即通过民族心理的活动过程与族体人格互动,产生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等在内的中华民族共有文化这一民族心理活动结果。这不仅体现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知情意行的民族心理活动过程,又表现了中华民族在气质、性格和认知风格方面的族体人格特质(即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民族性格)^[29]。这种共同体意识包含的“客观观念”“知觉观念”“理论观念”“行动观念”四种意识形态^[30],具有行为规约功能、共同体整合功能、精神凝聚功能、目标机理功能以及对个体的定位与发展功能,可以在文化认同(民族认同)上升至政治认同、民族凝聚力上升至国家凝聚力的发展过程中凝聚起团结和凝聚人心的力量,夯实筑牢维护国家统一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石,增强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动力^[31]。可以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团结统一,提升文化自信,进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内生动力和必要要求。

三是符合“两个大局”形势下加强和改进新时代

党的民族工作的现实需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有利于筑牢国家统一与社会稳定的思想根基,促进各族人民和衷共济、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更对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应对日益复杂的国家局势具有重要意义^[32]。同时,作为观念形态上的上层建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消解地域认同、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所产生的张力,不仅有利于保护边疆民族地区独特的生态和资源优势,从容应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也在推动各族人民形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共识、价值信念和行动意愿,进而对防范民族领域重大风险隐患,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方面具有深刻的价值意蕴^[33]。

四是作为民族地区开展各项工作的主线,为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及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精神力量、确立了实践导向。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并举,到独立出现于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部分,到出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一节中,同期被写入党的十九大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并于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出现在“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一节中,再到2023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强调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党和国家治国理政的重要方略和民族地区开展各项工作及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遵循,其必要性和现实价值从民族工作领域延展至经济高质量发展、文化强国建设、全过程人民民主、国家安全、全球治理等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如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必然要求^[34];在文化强国建设方面,对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具有重要指导作用,是提升国家文

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实践遵循和必然要求^[35];在国家安全方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助推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思想基础,为维护祖国统一,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思想保障的必然要求。

五是为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一剂良方,在全球治理方面有利于巩固提升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36],是塑造正确的国家形象,摆脱大民族主义、殖民主义、单边主义的必然要求,其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涵盖的包容尊重文化差异、平等、以发展促团结、以人民为中心等理念,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及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价值^[37]。同时,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相互嵌入和交响协奏的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国内和国际层面来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话语构建、思想引领、精神塑造、实践导向等重大意义,不仅为践行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提供内生性的、源源不断的磅礴力量,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更是面对国情世情领域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实现共同体意义上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现实需要,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重要精神引领。

4.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现路径。一是基于规范分析视角提出以推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制度建设等方面建设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物质、文化、社会、制度等基础的政策举措。其一,在经济建设层面,基于物质与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38],促进共同富裕^[39],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建设路径。其二,在文化建设层面,主要从构建共有精神家园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40],“四史”教育^[41],高校思想政治教育^[42],以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43]等方面提出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思想基础的对策与建议。其三,在社会建设层面,以国家治理现代化^[44]、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45]、互嵌式社区治理^[46]等为切入点提出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的对策与举措。其四,在制度建设层面,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47],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48],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49],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50]等方面提出相应举措。

二是各部门与社会各界共同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其一,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教育部、国家民委四部委推动下,全国范围内陆续成立一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或实践基地,逐步实现基地实体化、专职化,同时通过制定基地管理办法、提供场地、拨付经费补助、培养教研队伍、设立研究课题、招收研究生、开设课程、开发视频教材、建立研习基地、进行座谈交流、举办会议论坛和培训班、创办期刊等多种形式,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以及相关研究深入开展,并取得一定成效。其二,国家民委联合相关部门、高校,组织理论界专家学者、一线教师共同编写出版《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材,创办公学期刊《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进一步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其三,不少学术期刊、权威报纸开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栏目,开展相关基础性问题和应用性课题研究,加强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与实践的研究阐释;全国范围内推介“道中华”公众号,提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认知度;部分学者借助心理学、统计学、经济学、计算机科学、民族学等学科方法,尝试编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量表,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标体系,搭建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五个认同”数据库,各地积极推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汇编》《中国少数民族文物图谱》等编纂工作,深入挖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这些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理论与实践支持。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方法梳理

学界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最初主要是从民族学、历史学、政治学视角展开,后逐渐有学者从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哲学、教育学、经济学、法学、文学、舞蹈学、音乐学、新闻传播学、建筑学、考古学、体育学、口述史等多学科、跨学科视角展开,相应的研究方法为定性研究、量化研究、质性研究,具体包括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文献研究法、话语分析、内容分析、扎根理论研究、文本分析、个案研究、民族志研究、口述史研究、经验总结法、描述性研究法、实证研究法、定量分析法、定性分析法、交叉研究法等方法。

一是以定性研究与规范研究为主。其中,定性研究体现在对事物分类、归纳,以及对事物属性作出界定,包括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特征与形成机理分析及其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的阐释,大多集中在对概念考辨、抽象的认知分析、逻辑推导等层面;规范研究主要表现为从不同层面、不同领域、不同角度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对策和举措。此外,还有一部分研究采用田野调查、个案分析等方法,以某学校、社区、城市等为案例分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现路径。

二是定量研究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逐渐涌现。部分学者借助统计学指标体系构建、计量模型、心理学量表以及 Cite Space、NVivo 工具等量化分析、数据软件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证研究。如刘金林、马静等尝试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标体系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评价指标,编制发放“五个认同”调查问卷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社会认知度调查问卷,构建量化指标与回归模型评估分析广西各族群众有序参与基层治理对增强“五个认同”的现实效应^①;后慧宏、

苏德尝试用扎根理论研究法,并借助 NVivo 软件分析东部地区汉族大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族际交往态度影响因素并构建相关模型^[51];陈立鹏、杨宇琦、何阳等学者也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效果测量方面进行了研究,包括编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量表^[52]、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社会心理测量指标^[53]、东西部协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效果测量的指标体系^[54]等。

三、小结与展望

(一)小结

自 2014 年习近平首次使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提出“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来,学界与实践工作部门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较为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成果丰硕。本文通过纵向梳理、横向归纳,全面立体呈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现状。

一是从纵向层面来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历经初步发展阶段(2014—2017)、加速发展阶段(2017—2021)、全面推进阶段(2021 年至今)三个阶段。初步发展阶段主要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特征与形成机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等内容展开;加速发展阶段主要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以及实践路径展开;全面推进阶段主要围绕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推出立足中国历史、解读中国实践、回答中国问题的原创性理论成果共同努力。

二是从横向层面来看,主要包括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两个方面。在研究内容上,现有成果包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特征与形成机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与实现路径等,主要体

^①该研究团队构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标体系获 2021 年度全国统战理论政策研究创新成果二等奖,设置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评价指标被统战、民宗等部门采用,根据“五个认同”问卷调查结果撰写的调研报告获 2021 年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一等奖;编制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社会认知度调查问卷用于广西贵港市、防城港市、梧州市、崇左市等创建 2023 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第三方评估工作;构建量化模型实证分析广西各族群众有序参与基层治理对增强“五个认同”的现实效应,研究成果获广西第十七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并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该团队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量化研究进一步拓展与丰富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也为相关部门完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策与措施提供了重要借鉴。

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从本体和意识层面,阐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概念内涵;从历史维度、理论维度与实践维度,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机理;从国内和国际相结合的视角,讲清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从实践层面,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供借鉴的建议举措。研究的进路及其成果充分彰显了国内学者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原创性论断的理论认同和思想认同,体现了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高度关注的理论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同时,大多数研究侧重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概念辨析、历史叙事和实践经验研究,一部分研究停留在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宏大叙事,还有一部分研究逐步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视域和对象拓展到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法治建设、党的建设等方面,但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叙事中各因素相互作用和机制运行的研究还较为鲜见,部分研究提出的对策举措存在针对性不强、可行性不高的现象。

在研究方法上,首要强调用历史分析法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重对现实案例以及历史事实的分析;其次,主要采取定性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包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及实践逻辑的剖析,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现路径的探讨等。尽管量化分析、数据软件分析的方法也逐步涌现,但总体而言,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严重失衡。进一步增强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结论的实践指导性,特别是在理论研究基础上,采取宏观叙事与微观叙事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

(二)展望

2023年10月27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研究,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要讲好中华民族故

事,大力宣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及时研究解决本地区本单位涉及民族工作中的重大问题”^[7]。基于此,本文重点围绕理论研究、宣传教育、实践路径三个方面的内容提出几点思考。

1.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推进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一是持续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充分发挥全国各地高校智库、相关基地中心、学会协会、研习基地的平台载体作用,加大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研究,系统研究与阐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底蕴、科学内涵、重大意义、精神实质、实践要求等内容。二是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验研究,进一步挖掘、梳理、总结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案例,加快构建一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历史叙事体系和话语体系,提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阐释力。此外,探索支持鼓励多学科共同参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方式方法,不断优化民族学科设置,加快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研究的学科体系建设,强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师队伍、人才培养和课程教学等模式研究。

2.深化宣传教育研究,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入脑入心。一是在做好理论研究与阐释的基础上,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体制机制与宣传模式研究,深化把党的领导贯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全领域、全过程研究,夯实宣传教育组织保障;要创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方式方法,大力宣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结合各族群众生产生活习惯,探索创新掌上读本、短视频、戏曲歌舞等便捷性、即时性、体验式的宣传方式,强化新媒体平台建设,依托互联网、微博、微信、短视频软件、主流媒体、优质自媒体等各类载体平台,深化互联网宣传工作,让互联网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要大力宣传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包括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故事等。二是重点围绕党员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方面加强研究。在党员干部教育方面,充分发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社会

主义学院宣传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加强和改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学习的方式方法研究,切实提升党员干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知度,推动相关工作更好落地落实。在社会教育方面,要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红色基因传承工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等工程建设,进一步挖掘、整理、阐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加快推进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编纂工程,灵活运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从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层面研究、阐释与宣传“四个关系”“四个与共”,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进一步挖掘宣传教育素材,丰富传播内容和形式,创新宣传教育方式方法,分类施策,突出重点,联系实际,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覆盖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乡村、城市社区等,引导各族人民形成正确的认知,增进“五个认同”。在学校教育方面,高校要学好用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材,加强研究,开好必修课程,将教材落实到教育教学中;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教师队伍、学工队伍、课程建设以及学生培养方面的研究,比如依托课题开展培训,研发相关课程与视频,深化研学活动等。

3.深化实现路径研究。要立足问题意识,密切联系群众,多方法、多角度研究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地落实。一是注重前期基础调查和经验资料分析,加强调查研究与经验做法研究。一方面,立足“真调研”“真研究”“真解决问题”的原则,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调查研究,包括建立相关责任制度、确定调研专题、调研成果交流、典型案例复盘剖析、调研成果转化、调研成效评估等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深化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经验做法的挖掘、整理、总结和阐述,包括对各个时期的经验总结以及把各个时期贯通起来的经验总结,结合当前的认识高度的经验总结,放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经验总结等。二是注重实践过程评估分析,加强测量评估和实证评估研究。要进一步发挥经济学、计算机科学、心理学、统计学等学科方法和分析工具,加强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三项计划”、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等方面实施进展的动态评估和跟踪,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更加具象化。及时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通过量化分析为相关政策与举措的调整与完善提供依据。三是注重对策有效性和针对性,加强有效落实路径研究。要立足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与现实,本土与世界,理论与实践,准确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特征与时代意义,深度剖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基础,密切联系群众和实际,从群众切身利益出发找准着力点,围绕群众就业、教育、社保、医疗、养老、托幼、住房等内容,提出具有实践性、指导性、操作性的思路与举措,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 团结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疆[N].人民日报,2014-05-30(1).
- [2]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4-09-30(1).
- [3]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EB/OL].(2014-12-22)[2023-12-15].https://www.gov.cn/zhengce/2014-12/22/content_2795307.htm.
- [4]习近平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 加快西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N].人民日报,2015-08-26(1).
- [5]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1-08-29(1).
- [6]习近平在内蒙古考察时强调 把握战略定位坚持绿色发展 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N].人民日报,2023-06-09(1).
- [7]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3-10-29(1).

- [8]朱碧波.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维建构[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
- [9]孔亭,毛大龙.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内涵[J].社会主义研究,2019(6).
- [10]陆海发.民族国家视阈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
- [11]王宗礼.国家建构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5).
- [12]赵刚,王丽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属性解读[J].湖湘论坛,2017(1).
- [13]沈桂萍.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国家认同的文化纽带[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
- [14]苏泽宇.认同视阈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J].学术研究,2020(9).
- [15]高承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意义与铸牢策略[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12).
- [16]郑旺全,赵晓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演进与内涵深化——基于“五个认同”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体系框架[J].民族教育研究,2021(2).
- [17]刘吉昌,曾醒.情感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要素[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6).
- [18]严庆.本体与意识视角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3).
- [19]严庆.本体建设与意识铸牢:试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理路[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
- [20]马俊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代性内涵[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5).
- [21]穆智,马豪,杨刚.在交流与互动中促进研究生培养——第十二届全国民族理论研究生学术研讨会暨全国民族理论研究生教学经验交流会综述[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7(5).
- [22]青觉,赵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机理、功能与嬗变——一个系统论的分析框架[J].民族教育研究,2018(4).
- [23]代洪宝.马克思交往理论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析[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
- [24]段超,高元武.从“夷夏之辨”到“华夷”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思想史考察[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5).
- [25]陈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机制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21(2).
- [26]乌小花,郝因.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J].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3(5).
- [27]王延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演进与战略意义[J].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2(3).
- [28]代洪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与当代价值[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
- [29]陈茂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心理基础——基于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视角[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
- [30]郝子涵,张宝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8(6).
- [31]刘吉昌,金炳镐.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11).
- [32]平维彬.历史、当下与未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向度[J].贵州民族研究,2019(9).
- [33]蒲丽霞,贾友军.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理路——以边疆多民族地区为例[J].新疆社会科学,2021(4).
- [34]石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6).
- [35]卢成观,李文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根基、现实价值及路径选择[J].理论导刊,2020(3).
- [36]赵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
- [37]王易,陈玲.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问题及路径选择[J].民族教育研究,2019(4).
- [38]邹丽娟,赵玲.边疆民族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与

-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辩证逻辑[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6).
- [39]邓磊,罗欣.习近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探析[J].社会主义研究,2018(6).
- [40]张伦阳,王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逻辑、现实基础和实践路径[J].民族学刊,2021(1).
- [41]杜娟,蒋明.逻辑、价值与实践:民族高校四史教育融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思考[J].民族学刊,2022(11).
- [42]蒋文静,祖力亚提·司马义.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层次及实践路径[J].民族教育研究,2020(1).
- [43]刘金林,马静.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民族地区深入推普的思考——语言与国家治理系列研究之二[J].民族教育研究,2021(4).
- [44]宁德鹏.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研究——基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角[J].中国行政管理,2022(6).
- [45]陈路路,安俭.铸牢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视角探析[J].贵州民族研究,2020(9).
- [46]陈纪,蒋子越.各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条件探析[J].贵州民族研究,2021(4).
- [47]马冬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制度保障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0(5).
- [48]陆平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建构[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4).
- [49]李烨鑫.公共文化服务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民族学刊,2022(10).
- [50]李曦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经济视角研究[J].区域经济评论,2021(3).
- [51]后慧宏,苏德.东部地区汉族大学生何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于族际交往态度影响因素的扎根理论研究[J].民族教育研究,2022(1).
- [52]陈立鹏,薛璐璐.基于心理测量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量表的编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2).
- [53]杨宇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心理内涵、测量构想与实证进路[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
- [54]何阳.东西部协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效果测量及形成机理[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12).

责任编辑:杨绪强

论儒家“忠恕”思想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启示

王 凯

(甘肃社会主义学院,甘肃兰州 730070)

摘要:儒家“忠恕”思想浓缩了“仁者”的思维方式和“行仁”的实践路径,是“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的辩证统一。“忠”是“恕”的心性强化机制,“恕”是“忠”的实践自证机制。在历史长河中,“忠”蕴含的家国情怀、自立自强的精神与“恕”蕴含的和合共生、包容互鉴的理念为塑造中华文明的刚性与韧性提供滋养。新时代新征程,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忠恕”思想浸润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精神动力。

关键词:儒家;“忠恕”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4.01.013

[中图分类号]D61;G122;B2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339(2024)01-0094-05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1]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坚持文化自信与文化强国,坚守民族文化主体性地位,坚持“两个结合”,汲取中国古代智慧滋养,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重大方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在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儒家的“忠恕”思想作为文化基因始终发挥着隐秘而持久的功用,并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精神动力。

一、作为个体道德学说的“忠恕”

“忠恕”一词出自《论语·里仁》篇中曾子对孔子理论的总结。原文为:“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子认为如果用一个词将孔子学说进行总结提炼的话,那就是“忠恕”。

“忠”字面意思为“中心不二”。《说文解字》曰:“敬也,尽心曰忠。”忠的思想形成于中国哲学觉醒阶段中古圣先贤对天道的观察和体悟,特别是对天道自强不息与至诚无息的借鉴。“恕”不是宽恕,而是推己及人的思维,这在《论语》里有明确的定义。“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孔子认为,

收稿日期:2023-11-11

作者简介:王凯,男,甘肃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可以终身去追求的品德。恕也来自对天道的思辨体察,是对“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申发。“忠恕”从“道”的高度提纲挈领地概括了儒家心性修持的义理,涵盖了认识自己、对待他人的哲学主张。朱熹认为“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而已矣者,竭尽而无余之辞也”^{[2]102}。人生在世,面对的无非是对自我与他者二元关系的认知与调和,自我修为是“忠”,推己及人是“恕”,别无他法,故以至诚之心践行之。

(一)忠恕之要:他人不在自我之外

“忠恕”集中表达了“仁者”具有的思维方式,是自我与他者的彼此联系、二元统一。“恕”道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相对直接地表达了推己及人的思维方法。“忠”道是尽心成己之法,实则也不离人,因为人的社会性,或者说对人是紧紧嵌入在社会中的体认是儒家学说的基本立足点。学者杨伯峻认为:“‘忠’则是‘恕’的积极一面,用孔子自己的话,便应该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3]朱熹在注解“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时写道:“近取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犹是也。然后推其所欲以及于人,则恕之事而仁之术也。”^{[2]126}可见,“忠恕”虽为二字,似分二理,但都强调成仁行仁必须在与他者的互动中实现。“忠”偏向积极的内在,恕则偏向理性的外在,是心与物、知与行的统一。

哲学的一个重要功能是解决人的困惑,而人困惑的一大根源来自“自我与他者”的二元性关系,因为人生来即具有“个体意识”,会自然地借助己之情感、利益,将自我想象、理解为相对独立于外在的完整的个体,这是主观与客观的对立性所在。西方文化对此主张顺应“自我”,强调“个体意识”。这一观念衍生出西方文化诸如“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理念。表面看,有“自我”,“顺应自我”,似无可厚非,但从中国哲学的角度看,便存在割裂“自我”与“外在”的危险。若放任“个体意识”,忽视内外统筹辩证,就会不自觉地走向自我中心主义与盲目排他的极端思维。对此,中国哲学不仅主动觉察,而且运用辩证和联系的观点,对“自我与他者”二元性所包含的巨大坎陷进行弥合,探索破除人己之限隔,构建“他人不

在自我之外”的世界观。这根本上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思维,类似周易“地天泰卦”的“交泰”思想。有学者指出:“每个具体的自我的品格,都在对比中包含了他人的品格。每个人都是在努力成为他人的自我保存和自我实现的过程中达成其自我实现的。”^[4]“忠恕”之道指明做人要有利他之心,在我与人、私与公、情与理之间达成理性的平衡,在成就他人中成就自己。这彰显了中国哲学“反者道之动”的逆向思维品质和中国人“自反克己”态度。

(二)忠恕之别:德性与德行

在思考“忠恕”的区别时,朱熹引用程子的话说:“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违道不远是也。忠恕一以贯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无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体,恕者用,大本达道也……《中庸》所谓‘忠恕违道不远’,斯乃下学上达之义。”^{[2]102}通过这段话可以看出,“忠”与现在所知的“忠诚”“服从”的意义有所区别。忠是“以己及物”的“仁”的内在体悟,是德性层面的。如同其字的构造是上“中”下“心”,即中道之心,不偏不倚,是个体对仁的体悟修为之法。“中”是发动理性的至诚之心,是一种受天道感召而得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增韵》指出:“内尽其心,而不欺也。”今天常用的“忠诚”一词,本义并非“效忠而无异心”,乃是因“忠”与“诚”都是“尽心”“诚敬”的“天之道”,“忠”是对人,“诚”是对心,故而并列。

与“忠”主要指向“尽己”的内修之德相比较,“恕”是向外“推己”的实践之德,是德行层面的。“恕”的构字为上“如”下“心”,生动诠释了推己及人的思维运动过程。《声类》指出:“以心度物曰恕。”《孟子》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万物皆备于我”是儒家关于“天人合一”规律的论证,“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是把握规律的方法。“反身而诚”即人需要克服自身欲望,怀至诚之意,由此便有觉悟之乐在其中。“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的意思是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的观念“强行”,则“求仁莫近”。因此,忠为体,恕为用;忠是天理,恕是人道。朱熹认为“忠恕两个离不得、方忠时未见得恕,及至恕时,忠行乎其间”(《朱子语类》卷第六十三)。在“自反”的理性实践中,“忠”是不离不弃

的内在勇毅,“恕”是逆水而行的外在付出。

(三)忠恕之系:互相统摄

忠与恕意涵相通,是互相统摄的关系。忠是恕的心性强化机制,恕是忠的实践自证机制。没有忠,恕无法持久。没有恕,忠是空中楼阁。孔子在回答“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之时,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可以终身做到的。“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和“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论语·里仁》)中,孔子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具有充足的实践性条件,是“勿为”的范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忠的基于积极性的表达,属于“所欲”的范畴。“所欲”与“勿为”二者互相统摄,彼此成就,共同以实现自我与他者的和合共生为目标。有学者指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主张显示了高度察人察己、知人知己的智慧,证明了孔子与儒家的人性伦理或忠恕之道包含了一个真实可行的价值伦理^[5]。总之,忠与恕是对中国哲学“他人不在自我之外”的世界观基础的道德主张,是“为何人”和“何为人”的辩证统一。“恕”道是一生可以践行的反身之法,“忠”道是一生值得求索的无外境界,“忠恕”是一以贯之的共生形态。

二、“忠恕”思想对中华文明的滋养

2014年9月,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6]伦理观念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共同体的伦理价值体系是由共同体在长期的文明演进中形成的思想共识、价值共识、行动共识体系。两千多年来“忠恕”之道被中国知识分子所推崇,被视为是中华传统伦理道德体系的内核,是修身的法门。其不仅是针对个体修身的学说,也是关系文明产生和发展的理论,因为国家和文明都是

由个体所组成,是无数个体意识的集合。钱穆曾说:“忠恕之道即仁道,其道实一本之于我心,而可贯通之于万人之心,乃至万世以下人之心者。”^[7]“忠恕”之道上升为政治道德是历史的实然,也是应然,因为儒学本身就是政治道德。

(一)文明刚性:“忠”蕴含的家国情怀与自立自强

有学者认为:‘忠’字产生较晚,在目前已识的甲骨文、金文中没有发现‘忠’字。”^[8]今所能查到的最早的“忠”出自《尚书·伊训》的“居上克明,为下克忠”。这里的“忠”已有“事上忠诚”之义,与周代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共同体政治架构产生相关。“忠”是对共同体资源进行组织整合的重要精神伦理,包含着家国同构的价值意蕴。

“家天下”政权在西周初年奠定后,分封制与宗法制使政权与族权结合,整个国成为一个以天子为大宗的等级分明的家族组织,“国家”一词反映了西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国一体的共同体基本特征。如《左传·桓公二年》写到:“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对于天子、诸侯、卿、大夫以及士人和庶人而言,上下级关系是由家族血缘关系决定的,敬父敬兄与敬君敬长官并无根本的对立。但是,家族生活与政治生活毕竟有区别,因而有必要对“孝”这个为家服务的既有伦理向更大范畴的政治伦理进行扩展衍生,这是“忠”的来由。《孝经》对忠孝关系有较为系统的论述,如“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等。《左传》与《国语》中“忠”出现120多次,如“其为吾先君谋也,则忠。忠,社稷之固也,所益多矣”(《左传·成公二年》),“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国语·周语下》)。随着忠的共同体伦理不断成熟,其也逐渐成为儒学教育“文行忠信”四大体系之一,且从追寻天道至诚无息的修身之法逐渐演化为爱国敬业的价值观念。

同时,“忠”还体现着以道义为根基的自立自强的价值主张。孔子、孟子并不提倡“服从”式的“忠”,而是要求君臣各尽其责,尽心竭力使政治纲纪清明。如“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

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孔子总体主张德高者居之,提倡“以君为师”的“忠君”观。而孟子则不同,其“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和著名的“弑君论”呈现出“贵民”的思想。孟子还主张“忠”非“忠君”,而是“忠义”,以道义作为忠的对象,体现出“以师教君”的“忠义”观。之后的荀子和法家人物为强化君权的需要,重新解释“忠”。如“请问为人臣? 曰:以礼待君,忠顺不懈”(《荀子·君道》),“为人臣不忠,当死”(《韩非子·初见秦》)。董仲舒认为“心止于一中者,谓之忠;持二中者,谓之患……是故君子贱二而贵一”^[9]。以上主张都体现了特定历史阶段政治整合的需要。儒家的“忠”蕴含着浓厚的共同体本位思考,反对违背道义的愚忠,鼓励臣的“谏诤”,具有符合现代“民主”实质的一面。

忠道所倡导的自强不息、尽心敬业的家国情怀,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力量之源和价值基础。孔子曰“君子不器”,君子要追寻“忠道”,为天下百姓“尽心竭力”。历史上屈原、诸葛亮、岳飞、文天祥的爱国之举都是“忠道”的具体体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十分吻合“忠道”的生命价值目标。近代以来,中国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儒家文化深刻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继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道义,在“家国不能丢、天下不能亡”的忠道精神的指引下,用血泪书写了救亡图存、抵御外辱的壮丽篇章。孙中山先生曾说:“在国家之内,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如果说忠字可以不要,试问我们有没有国呢? 我们的忠字可不可以用于国呢? 我国到现在说忠于君,固然不可以,说忠于国可不可以呢? 忠于事可不可以呢? 我们做一件事,总是矢志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要把性命去牺牲,亦在所不惜,这便是忠。”^[10]

(二)文明韧性:“恕”蕴含着和合共生与包容互鉴

共同体的产生和发展需要不断吸收原本外在的个体和族群,并凝聚成新的整体。中华文明历史上不断发展壮大,是世界上唯一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从不断流的文明实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没有分崩离析,展现出巨大的政治整合力和文化向心力。“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整体性思维构建了中

华文化独有“天下观念”。《尚书·益稷》有“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诗经》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由于掌握了忠恕之道这一沟通人性的方法,中国便有了实现“天下大同”的远大理想。天下大同、协和万邦、和合共生是中华民族始终如一的价值夙愿,更是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强大韧性的密码。

中华文明不以野蛮征服而是以文化认同塑造文化共同体。正所谓“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大义觉迷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承担了从个体推己及人的修身之道及构建“天下”的思维方法和实践路径,不仅塑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也使中华文化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

如果将人类各个文明所主张价值进行比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是为数不多的兼备普适性与实践性的伦理共识。世界各大宗教教义都有类似的主张。1993年,世界宗教议会的《全球伦理普世宣言》中写道:“我们提议,以数千年来在诸多宗教和伦理传统中一直得到肯定的‘金规则’,作为据以奠定全球伦理的基本原则:‘你不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应该怎样对待别人’,或用正面措辞来说,‘你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对待别人’。这条规则应该不仅对人们自己的家庭、朋友、社团和民族有效,而且对一切其他的个人、家庭、朋友、社团和民族全世界以及整个宇宙。”^[11]

1953年12月,周恩来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2005年9月,胡锦涛在联合国总部发表演讲,全面阐述了构建“和谐世界”的倡议。人类文明从原始走到现代,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文明思维始终制衡着野蛮、征服、杀戮的霸凌思维,成为国际社会和世界人民的普遍共识,这也是人类文明的韧性所在。

三、“忠恕”思想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精神动力

2022年10月,习近平视察河南安阳殷墟遗址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我们现在就是要理直气壮、很自豪地去做这件

事,去挖掘、去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12]儒家的“忠恕”思想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文化资源。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的文化使命。”^[13]“忠恕”思想既是一个内外贯通、体用融合、价值递进的个体德性之说,也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哲学,为中华文明的刚性与韧性提供文化滋养。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从理论到实践,从精神到物质的过程,必然要求统筹中华民族自身安全与人类集体安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与世界实现普惠共荣的内外关系。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尽己的过程,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推己及人的探索。费孝通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对中华“忠恕”思想在政治哲学层面的最好凝练,用浪漫的美学表达为思考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的关系提供启示。“各美其美”,指每种文明首先要自立自强。中华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以守正创新、与时俱进继承发展本民族文化思想,既不唯我独尊,也不邯郸学步,不迷信、不盲从,走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发展之路;“美人之美”,指在“各美其美”基础上,不同文明之间要互相尊重、欣赏,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维去包容不同价值观念,实现互不侵犯、互不倾轧、和平共处;“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从共处到共进的过程。不同文明在尊重包容基础上加强交流互鉴,消除观念和利益层面的分歧,主动超越狭隘个体思维,取长补短、相互借鉴,深化共识,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这正是“忠恕”思想所揭示的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相处之道升华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共进之势的内在逻辑。

人类本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但长期以来严重缺乏对“命运共同”的价值认知。新时代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通过理论创新和文化创新,在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增进人类集体安全和共同福祉,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明了前进方向。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1).
- [2][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8.
- [3]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54.
- [4]杨立华.中国哲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13.
- [5]成中英.发展全球价值伦理:中西价值体系的层次与其整合体现孔子与儒家仁爱伦理与忠恕之道[J].江淮论坛,2009(2).
- [6]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4.
- [7]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三联书店,2002:98.
- [8]夏海.国学要义[M].北京:中华书局,2018:342.
- [9][汉]董仲舒.春秋繁露[M].陈蒲清,校注.长沙:岳麓书社,1997:209.
- [10]孙中山.三民主义[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65.
- [11][德]孔汉思,库舍尔.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M].何光沪,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159.
- [12]张璐.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N].人民日报,2023-04-18(9).
- [13]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理论导报,2023(9).

责任编辑:许立坤

东盟“中文 + 职业技能”教育的 SWOT 分析及发展策略探究

吕明璋,赖紫弦,刘振平

(南宁师范大学,广西南宁 530001)

摘要:“中文 + 职业技能”教育是国际中文教育和职业教育深度融合的特色教育模式,该模式精准对接中文学习新需求,为发展国际中文教育提供了新思路。近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东盟国家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响应,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东盟已有8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国际中文教育经历着重大转型,孔子学院也乘着职业教育走出去的东风实现了内涵式发展。“中文 + 职业技能”教育还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如标准体系不够完善、东盟国家对国际中文教育认知存在偏差、与英语培训项目产生实际竞争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文 + 职业技能”教育高质量发展。通过运用 SWOT 分析模型分析当前东盟“中文 + 职业技能”教育面临的内部优势和机遇、外部劣势和威胁,进而探索东盟“中文 + 职业技能”教育高质量发展对策。

关键词:东盟;“中文 + 职业技能”教育;国际中文教育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4.01.014

[中图分类号]G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4)01-0099-09

当前,“中文+职业技能”教育发展势头强劲,国别化区域化的研究也逐步深入,尤其是对与中国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的东盟的研究日趋增多。如何让国际中文教育满足东盟中文学习者的职业技能需求和满足当地中资企业的人才需求,并建立中文教育新的发展模式,需要成熟的理论与方法作为指引。因此,新时代应全面系统地分析东盟的“中文+职业技能”教育发展现状和新特点,统筹规划新布局,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服务。

SWOT 分析法是一种用于战略规划和组织管理的学术工具。此方法通过评估内外部环境的四个核心要素即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寻找最佳战略方向和行动计划。其中,优势和劣势是内部因素,机遇和威胁是外部因素,这些因素被整合到 SWOT 矩阵

收稿日期:2023-09-23

基金项目: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课题重点项目(22YH28B);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YCSW2023453);广西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课题(JGY2022217)。

作者简介:吕明璋,男,南宁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中文教育;赖紫弦,女,南宁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中文教育;刘振平,男,南宁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新加坡教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顾问,泰国格乐大学中国国际语言文化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汉语语法与国际中文教育。

中,帮助个体或组织了解现状和潜在发展方向,更好地制定战略决策。SWOT分析法在经济、管理、市场营销领域等得到广泛运用,被认为是一种有价值的评估工具。近五年来,有学者将其运用到国际中文教育与中文国际传播的研究中,如曹瑞红等就罗马尼亚中小学本土中文教材的数字化研发的现状及对策进行了探索^[1],金晓艳、赫天姣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中文教育集群的发展^[2],郑带利围绕广西与东盟的汉语国际教育发展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3]。目前尚无学者运用SWOT分析法来研究“中文+职业技能”教育。本文运用SWOT分析法,分析东盟的“中文+职业技能”教育的内部环境、外部环境以及面临的机遇与威胁,为推动“中文+职业技能”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具有可行性的策略。

一、东盟“中文+职业技能”教育的内部优势和外部机遇

(一) 内部优势

1. 国际中文教育在发展中调整与转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对中文学习的需求持续旺盛,全球有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中文教学,81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4],中文教育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突破,中文的经济价值愈发凸显。从“对外汉语教学”“汉语国际推广”“汉语国际教育”到“国际中文教育”,学科名称的更新迭代体现了学科内涵的拓展与升级。有学者提出将2020年确定为国际中文教育学科建设转型之元年^[5]。“中文+职业技能”教育勃兴,反映了国际中文教育在学科重心、发展方式、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的转向。学科重心上从语言教学为主向兼顾语言教学与服务经济社会转变,发展方式上从单一的语言教育向多元化“中文+职业技能”教育转变^[6],人才培养模式上从单纯的语言学生成向“中文+职业技能”复合型人才转变。语言的学习并不是孤立的,语言是人们交际的重要工具,能够促进中外人文交流、文明互鉴、民心相通。所以,培养既精通汉语又有不同专业背景的高层次人才成为国际中文教育的一项重点工作。

2. 国家和地区对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政策支持。职业教育国际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积极参与职业

教育国际交流、分工、合作、服务、竞争,职业教育要素向外集聚、流动和扩散的历史过程^[7]。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职业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成为未来教育交流的重大方向。中国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走向国际舞台,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并在其中扮演越来越关键的角色。职业教育国际化是推动职业院校文化传承与国际交流的重要渠道,也是促进世界各国和地区的职业院校深度合作的重要平台。此外,职业教育国际化还能够提升服务国家智能制造转型升级的能力。推动职业教育国际化,探索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之路,为世界职业教育提供中国方案,不断提高我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是我国职业院校追求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和自发行动。

3. 孔子学院内涵式发展的需要。孔子学院是由中外合作建立的非营利性教育平台,其目标在于促进中文的传播,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推动中外人文交流。截至2019年底,全球共建立了550所孔子学院和1172个中小学孔子课堂^[8]。当前,孔子学院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正处于发展转型的重要时期。作为规模化发展的结果,孔子学院应用内涵式发展理念引领转型改革,更关注国际中文教育提质增效,并拓展其平台功能。

随着海外中文学习热度的持续增长,各国对孔子学院的关注度也不断提高。孔子学院的功能与定位是语言教育和文化交流传播。当前,为满足人们对中文学习的新需求,增强中文教学的活力,可探索在语言学习的供给侧进行创新改革。孔子学院可紧密联系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将中文教学与其他领域(尤其是职业技能培训)有机结合起来。孔子学院开发的“中文+”教育课程,旨在使学习者在获得较高水平的中文能力时也能掌握某项职业技能,契合各地中文人才的需求,受到了广泛好评。作为海外中文教育的重要枢纽和连接海外华侨、中资企业与当地社团的关键纽带,孔子学院与各方紧密合作,共同整合资源,扩大中文在海外的应用范围,为促进中文国际传播开辟新途径^[9]。

(二)外部机遇

1.持续推进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2013年,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首倡与东盟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不断加强,经济融合持续深化,经贸合作进展迅速,人文交流更加紧密,中国—东盟关系已成为亚太地区合作中最为成功和充满活力的榜样,也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例证。多年来,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合作不断深化。在双方持续努力下,通过全方位的制度化对接与升级,实现了全面性的整体合作。

中国和东盟建立了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正携手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和东盟的合作基于共同的认同和默契,在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知识信息传递、文化思想传播、专业技能交流和经济贸易等方面的合作都需要中文人才的参与。随着交往的日益深化,双方已经建立了多层次的交往合作机制和平台,涵盖国家、地区以及院校等不同层面,涉及经贸、人文、卫生等多个领域,所培养的职业技能人才集中于经贸、科技领域,如“中文+旅游”“中文+高铁”“中文+电商”等。东盟的“中文+职业技能”教育培养懂技术、会中文的复合型人才,既能增强他们在当地劳动市场的竞争力,又能满足企业需求,从而改善民生状况,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提供人才供给和智力支持。

2.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根据中国商务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202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到2020年为止,中国已在沿线国家开办了1.1万家企业,这些中资企业雇佣的外国员工数量占员工总数的60%左右^[10]。“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众特别是年轻人,主观上有着强烈的职业发展诉求,目前东盟国家职业教育发展水平相对偏低,需要更多职业培训项目。企业希望从市场上得到高素质的工程技术人才、管理人才,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项目所在国政府也希望本国青年通过建设项目得到实际锻

炼和有效培训,成为推进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生力军。2023年,中国100大跨国公司的海外资产总额为117 668亿元,海外营业收入为91 099亿元^[11]。这些数据表明,中国对外投资稳步增长,中国跨国企业在海外的发展范围也在逐步扩大。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步伐日益加快。在这样强劲的需求牵引下,为了满足中国企业在东盟生产经营的迫切需求,培养本土的、具备国际视野和通晓国际规则的技术技能人才成为中国职业教育面临的时代要求。我国的职业技术培训机构如“鲁班工坊”等,正在迅速走向世界,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显著提升。

3.东盟多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在东盟国家中,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新加坡、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已经将中文纳入其国民教育体系。这些国家对中文的纳入程度较深,层级也更高,其国民教育体系的特色鲜明,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东盟可以说是中文纳入发展最为出色的地区之一^[12]。李宇明和唐培兰根据分类标准,将外语分为外事外语、领域外语、泛领域外语、基础教育外语、重要外语和重要语言等六类^[13]。在东盟国家已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情况下,中文教育被归类为基础教育外语,这意味着中文教育在东盟国家的基础教育阶段中占有重要地位,具备坚实的基础和广泛的学生来源。以“中文+职业技能”教育为抓手,能够让中文成为东盟民众认同的高价值语言,扩大中文的使用场景和应用范围。

二、东盟“中文+职业技能”教育的内部劣势和外部威胁

(一)内部劣势

1.“双师型”教师供给短缺。教师是“三教”问题(教师、教材与教法)的核心,构建“中文+职业技能”双师型教师队伍是推动国际中文教育与职业技能教学发展的重要前提。总体上来看,“双师型”教师队伍的构建存在诸多不足,数量短缺是当前面临的主要难题。“中文+职业技能”双师型教师是既掌握国际中文教育相关知识,又精通某项实践技能培训的专业教师,但该类教师的培养途径相对单一,主要

有两种来源:一部分源于有限的职业技术类师范院校,通过培训使其掌握国际中文教学技能;另一部分由成熟的国际中文教师学习职业技能相关知识转型而来。“中文+职业技能”双师型教师培养与培训之间的协调问题日益突出,学校和企业之间的深度合作尚未得到有效落实。尽管很多培训平台是由院校和企业等组织共同建立的,但双师型教师的培养和培训在内容、效果等方面并没有达到预期,老师们罕有机会深入实训平台进行实践,缺乏足够的实践锻炼,因而无法有效且系统地向学生传授职业技能类知识。此外,目前的师资队伍还存在一些结构性失调问题,如教师年龄普遍较大、学历偏低以及性别比例不平衡等^[14]。

2.教学资源匮乏。东盟国家多为新兴经济体,“中文+职业技能”领域仍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着一系列共性问题。不同国家之间的语言和职业教育水平与中资企业的需求存在较大差距,因而需要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和适用性强的“中文+职业技能”资源。但目前相关教育资源供应不足,内部的供应链和储备链不够完善,未能实现因地制宜、精准对接。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也未能实现动态更新,而校企合作的管理运营机制也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中文+职业技能”教育相关课程有其特殊性。首先,课程体系内中文和职业技能课程仍然相对独立,缺乏有效的融合与协调。在学习过程中,中文和职业学习常常存在竞争关系,导致中文课程占据主导地位,职业学习方面则相对不够深入,这就偏离了培养初衷。其次,理论和实践之间的鸿沟尚未被克服,理论教学与实践技能的培养存在问题^[15]。“中文+职业技能”教育本质是应用型教育,语言上培养学生在岗位中运用中文的能力,职业技能方面希望学生掌握岗位必需的实操能力和技术。这些要求都是传统的中文教学资源所不能满足的,开发、研制专用教学资源迫在眉睫。

3.缺乏相关标准建设机制。加强标准建设是“中文+职业技能”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2021年7月1日,《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以下简称“《等级标准》”)正式实施,标志着国际中文教育进入

了专业化、标准化、规范化、国际化的新阶段,也突显了中国作为中文母语国为全球中文教育作出的重要贡献。东盟的不同国家和地区在教育质量标准方面存在差异,可能影响对“中文+职业技能”教育质量的评估和认可。

据教育部中外语言合作交流中心统计,马来西亚、泰国等东盟国家已开设“中文+职业技能”课程,这些课程将HSK等级考试和商务汉语考试评分标准作为国际中文教育的汉语水平考核标准。显然,以上两种测试缺乏针对性,不能真正衡量学习者的职业中文水平。目前,职业教育领域的标准还在建设中,这主要是因为职业教育专业性强,专业术语多,制定标准不是一日之功可成。建立一个全面的职业中文能力标准框架体系,不仅可以准确评估学习者在特定职业领域的中文水平,而且可以指导职业中文教育教学实践,并为企业语言与职业技能的人力评价和岗位技能的考核提供依据和标准。通过与现有的《等级标准》相结合,职业中文能力标准框架体系能够构建高质量的国际中文教育标准体系,为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顶层设计提供支持^[16]。

(二)外部威胁

1.国际社会存在认知偏差。认知偏差,指人们在信息处理和决策过程中,由于主观因素、认知限制或判断失误等原因,对信息收集、处理和解释产生偏离常规或理性判断的倾向。它们可能影响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观察、理解和评估,并导致错误的判断、偏见或误导。近年来,中国的发展被西方视为威胁,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在西方部分国家遭遇挫折。从2020年初开始,美国有13所孔子学院宣布关闭;2020年4月,瑞典的孔子课堂也全部关闭,同年6月德国巴伐利亚州召开听证会调查孔子学院。在孔子学院正努力进行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西方媒体中仍然存在着各种负面声音,使得孔子学院陷入舆论困境。个别地方对“中文+职业技能”教育存在一定程度的认知偏差,对中国提出的倡议和方案存在顾虑。

2.东盟国家内部不确定性增加。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周边的安全状况总体上保持稳定可控状态。然而一些大国在亚太地区增强了军事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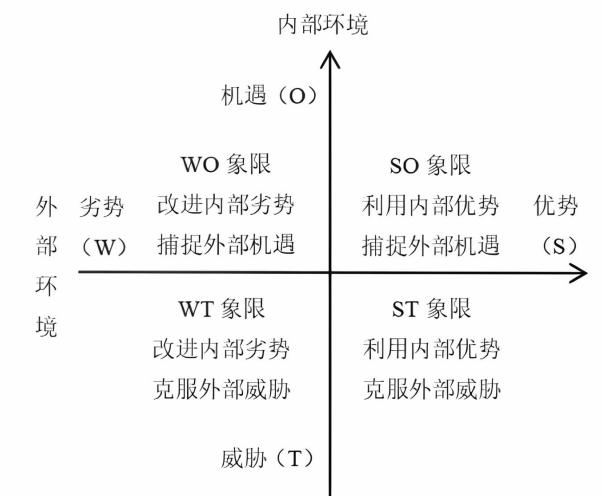
加强和扩大了与亚太地区的双边同盟体系,同时积极构筑新的“小多边”安全机制,试图对中国施加更大的战略压力。美国提出的“印太战略”以及其所构建的所谓“民主价值观联盟”等,都是典型表现。东南亚国家由于其独特的地缘位置,成为一些大国积极争取的对象,从而增加了不确定性。2021年,美国总统出席了由东盟主持的东盟—美国峰会和东亚峰会,旨在保持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并强调对《东盟印太展望》的支持。拜登政府还加大对东盟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试图削弱东盟国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动力^[17]。受此影响,个别国家选择与美国合作,进而减缓与中国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经济走廊建设方面的合作步伐。

3.与英语培训项目发生竞争。国际中文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学习者具备中文在工作和生活中所需的能力,未来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将重点推向“以中文为媒介学习”和“以中文作为学习对象”这两个方向^[18],“中文+职业技能”教育的兴起和发展是其体现。语言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本,职业需求成为学习中文的主要因素,表现为就业需求和职场需求。东南亚地区存在众多语种和语言,而英语作为工作语言在东盟地区占据着重要地位。虽然东盟被看作民族、文化和语言的大熔炉,但英语在其中的地位一直是独特的。

语言之间的竞争是语言关系的产物,是由语言经济属性决定的。观察当前东盟语言竞争的情况,可以看出汉语和英语之间的竞争是焦点之一。其中,美国逐渐认识到加强民间纽带和促进个人与社会层面交流的重要性,开始实施一系列英语语言教学推广项目,旨在扩大与东盟国家之间的民间交往活动,以消除美国与东盟国家间合作的障碍,促进相互理解和信任。2020年,美国向东盟国家提出了150万美元贷款的“亿万未来倡议”和“英语教师培训+”计划,旨在进一步提升英语教师的能力和素质^[18]。目前,英语已经成为全球的公共产品,而中文则正在朝向成为区域性的公共产品迈进^[19],“中文+职业技能”教育在推动这一进程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虽然中文在宏观经济领域和微观职业场域已经有所突破,但与英语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

三、东盟“中文+职业技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策略选择

从SWOT分析象限图(如下图所示)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目前东盟“中文+职业技能”教育模式的优势与劣势、面临的机遇与威胁,分别得出SO、WO、ST、WT四个象限下的策略,进而得出东盟“中文+职业技能”教育的高质量发展的策略选择。



SWOT 分析象限图

(一) SO 象限:优势发展策略

根据上图所示,SO象限被认为是最优态势,因为在此状态下,不仅内部具备优势,外部机遇也达到了最佳状态。应通过充分开展调研、明确具体需求,整合多元主体、构建多维框架,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制度建设,从而达到“中文+职业技能”教育的最优态势。

1.充分开展调研,明确具体需求。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了解东盟各国的教育发展现状以及当地民众的实际需求对于做好顶层设计和教育规划至关重要。因此,进行系统全面的调查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首先,了解东盟各国的“中文+职业技能”教育发展现状是关键。这包括了对每个国家教育政策、课程设置、师资培养等方面的研究。通过分析教育制度和政策,可以了解该地区教育的整体情况,以及各国教育的差异性和共同特点。此外,还应重点关注东盟国家在中文和职业技能教育方面的发展情况,包括教材和教学方法的使用,教师培训和评估,学生学习成果的评估等方面的状况。

其次,了解当地民众的实际需求。通过与当地居民、学生、企业以及政府的交流,了解他们对“中文+职业技能”教育的看法和期望,以便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教育政策和发展具体的教育项目。在调查研究中,应采用定量和定性研究相结合,充分考虑文化差异、语言障碍和研究伦理等因素,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最后,调查研究的结果应该得到充分的利用。调研结果可以用来指导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教育项目的设计,从而更好地满足东盟各国对“中文+职业技能”教育的具体需求。此外,研究结果还可以用作教师培训和发展的依据,促进教育质量的提高,并提升学习者的就业竞争力。

2.整合多元主体,构建多维框架。东盟“中文+职业技能”教育是一种新型的职业教育国际化形式,它强调价值协力、利益一致和责任共担,注重院校、企业、政府、行业机构等多元主体的协调配合,并倡导主体间的新型沟通方式。东盟“中文+职业技能”教育将整合多方资源,实现多元主体协力共建。可将主体划分成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维度。宏观上,各级政府部门在“中文+职业技能”教育中发挥规划、推动与政策保障的作用,是重要的引领性力量;中观维度包括中外高校、企业、孔子学院、社会语言教育机构等,其作为重要主体参与“中文+职业技能”人才培养,需调动一线教学单位的积极性;微观上具体到“中文+职业技能”教育的直接参与者,即中外教师和学习者,应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适应双师型教师和复合型人才的角色。应根据“市场主导、宏观支持、中观参与、微观教学”整体架构要求,建立一个职责清晰、规范高效的运营管理模式,充分发挥各方优势,采用多种方式调动外方政府和机构的参与热情,以实现共赢。

3.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制度建设。首先,政府要加强顶层设计,制定中长期“中文+职业技能”教育发展规划。东盟各国“中文+职业技能”教育发展有共性和个性,应秉承“一国一策”“分国施策”理念,从成功项目和模式中汲取经验加以借鉴运用。其次,政府应强化资源统筹,推动建立高级别的交流合作机

制,根据当地“中文+职业技能”教育实际需求,出台相关职业中文标准,逐步解决“教师、教材、教法”的问题。再次,推动政策衔接,对接我国与东盟各国职业教育标准与技术标准,推动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走出去”。政府应明确目标和进行有效管理,并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从而实现东盟地区“中文+职业技能”教育的长期发展。

(二)WO象限:扭转型策略

WO象限下,既要捕捉机遇又要改进内部劣势。可完善双师型教师人才培养体系,搭建教学资源开发、共享平台,构建“中文+职业技能”教育教学标准体系。

1.完善双师型教师人才培养体系。“中文+职业技能”教育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所需师资的独特性,对教师的要求应是既掌握汉语基础知识和教学理论,又拥有职业知识和技能的双师型教师。目前,应从两条途径加强对双师型教师的培养。一是培训国内相关专业的职业教师,使其尽快掌握国际中文教育的内容以及面向海外学习者的教学方法和技巧,这是比较经济的做法。二是针对海外孔子学院中文教师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培养他们掌握职业技能和教育方法。此外,促进企业职业技能人才成为复合型师资,也是一条有效的解决路径。一线的技术工人拥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和知识,熟知行业的新动态、技术的新发展。通过国际中文教育培训,可以使其掌握国际中文教育内容,并提升他们的语言教学技能,从而为“中文+职业技能”教师的培养提供有力支持。

2.搭建教学资源开发、共享平台。教学与学习资源是职业中文教育教学的基础,是教师开展教学和学生进行学习的重要素材。由于东盟各国的语言和职业教育水平无法直接满足中资企业需求,因而需要有平台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和适用性的“中文+职业技能”资源。第一,人才培养方案将目标定位于国际化的语言能力和本土化的职业技能,并基于这一目标创建双线贯通的“中文+职业技能”课程体系。在课程设置上,平衡中文和职业技能的课时,并给予恰当的学分比例,开发日常中文课程、职业中文课程以及职业技能课程。第二,建立多维协同的合作机

制,促进资源共享。通过加强政府间的教育合作,共同推动中外教育机构、企业和行业协会等主体共同助力“中文+职业技能”资源共建和共享。通过合作培养、学生互访、技能竞赛、研究论坛等多种方式,建立协同育人平台,以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交流机制^[15]。

3.构建相关教育教学标准体系。要实现“中文+职业技能”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完善办学主体的准入标准,并健全办学实施的过程标准。同时,还需要构建以能力资格证书为导向的准出标准,以确保学生通过这种教育能够获得能力认证^[20]。

为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建立一套准入标准,以确保办学主体具备一定的能力和资质。在教学机构的准入标准方面,侧重于确保设立的专业符合市场需求,并且具备完善的教学管理体系和实训条件。另一方面,对于教师,注重专业教学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以更好地满足学生和市场的需求。此外,还需要制定一系列的办学过程标准,确保教育的过程和实施能够高效、规范地进行。最后,需要构建准出标准,即中文+某职业技能等级标准,以能力资格证书考试为引领,对学生进行评估和认定,保证他们具备适应就业和实践需求的能力。同时,动态修订教师、教材、教学、考试、评估等系列标准,加强《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等系列标准的应用推广。

(三)ST象限:优势防御策略

ST象限启示我们,要利用内部优势、克服外部威胁,调动各种积极因素,破解东盟“中文+职业技能”教育的困境。

1.数字化赋能“中文+职业技能”教育。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为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和机遇。一是做好“中文+职业技能”教育数字化发展的规划。根据《国际中文教育数字资源建设指南》等政策文件,规划整体工作方案,致力于建立一个充满活力、高效运作、权责分明、协同开放的发展体系。二是完善发展保障体系。基于充分的调研和论证,制定实施条例和细则,并注重各方的融合共生,以形成合力;加强支持体系的建设,通过提升组织管理架构、制定标准、开发平台资源以及确保人才储备和资金保障等方面的能力,推动支持要素

形成协同发展的动力。

具体而言,“中文+职业技能”教育数字化主要包含三个部分,即教师数字化、资源数字化、教学数字化。国际中文教师要提高数字能力,不仅要具备积极接纳新兴教学技术的心理素质,提升终身学习和更新教育教学技术的能力,还应具备改编或自主创作教学资源的能力,熟练运用智慧教学平台进行教学。目前,学界对国际中文教育资源关注较多,国家也出台多项文件助力其建设。教学数字化是指通过国际中文教育智慧平台,准确建立学习者画像,定制个性化的学习方案和教学资源,并提供全流程的信息化和智能化支持,帮助教师开展更精确的教学活动,更加科学有效地评估学生的学习情况。

2.市场化运作“中文+职业技能”教育。“中文+职业技能”教育具有经济价值,应坚持政府引导,充分利用各方资源,营造健康、积极的竞争环境,推动资金流动,鼓励市场主体扩大参与。中国和东盟都非常关注职业教育的发展,双方有着共同的需求,即稳定现有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系统,重新塑造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结构,职业教育的合作空间变得非常广阔。一方面,中文教育机构平台要转变思维,主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拓展“中文+职业技能”渠道。另一方面,中文作为第二语言(外语)的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粗放无序的现状亟待规范。

东盟传统产业的创新发展可以拓展海外中文的使用场域。以东盟传统产业旅游业为例,中国是东盟的重要旅游客源市场,东盟也是中国的重要旅游目的地,2019年中国赴东盟国家高达3948.3万人次。中国与东盟国家互联互通、互融互促的纽带正在以旅游合作的方式逐步呈现,懂中文的旅游行业人才无疑能够为中国游客提供更贴心、优质的服务。

3.拓展中国—东盟语言交流、促进文明互鉴。“中文+职业技能”教育能够为东盟培养大批的“通技能”“精中文”“知中国”的复合型人才,这样的人才不仅是知华、友华、爱华的国际人士,更是中外语言文化交流互鉴的使者。2022年1月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中文有望在RCEP自贸区内成为共同语言和公共产品,进一步

推动中文成为更多国际组织、国际会议官方语言或工作语言,促进中国与东盟互学互鉴。

语言是重要的职业资本,随着“中文+职业技能”教育的发展,中文的应用场景扩充到各个行业,为海外学习者提供更丰富的学习体验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实际工作中,使用中文进行交流沟通越来越普遍。中国—东盟建立稳定有效的沟通机制和开展特色鲜明的品牌项目是中文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这些机制和项目为中国—东盟语言交流、文明互鉴提供了坚实的架构平台。要积极利用“汉语桥”系列项目、中外文化年和旅游年等品牌,通过这些窗口展示风采并与世界进行沟通,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四)WT象限:积极防御策略

WT象限下,东盟“中文+职业技能”教育面临外部环境的挑战和内部环境的劣势,积极防御策略就是改进内部劣势、克服外部挑战。东盟“中文+职业技能”教育的外部挑战,主要是对中国的认知偏差、东盟内部的不确定性、与英语培训项目潜在的竞争。当前,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尊重东盟地位、加强语言治理和规划,以有效应对东盟“中文+职业技能”的外部挑战。

1.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强调摒弃隔阂和优越观念,主张文明互鉴和共存。实现命运共同体的自主性要求尊重多样性,并超越个体的整体性思维,以满足共同的需求。教育既是文化的构成体,又是文化传递与发展的重要途径^[21]。东盟的“中文+职业技能”教育在发挥教育文化传播功能的同时,具备媒介作用,有助于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另外“中文+职业技能”教育还在减少认知距离、消除戒备和误解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教育交流作为一个公共平台,可以促进观点碰撞和思想对话,让参与方表达思想、传递信息和进行情感交流,帮助缩小彼此之间的情感和心理距离,进而减少甚至消除认知上的偏见,促进国际理解、认同和包容。

2.尊重东盟地位。美国的“印太战略”加深了东盟对自身地位和内部团结面临冲击的忧虑,为中国

和东盟之间增强政治互信创造了契机。在这种情况下,最优选项是维护东盟的中心地位和加强团结,关键是以东盟相信中国将坚守多边主义外交,不谋求在地区合作中的主导地位,同时坚定支持东盟团结。

3.加强语言治理和规划。在全球公共事务中,语言作为思想工具和文化媒介的作用越发重要。中国与东盟共同行动的共识以及心灵思想的默契都建立在语言的基础上。在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知识信息传递、文化思想传播、技能专业交流和经贸合作等方面的发展都需要克服语言障碍。在全球治理中,语言治理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要议题^[22]。尤其是与东盟国家的跨境语言交流,关乎国家安全、边境稳定和谐。随着语言经济的发展,应充分认识和利用中文作为商品和资本的属性,并加快语言产业化的进程。例如,语言产业包括语言教育、语言测试、语言出版、语言翻译等多种形式,本身不仅能够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还能促进中文国际传播,进而进一步提高中文的竞争力。

四、结语

在新发展阶段,“中文+职业技能”教育通过中文与职业技能相结合,延展了国际中文教育的链条,扩充了中文作为公共产品的功能。本文基于SWOT分析法,分析了东盟“中文+职业技能”教育的主要优势与机遇、劣势与威胁,并提出了相应的策略。只有坚持多管齐下、内外联动,包括中国与东盟各国政府、高校、企业、机构等的相互支持和通力合作,方能推动东盟“中文+职业技能”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 [1]曹瑞红,李立,宋春香.罗马尼亚中小学数字化中文教材研发的SWOT分析与对策[J].国际中文教育(中英文),2022(4).
- [2]金晓艳,赫天姣.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中文教育集群发展的SWOT分析[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
- [3]郑带利.“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广西——东盟汉语国际教育的SWOT分析[J].传播与版权,2019(4).

- [4]孙春兰强调:扎实推动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 [EB/OL]. (2023-01-28) [2023-09-08].http://www.gov.cn/guowuyuan/2022-12/09/content_5730892.htm.
- [5]李泉.2020:国际中文教育转型之元年[J].海外华文教育,2020(3).
- [6]李宝贵,刘家宁.新时代国际中文教育的转型向度、现实挑战及因应对策[J].世界汉语教学,2021(1).
- [7]侯兴蜀.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内涵、形势及推进策略[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2(21).
- [8]2019 年国际中文教育大会期间签署部分新设孔子学院等中文教育机构合作协议[EB/OL].(2019-12-30)[2023-09-08].http://www.hanban.org/article/2019-12/11/content_795882.htm.
- [9]李宝贵,庄瑶瑶.新时代孔子学院建设的守正与创新[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
- [10]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0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EB/OL]. (2021-09-29) [2023-09-08].https://www.gov.cn/xinwen/2021-09/29/content_5639984.htm.
- [11]2023 年中国 100 大跨国公司发布:中国石油、中国中化、中国石化位居前三 (附榜单)[EB/OL]. (2023-09-20)[2023-09-22].<https://finance.sina.com.cn/hy/2023-09-20/detail-imzniyui4682146.shtml>.
- [12]李宝贵,庄瑶瑶.中文纳入东盟国家国民教育体系的特征、优势及启示[J].教育科学,2023(2).
- [13]李宇明,唐培兰.论汉语的外语角色[J].语言教学与研究,2020(5).
- [14]闫克,马宁.产教融合赋能“中文 + 职业技能”双师型教师人才培养新模式[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23(2).
- [15]马莉,高皇伟.优化“中文 + 职业技能”资源机制[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02-06(6).
- [16]宋继华,马箭飞,朱志平,等.职业中文能力等级标准的构建[J].语言文字应用,2022(2).
- [17]刘稚,安东程.美国“印太战略”对中国—东盟关系的影响与应对[J].和平与发展,2022(4).
- [18]黄海刚,闫芳芳.“印太战略”背景下美国与东盟教育合作战略研究——兼论对我国的影响及应对之策[J].比较教育研究,2023(1).
- [19]余江英,陈涵静,朱梦洁.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导向与服务转向[J].华文教学与研究,2023(2).
- [20]曾云,吴坚.教育援助视域下东南亚“汉语 + 职业技能”教育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路径[J].黑龙江高教研究,2022(2).
- [21]徐波.试述教育与文化的关系[J].上海高教研究,1994(1).
- [22]李开,贾付强.全球在地化下的语言治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路径探析[J].广西社会科学,2023(2).

责任编辑:祝远娟

以村规民约推动乡村治理法治化的路径研究

张 健,陈佳栋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 100083)

摘要:村规民约作为村民处理乡村事务的自我管理机制,具有地域性、协商性、传承性和法治性等特点。目前,村规民约推动乡村治理法治化,面临着村规民约的制定和内容不够规范,执行滞后,法律效力模糊等问题。以村规民约推动乡村治理法治化,需发挥党的组织领导作用,强化村规民约的法治资源供给,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村规民约中的法治功能,完善公众参与的基层协商机制,更好地促进村规民约适应新时代乡村治理需求。

关键词:村规民约;乡村治理;法治化;基层协商民主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4.01.015

[中图分类号]D422.6;D92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4)01-0108-05

在乡村治理中,村规民约作为根植于乡村本土资源的非正式规范系统,为中国乡村社会提供了人民群众的自我管理机制。村规民约在规范村民言行、解决日常纠纷和维护村民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应推动村规民约与时俱进,使之符合新时代乡村治理法治化的要求,充分发挥村规民约助推乡村振兴的作用。

一、村规民约的主要特点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建设覆盖城乡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

中的积极作用”^[2]。推动乡村治理法治化是提升社会治理的整体法治化水平的重要内容。村规民约是村民为了办理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维护社会治安,调解民间纠纷,保障村民利益和实现村民自治,民主议定和修改并共同遵守的社会规范^[3],是村民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一种约定,在推动乡村治理法治化中具有显著特征。

(一)根植乡村本土资源,具有地域性

村规民约根植于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村庄,源于村民的生产生活实践,具有很强的“本土味”。村规民约的地域性主要体现在反映不同地区的生产生活特点。比如,在我国福建省闽东地区的渔村,由于该地区具有渔业发达、城区河道密布等特点,当地的村规民约常包含禁渔期、城市内河整洁的规定,如《宁

收稿日期:2023-12-08

作者简介:张健,男,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治理的理论与实践;陈佳栋,女,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经济法。

德市城市内河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二款为此规定“村(居)民委员会可以依法制定村规民约或者居民公约,引导村(居)民自觉保护城市内河设施,维护城市内河整洁,协助做好辖区内城市内河的清淤疏浚等工作”;内蒙古的山川地带由于生态环境相对脆弱,当地村规民约中往往包含有关绿化面积、防止沙化的规定。如赤峰市松山区的头把伙村地处半山半川地区,该地村规民约中规定“……无粪堆粪坑、无乱搭乱建、无柴草垛、无垃圾。保护绿化地段的林木”;在云南和贵州等地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村规民约大多含有保护民族文化、宗教习俗、节日庆典的服饰传统等内容;在黄河流域的村落,村规民约则包含水土保持和节水灌溉的相关规定。由此可见,村规民约是基于各地域的风土人情和生产生活实际需要形成的一套规章制度。

(二)体现基层协商民主,具有协商性

村规民约的制定和执行体现了基层协商民主。村规民约主要根据乡村当地的具体实际、风土人情以及村民共同的生产生活需求,由村民会议、村民委员会或其他形式的民间组织通过民主协商的形式,经过反复讨论与修正形成,反映了村民参与基层管理、表达意愿和执行集体决策的能力。村规民约的制定强调发扬民主、村民广泛参与,充分吸纳村民建议,能够得到村民的认可和支持。村规民约有着较强的动态调整能力,可以较好地适应乡村发展和满足村民需求。从某种意义上讲,村规民约发挥作用的原因在于,村规民约制定和执行的全过程能够反映村民的自主意愿,并能较好地与当地村庄的风土人情和传统习俗相结合,保障村民正当权益。

(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具有传承性

根植于乡土的村规民约充分体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孝敬父母、尊老爱幼等观念,通过村规民约的形式得以传承,在内容上体现为注重人伦义理、崇孝尚德、以劝善惩恶为己任、以稳固乡村社会秩序为目的等。比如,在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居住在客家土楼的居民依托“宗祠文化”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村规民约体系,这些规定

强调家族纽带和集体荣誉,鼓励村民共同遵守传统礼仪,通过乡贤文化等推动村规民约的实施,强调文明和谐的价值观念,既保留传统文化元素,又适应现代社会治理的需求。又如,陕西省延安市运用深厚的“秦腔文化”资源,通过秦腔戏剧的形式传播村规民约,既能提高村民对村规民约的认同感,又促进了村规民约的宣传普及。传统的人伦观念和文化内核,基于历史传统、社会环境、宗族观念等纽带有机结合在一起,以村规民约的形式实现。可见,村规民约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且通俗易懂、简约易行,因而对稳定乡村治理结构、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乡村治理水平有着重要的作用。

(四)符合国家法治体系建设要求,具有法治性

村规民约是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文件精神在乡村治理中的一种延伸,符合国家法治体系建设的要求,推动了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在乡村各方面、各领域的实施,彰显法治精神。《关于做好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村规民约、居民公约是村(居)民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行为规范……是健全和创新党组织领导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现代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重要形式。”^[4]可见,国家法律认可和支持村规民约在基层治理中发挥法治作用,通过完善村规民约的制定主体和程序,使村规民约更好地维护村民集体利益和调整乡村社会关系。村规民约的法治性具体体现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促进法律实施。村规民约可成为传达国家法律精神的有力载体,通过符合地区习惯的方式促进人们更好地理解和遵守法律,有效、及时地解决问题;二是促进社区治理。村规民约通过涵盖村民日常的行为规范,如礼仪、习俗、道德规范等,加强社区自我管理和服务。

二、村规民约推动乡村治理法治化存在的现实问题

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制定村规民约,引导基层群众有序参与基层事务治理,加强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健全现代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一些地方对村规民约重视不够、指导不力,出

现了与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法治化不匹配的问题,主要体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一)村规民约的制定和内容不够规范

首先,制定主体参与不够。《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规民约的制定主体是村民,村民以召开村民会议的形式制定村规民约。随着社会发展进程不断加快,多地村庄中的青壮年选择进城务工,村内人口结构不健全。同时,由于各村治理结构的差异,导致各村规范的制定主体不规范、不统一。过去多由农村的“社会贤达”制定,现在有的是村民会议,有的是村民代表会议,有的是村民委员会。其次,制定内容不规范。我国地缘广袤,各地存在生产力水平差异,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情况普遍存在^[5]。农村地区的民间规范呈现“碎片化”特征,若不能严格落实上位法对村级制定村规民约的要求,整合规范村规民约的内容架构,则易使村规民约与村民生活脱节,不能起到维护村民利益的作用。再次,制定程序不规范。《关于做好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工作的指导意见》规定,村规民约的制定或修订,一般应经过以下几个步骤:征集民意、拟定草案、提请审核、审议表决、备案公布。在实践中,少数村委会在民意征集、草案拟定、审核提交等环节不够规范,由村“两委”班子研究并经村民会议通过后直接公布并实施^[6],这容易导致村规民约因程序不规范而缺乏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二)村规民约在社会变迁中存在滞后性

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促使农村结构发生快速变化,乡村人口结构、社会结构、产业结构的快速变迁都可能导致村规民约的制定和执行产生滞后性,面临适应性的挑战。第一,在农村人口结构上,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年轻人大量涌入城镇,农村出现了“六零三八”现象,造成乡村人口空心化。部分传统村规民约难以适应新型的人口模式,难以发挥对农村生产生活的调整作用。第二,在经济结构上,乡村的社会经济结构正由农业主导向多元化经济发展,不断更新和变化的经济活动对村规民约的调整和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在社会结构和发展进

程相对稳定的地区,村规民约的更新和实施普遍较好,而经济结构转型不畅的地区,可能因缺乏良好的实施环境而造成规范的滞后和不适应。第三,在乡村文化变迁上,由于教育水平的提高和信息技术的普及,使得乡村居民更多地接触到新文化、新思想、新理念,新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对传统村规民约的适应性构成挑战。同时,年轻人的新兴价值观可能与传统文化思维产生冲突。因此,脱胎于传统资源的村规民约需在继承和创新中与时俱进。

(三)村规民约的法律效力具有模糊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村规民约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即村规民约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规范框架下进行。村规民约具有内生性,是从村民日常生活逻辑中形成、生长的,但作为乡村自我管理的形式,在与现代法治理念的融合过程中易产生法律效力的模糊性。首先,法律层级和效力不清晰。一方面,村规民约是村民自治的具体体现,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村规民约内容因缺乏明确的法律定位,在实际执行中容易产生与法律规定不吻合的情况。其次,法律执行机制不明确。村规民约的执行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村民的自觉遵守和村级组织的执行能力,村民委员会等由于传统习俗的影响、对权力观念的错误理解、执法手段的不健全等原因,往往执行效力受限,难以达到理想的执行效果。再次,与法律适用相冲突。尽管村规民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村民自治和村民意愿,但在实际操作中,难免会遇到与上位法相冲突的情况,如在某村的村规民约中,对于偷盗行为的处罚远超国家法律的规定,包含体罚或高额罚款,这类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关于处罚必须依法定程序和法定权限进行的原则相冲突。

三、村规民约推动乡村治理法治化的路径

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强调要“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7]。针对村规民约的制定不规范、执行滞后性、效力模糊性的问题,应从法治的角度出发,推动实现村规民约内容、执行等各环节的法治化,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法治化水平。

(一)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

村规民约必须与国家意志相结合,为传统的、固化的、碎片的村规民约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形成系统性、框架性的规范体系。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能够确保村规民约的制定和执行既符合国家的法治要求,又适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具体而言,要做到以下三点。

一是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健全基层党的领导体制。《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指出,基层党组织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健全在基层治理中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有关制度,涉及基层治理重要事项、重大问题都要由党组织研究讨论后按程序决定”^[7]。基层党组织应深入参与村规民约的制定和完善过程,在村规民约、村民自治章程等规范的合法性审查、制定过程的程序控制和检查监督等方面起到领导作用,通过建立健全监督机制,确保村规民约的执行不偏离法治轨道。如对村规民约的执行情况进行定期检查、评估和反馈,公正处理违反村规民约和法律的行为等。同时加强对村规民约执行过程的监督,防止侵犯村民正当权益的情况发生。二是重视党员政治素质,提升党员服务水平。在基层党组织建设一支专业素质过硬的党员队伍,不仅要求党员具备良好的政治素养,还需要具备法律、行政管理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以更好地承担政策宣传、向村民普及国家法律法规等职责,更好地服务村民生产生活需求。三是积极推动法律与习俗相融合,促进村规民约落实落地。加强基层党组织对村规民约工作的领导,可以促进法律与乡村习俗的有机融合,指导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相协调,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弘扬法治思想和法治精神,确保村规民约的执行基于法治原则。如将组织法治培训教育和开展风俗文化活动相结合,开办“乡村大舞台”“文明流动站”“法治宣传车”等,或可以在村中广播站播放法治宣传歌、编写童谣等村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将法治宣传融入村民生活,让法治理念深入人心。

(二)强化村规民约的法治资源供给

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强调,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8]。将村规民约与现代法律有机融合,发挥乡村固有的法治资源供给作用,促进国家法律有效实施有效弥补和贯通,是提高乡村治理水平的重要举措。

其一,充分发挥乡村法治本土资源优势。村规民约是乡村地区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发挥约束和指导作用的内容,与村民的理解能力和追求方向高度契合,因而得到村民的广泛认可^[9]。应尊重和包容村规民约的本土特征,将本土优秀传统文化和民风民俗特点融入村规民约的执行过程,重视村规民约的自治性、独立性、地方性。为更准确地发挥法治化的社会治理效能,应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整合和调度资源,挖掘本土法治资源,建立符合国情、与乡村相适配融合的法律体系。其二,增强村规民约制定和执行的科学性。应明确村规民约的执行机构,成立村规民约执行监督委员会,由党组织牵头负责,协同村“两委”成员、人民调解员和具有一定声望的村民群众等,负责村规民约执行和落实工作。“人才治村”是现代乡村法治建设的重要途径,将法律人才引进乡村,培养强有力的乡村领导班子,村庄“两委”的职能将能够得到更好履行,推动村规民约更好地发挥作用。其三,创新村规民约的制定与现代技术相融合。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创新乡村治理模式,提高村规民约的公开性和传播度,如建立电子版的村规民约、开发乡村治理 APP 等,线上处理村民事务,使村民更便利地了解和参与村规民约的制定和执行过程,增强其实用性和互动性。

(三)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治功能

村规民约作为乡村文化的重要载体,必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更好地发挥其法治功能,培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品格,蕴含着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对新时代全体人民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思想道德、规范行为习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坚持在乡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完善村规民约推进法治建设,是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基层人民民主的重要举措。

一要在村规民约的制定和实施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村规民约中的导向作用,广泛征求村民意见,结合村庄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要求,在监督和执行等各个环节确保村规民约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要增强乡贤的地位作用。乡贤熟悉本地乡土人情,对法律法规更加了解,是连接国家法律政策和村民利益的“桥梁”。应积极培养和宣传乡村能人、组织生产评比活动,邀请他们参与宣传活动,发挥其带头示范作用。同时,乡村党员干部必须带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廉洁奉公、遵纪守法、敢于担当的优良作风,在乡村法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上起带头引领作用。三要注重移风易俗和社会公德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乡风建设,如通过开展乡村文化宣传活动、评选感动乡村人物、树立先进榜样等方式,使得社会主义新风尚在乡村生活和基层治理中蔚然成风。

(四)完善基层协商民主

要最大化发挥村规民约在乡村法治化中的积极作用,就必须积极推动基层协商民主,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要求,推动村规民约的实施。

一是在民主协商层面,基层党组织要践行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将村规民约充分贴合村民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及时了解民情,用法治化手段解决村民身边的具体问题,确保更好地维护村民正当权益。二是重视决策主体的专业性和科学性,提高农村基层干部自身理论素养,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筑牢思想根基,以提高村规民约的议制水平,避免出现内容繁琐、实践性弱等问题。三是发挥民主协商、人民调解、道德评议等组织和工作机制作用,使村规民约的制定和实施等全方位受到村民监督,并予以健全的制度支持和保障。

[参考文献]

- [1]本书编写组.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2.
- [2]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N].人民日报,2014-10-29(1).

[3]陈寒非,高其才.乡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实证研究[J].清华法学,2018(1).

[4]多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做好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工作的指导意见》[EB/OL].(2018-12-27)[2023-12-25].http://www.gov.cn/xinwen/2018-12/27/content_5352672.htm.

[5]李楠,何爱爱.新发展阶段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现实逻辑与实践路径[J].江汉论坛,2022(8).

[6]戴小冬.村规民约的法治功能及其实现路径[J].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6).

[7]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N].人民日报,2021-07-12(1).

[8]本报评论员.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20-11-22(1).

[9]尹凤英,韦秋雪.乡村治理背景下村规民约建设研究[J].村委主任,2024(2).

责任编辑:祝远娟